波兰在十字路口

波兰在十字路口

〔南〕德·米利伏耶维奇 著

波兰在十字路口

〔南〕德拉戈留伯·米利伏耶维奇 著

王洛林 寇 滨 译

赵乃斌 校

（内 部 读 物）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本书根据南斯拉夫《当代政论》出版社塞尔维亚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王荣久
封面设计：孙　政

波兰在十字路口

〔南〕德拉戈留伯·米利伏耶维奇　著

王洛林　[illegible]、滨　译

赵乃斌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illegible]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30,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

书号：　3003·1635　定价：0.62元

（内部读物）

出版者说明

波兰问题正吸引着国际上极大关注，也是我国读者所关心的国际问题。各国舆论对波兰问题的论点，不尽相同。南斯拉夫作者德·米利伏耶维奇写的《波兰在十字路口》一书，可供参考。作者曾任南驻波记者多年，现任南《政治报》社副社长。作者在书中主要是介绍波兰问题的有关情况和过程，并提出了他对波兰事件的根源、性质等的看法。中译本照原书全译，未加删节。作者得知本书译成中文后，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现一并刊出。

目　录

中 文 版 序

本书是在1980年波兰八月罢工事件之后写成的。鉴于1956年、1970年、1976年以及1980年一再重复出现这种危机，作者早在波兰危机时期就拟向南斯拉夫读者报道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及其成因。这也就是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

现在，中国读者所得到的这本书，是1980年11月南斯拉夫出版的未作任何修改的版本的译本。当然，从那时至今日，在波兰又发生了许多情况。去年年底，危机深化了，并延续至1981年。不仅工厂爆发过新的罢工，而且农村也出现了动荡，大学举行了罢课。经济形势愈加恶化：生产下降，居民的供应受到更多限制。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变动。最后，又重新改组了政府。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接替平科夫斯基就任总理。新总理提出，保持三个月的平静，停止罢工，以便政府能够为开创稳定局面创造基本条件。这一要求已为社会所接受。这表明，在当前，由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担任总理，在人民中间是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尽管没有提到军政府这一点，但上述情况反映出人民对于反法西斯解放斗争中诞生的波兰军队的态度，反映出人民对波兰军队怀有相当深厚的感情。

同时，党继续加快筹备非常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符合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特点的纲领。同样，会上还将提出新的章

程，以便在党内生活中，从而也在整个社会，能够有更为广泛的民主。关于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如何恢复业已遭到严重损害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信任，舆论界正在进行着广泛的讨论。

对于本书能够在中国发行，作者感到十分高兴，而且认为最新事态并不要求对本书中的事实和评价作某种修改。因此，南斯拉夫的读者已经见到的这本书，也可以赠献给中国的读者。倘若本书哪怕是稍许有可能使中国读者获得较多的情况，并由此来观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值得赞赏的将是译者的努力。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相信，同时也是译者根据自己国家的经验懂得，唯有波兰人自己才能寻找到解决波兰危机的办法。而这一点正是符合整个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德·米利伏耶维奇

前　言

本书的题材，不论是从近几个月来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来说，还是从这一事件的反响和后果来说，都被认为是重大的、迫切的。全世界有充分理由关心波兰的罢工。今年夏天，罢工事件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蔓延开来，而且很快就扩展到全国，从而导致了战后波兰最严重的危机。新闻界把不久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发生的事件称为“灼热的波兰夏天”。“灼热的波兰夏天”之所以突然出现在世界最著名报刊的头版上，主要不是因为罢工行动的规模(这次没有造成流血事件)，而是因为这一行动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可能引起的后果。

本书的目的，不是描述在波兰发生的最新事件的过程。读者自己有机会详细地了解罢工者的要求，以及波兰政府与联合罢工委员会之间缔结的协议内容，“灼热的波兰夏天”就是以这个协议告终的。根据本书的特点，我们特向读者提供有关当前波兰危机以前所发生的事件的比较充分而值得深思的情况。正如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斯·卡尼亚不久前谈到的，波兰的危机尚未结束。因此，我们的想法也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尚难预卜。

本书作者德拉戈留伯·米利伏耶维奇是《政治报》编辑，曾多年担任过《政治报》驻华沙记者，报道过波兰发生的各种

事件。他直接观察过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试图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战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进行研究分析。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了解和认识，就不可能理解今天波兰发生的事件，就不可能理解这些事件的错综复杂和互相制约的特点。

《波兰在十字路口》一书，并非战后波兰史的研究著作。然而，作者在书中以扼要评述的方式，有根有据地分析了波兰的周期性危机的动因和根源，而在这些周期性危机背后是不难发现一定的规律的。

最近，在这个同我们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并非偶然，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正象作者所说的，这些事件是在波兰复杂的现实条件下逐渐成熟起来的。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同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斗争了二十五年的国家，试图要用比较灵活的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形式，用与波兰特殊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形式，来代替僵硬的、中央集权主义—极权主义制度的形式，它就必须面对 1956 年和 1970 年的危机以及最近这次危机所显示出来的实际。而后者与前两次危机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是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的；或者说，在结束危机的过程中还没有酿成流血事件。

对于当前波兰事件作过认真分析的人，都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最近的危机的成因，不应只从近几年以至近十年期间去寻找。不久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米·拉科夫斯基说："某些现象有着深远的根源"。如果不揭示和不了解这一根源，就很难理解波兰党领导层最近的人事变动。

熟悉波兰情况的人都知道，爱德华·盖莱克和十年前的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一样，是以同样的方式被撤换的，而哥穆尔卡是在 1956 年从监狱被带到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并当选为书记的。对于这些事件，《波兰在十字路口》一书的作者都作了详尽的、有根据的评述。

尽管达成了协议，作出了将满足罢工工人愿望的许诺，但是波兰的危机还在继续。在工厂和企业中还可以感到温度正在上升，以及焦躁不安的情绪。生产成绩不大，劳动生产率低下，纪律松弛。整个经济所发挥的职能明显地低于实际可能性。“这就是今天波兰的现实，这就是党正在努力挽回对它的信任，恢复同社会的联系时所处的条件。在党的活动中，具有很大意义的是，冲突的最危险阶段已经通过对话、明智而又有妥协的协商加以解决了。这是 1956 年 6 月和 1970 年 12 月都未曾出现过的情况。”

这是新的书记斯·卡尼亚不久前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所作的评价。从中不难看出当前波兰局势的严重性，但也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准备以更大的勇气和现实的态度来正视事实真象，正视被搁置了多年的问题，并开始以一种与迄今为止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编　者

* 本前言是原书所有。——译者

一、灼热的波兰夏天

1980年7月，当罢工开始在波兰扩展开来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计它将导致的危机的规模。最初，罢工是分散地发生在单个的工厂和城市，后来便蔓延到全国，特别是波兰最大的港口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以及巨大的工业中心埃尔布隆克。这就是十年前曾发生流血性骚动的那些地方。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领导班子就是因为那次骚动下了台，以爱德华·盖莱克为首的新领导执掌了国家政权。

这一次没有发生流血性骚动。但是，罢工具有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表示强烈不满的性质。工人阶级提出了明确的社会、经济要求，从而导致了这个国家战后最大的危机。

整个国家生活几乎完全瘫痪，生产秩序被打乱，交通运输受到限制，经济濒临灾难的边缘，全国都处于社会和政治的沸腾状态之中。

在国际上，波兰突然成为头号政治问题。它在顷刻之间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动乱中心都挤到次要地位，而且可能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波兰地处欧洲的最中心，是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直接交接的地带。这种政治地理的位置和战略地位，使波兰处于极其微妙的情势之中。因此，罢工不仅使波兰的领导人感到不安，而且也使东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感到不安。

1980年9月1日，大规模的罢工由于政府和罢工委员会之间达成协议而告一段落，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然而，大家都很清楚，这并非最后结局。达成协议的条件，预示着波兰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这将是一个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间是没有先例的。显而易见，罢工以后的波兰不可能简单地恢复到罢工以前的那个样子。震荡是那样的深刻，那样的严重，以致动摇了生活的一切外观，并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建立社会制度的几乎全部问题。

波兰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它必须从这里开始重新检验迄今为止的很多价值标准，并为解决现存的矛盾而探寻新的、更适合于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的道路。

当然，波兰事件并不是突如其来偶然发生的。它是在一个社会的复杂现状中逐渐成熟的。这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表现出特有的勇气，但它对于深刻的矛盾并不具有免疫力。

波兰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只有百分之一点五的居民是少数民族。这个国家只讲一种语言，只有一种宗教。但是，可以看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另一种分歧。这种分歧有时可能比民族的、语言的、宗教的分歧还要严重。在这次事件中，工人阶级以至整个社会，都同自身的官僚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长期滋长起来的官僚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搞乱他们的力量，限制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个国家有过极不安定的、极其困难的经历，它的人民在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对于这样

一个国家来说，何时争得这种自由和独立，怎样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波兰的历史，对于波兰民族特征及其社会实体的形成，首先是对于很大程度上反映独立自主精神的那些特点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这种独立自主精神，也是作为这个社会实体组成部分的波兰工人阶级所特有的。

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付出过巨大的牺牲，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将近两百万波兰人曾经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各条战线上，即东线、西线、非洲和波兰本土的抵抗运动。我们在研究当前波兰情况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是红军把波兰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在红军中有为数众多的波兰人参加战斗，包括波兰第一军、波兰第二军和很多游击队）。正象其它被红军解放的国家一样，这一事实，对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波兰今天是华沙条约和经互会的成员国，在这两个军事一政治和经济的集团中，就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潜力来说，波兰居第二位。

所有这些重要的事实，都对波兰社会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发展发生影响。同时，这也是产生社会内部矛盾的土壤。因为，要知道，社会主义并不是“无冲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

在新工会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最多，这不是偶然的。新工会的建立大大改变了波兰政治制度的结构和体系。现在，当它们已经成为波兰现实生活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的时候，十分重要的是，它们今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展，怎样活动。既然在总共一千二百万就业人口中，已有八百万工人向新工会靠拢，那末，新工会无疑是波兰工人阶级自立组织的最

有说服力的例证之一。通过新工会的建立，波兰工人阶级可能成为波兰社会的一支更重要的力量。

然而，并非只有“独立工会”才是波兰国内新动向和新变化的标志。波兰已经认真地准备进行经济改革，为此已经宣布要以某种方式协调中央计划和具有深远意义的企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虽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将怎样进行，但它确实无疑地表明必须摆脱用陈旧的方式和用迄今为止的方法来管理经济。

在政治制度的职能化方面也可以看到新的现象。作为国家最高代表机关的波兰议会，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工作，开始以新的姿态出现。议会下面建立了最高社会监督机关。这是一个采取了新形式的旧机构。议会同政府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并且宣布人民委员会以及地方政权机关的职能权限将作重大改变。

对于作为波兰社会的一支实际力量的天主教教会，也采取截然不同的形式与其建立关系。教会的地位，是由波兰民族的历史发展确立下来的，它对波兰公民的公共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报刊、广播、电视都更为公开、更加真实、也更带有分析性地把国内发生的事情转告给社会各界人士，也说明他们国家的处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舆论界的许多机关、机构乃至个人，都面对工人阶级提出的要求，重新检查自己的工作和责任。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党所采取的措施。党是波兰社会的领导力量，应当首先从它的内部危机中寻找广泛的社会危机

的原因。它正在运用迄今为止还不太熟悉的方式，全神贯注地着手分析这种危机，寻找摆脱危机的道路。正如中央委员会新任第一书记斯·卡尼亚所说：业已决定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要通过“具有持久价值的纲领”，还将对党章进行重大修改，对领导机构的地位、第一书记的职权等也将作出重要的改变。上述这些改革，以及其它许多改革，都被看作是一种必要的保障，以便使此种危机以及类似的危机不致重演。

总而言之，现在波兰开始了国家和社会的“大整顿”。这是有着深远意义的一次整顿。不过，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在今年“灼热的波兰夏天”以前，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二、波兰人和他们的命运

在谈到波兰和在波兰所发生的事情之前，也许应当谈一下波兰人。因为，在一切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件中，主要的、直接的参加者是这样一些人们，他们是劳动人民、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波兰青年。是的，不能忘记一句民间谚语：要吃完一包盐才能了解一个人。在一个国家里，真不知要吃多少盐才能了解它的人民。但是，我们南斯拉夫人一直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朋友，我们同他们友好相处，并且在他们国家逗留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我们基本上可以根据他们的主要特征来了解他们。

不能简单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波兰人是什么样的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根据他们的事业、他们的斗争、他们的痛苦和忧患作出判断，可以根据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作出判断。

在华沙"第一军"大街上，在现在的教育部大楼里，有一个地下室，那儿在被占领时期曾经是盖世太保的监狱。在这里，如同在遍及波兰的许多其它监狱和集中营一样有许多爱国者被监禁、被杀害。在这个地下室的一间昏暗的小屋墙壁上，还保留着一位不知姓名的囚犯用手指刻划的字句，人们在微弱的灯光下只能勉强地把它们辨认出来：

“谈论波兰很容易，
为它劳动颇困难，
为它而死尤艰巨，
为它受苦最难堪。”

任何一个人，当他读过这位正昂首阔步准备走向死亡的无名作者所写下的诗句以后，都会为诗句中所包含的那种哲学的真实性而感到震惊。因为它用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特质。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国家劳动过、战斗过、牺牲过，并且从未停止过为它受苦！

对波兰人的第一个、基本的、经久不变的印象，就是他们的爱国主义，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传统、对自己国家的杰出人物、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传统的崇拜会达到象波兰那种程度。这也和对自由的崇仰一样，不只是崇仰自身的自由，而且也崇仰别人的自由。

众所周知，波兰人有一句传统的格言：“争取我们的和你们的自由！”这句格言来源于大量历史事实，它们记载着所有的波兰人曾经为谁的自由而战斗过。例如，我们知道，早在1683年，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曾经驰骋战场，挥师维也纳，打败了土耳其，抵挡了土耳其人进一步涌往北方，拯救了欧洲。波兰人民起义的领袖塔德乌什·柯舒什科曾经反对沙皇俄国的统治（1794年），后来又去美国，在那里的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在波兰人称为“人民之春”的匈牙利起义（1848年）中，波兰将军贝姆是起义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在巴黎公社中，为人称道的军事领袖中间，就有波兰人托姆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布列夫斯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人几乎在所有的战场上进行过反法西斯斗争，从挪威的纳尔维克到大不列颠，从非洲战场到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在 1945 年 5 月初，大批波兰人参加了攻克柏林的战役。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中，一个由五百名战士组成的波兰营先后在扬·库莫什和扬·德隆格指挥下进行过战斗，波兰人也参加过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其它部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条战线上，有将近两百万波兰人参加过战斗。

这一切，都牢牢地印记在每一个波兰人的心灵和意识的深处。

波兰可以感到自豪的是，象它这样的国家是少有的。希特勒在波兰未能找到一个吉斯林、贝当、奈迪奇、卢布尼克那样的人物。波兰人在抵抗运动中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并不都是志同道合的，但他们都反对德国占领军。

历史的印记

当然，波兰的历史并不总是循着一条线索发展的。波兰人大部分时间曾经是被征服者、被奴役者，但也曾经是征服者。波兰曾三次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肢解和瓜分，瑞典人到过华沙，拿破仑和俄国的亚历山大皇帝在一段时间里曾经把大波兰国化为华沙小公国。在现代史上，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分割过波兰。但是，在中世纪，波兰国王和大封建庄园

主曾讨伐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直抵斯摩棱斯克；1610年，波兰人甚至占领过莫斯科达一年之久；在本世纪，波兰元帅和独裁者毕苏斯基，在十月革命后曾经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过武装干涉，占领过维尔纽斯和乌克兰的一部分。

这个暴风雨般的全部历史，也在波兰民族特性的形成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关于这一点，在波兰的文学、社会学和政论作品中，有过很多描述。二十年前，哥穆尔卡曾经谈过下述想法：

"历史铭刻在波兰民族心理上的独特之处，是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特有的敏感。这种敏感是由于波兰的被分割，波兰民族长期遭受奴役而形成的。这个民族的国家组织有着自己上千年的传统。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传统习俗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上的负担，这就是：小贵族阶级无政府主义民主的极其有害的传统，以及在异族统治下生活时期所激起的对于当局的固执的不尊重、不愿执行它的指令。在日常生活中，我国人民中间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也很突出，但是，一旦涉及外来敌人的问题时，又令人深深感受到他们的团结一致。"①

这种见解，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见解来说，是可以有条件地加以接受的。在波兰人民的历史上，这位政治家在一段时期内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后来退出了政治舞台。大家都知道，戴高乐关于法兰西主义也有过自己的见解，并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然而，评价一个民族的特点，并不是根据某个人对它的看法，而是根据它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的所作所为。

---

① 哥穆尔卡在1957年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的报告。

此外，如果说，过去的历史形成并突出了一些特点，那末当今的历史却形成和突出了另一些与前不同的特点。波兰今天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文化、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在世界上享有名望的专家。现代社会中新的生活方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新的地位、同邻近国家和民族的新的关系、整个社会新的结构，现在都在波兰新的一代身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当然，在这方面不应低估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一切历史因素，诸如传统、风俗、习惯等等。波兰人对于自己的独立、对于自己在欧洲文化和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怀有自豪感，是可以理解的。早在十四世纪，波兰就开设了自己的大学(在克拉科夫)。这是世界上首批建立的大学之一。在历史上，波兰曾涌现出一些伟大的人物，如哥白尼、密兹凯维支、肖邦、显克微支、玛丽亚·居里。他们不仅属于波兰和它的历史，而且也属于整个人类。

三、在世界冲突的漩涡中

波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牺牲者。这次大战就是以 1939 年 9 月 1 日希特勒军队进攻波兰开始的。两天以后，英国和法国对法西斯德国宣战，于是世界就陷入了一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流血最多的惨剧之中。

德国人当时在波兰投入了将近二千四百辆坦克和两千多架飞机。在那个时候，这是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德国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遭到了波兰军队的英勇抵抗。波兰军队是英勇的，但相对来说武器装备是比较差的，经过浴血奋战之后，到 9 月下半月，华沙陷落了。战斗还继续了几个星期，但波兰的抵抗终于被击溃，波兰军队战败了。德国的“闪电战”明显奏效，因此随后又应用到其它国家，其中也包括南斯拉夫。

当时登上舞台的还有苏联军队。根据早些时候缔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苏联军队在 1939 年 9 月 17 日越过了当时的波苏边界，占领了波兰东部，大批的波兰人，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得以在波兰覆灭之后转移到苏联。同样地，也有许多人通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到达西方。在那种情况下，自然不会首先去解决政治信仰或者阶级归属的问题，而是要首先解决迁居到某一个国家的可能性的问题。

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波兰流亡政府从巴黎迁到伦敦，其首

脑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他是著名的爱国者和战前毕苏斯基政策的反对者。1941 年 6 月，当苏联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时，西科尔斯基到达莫斯科，同苏联商谈关于共同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战斗，以及在苏联组建波兰部队的问题。根据这次达成的协议，释放了所有的波兰公民，并在他们中间组成了一支波兰军队。这支军队的指挥员是安德列斯将军。他不完全赞同西科尔斯基的政策，后来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把这支军队先调到伊朗（似乎是由于他们在苏联的给养发生了困难），然后开到西方。这支军队后来在盟军战场上参加过战斗，1944 年还到过意大利，在战争结束阶段曾经出现在南斯拉夫边境地带。

1943 年，同苏联合作过的瓦·西科尔斯基将军，在一次神秘的飞机失事中死去，接替他担任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首脑的，是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农民党领袖瓦迪斯瓦夫·米科瓦伊契克，他对苏联持有同西科尔斯基将军完全不同的态度。

在波兰人民的心目中，对西科尔斯基至今仍然保留着良好的印象，他的名字总是受到尊敬的。可是，关于米科瓦伊契克，人们是根据他后来在战时和国家解放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对他的看法和态度。他的流亡政府对苏联采取不大友好的立场，有一段时间简直是持敌对态度；在战争结束以后，他回到波兰，试图建立一个新人民政权的反对派。最后，他又离开社会主义的波兰，再次侨居到西方。

抵抗运动的诞生

在被占领的波兰，德国法西斯迫不及待地进行了一系列道道地地的、妄图灭绝波兰民族的残暴行动。这种行动首先是从打击犹太人开始的，然后便相继屠杀波兰的知识分子、青年、宗教界人士、工人。波兰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出的牺牲仅次于苏联，有将近六百五十万人被杀死、烧死、饿死。

在国内，迅即开始组织了抵抗运动，建立了许多破坏小组、城市的地下组织和武装小分队，他们在思想政治倾向上不尽相同，但目标只有一个：抗击侵略者。在城市里，居民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地下活动和特殊的“地下”生活。例如，在华沙，在整个占领期间，一直开办着地下大学，教授们在私人住宅里给大学生们上课。

开始时，从组织的人数来说，力量最强的是所谓“国家军”，简称AK。它是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其实，这支军队除了在最初一段时期内有时对德军官兵搞一些恐怖活动以外，没有进行过什么重大的战斗行动，但它组织了人们，提出了要“持枪待命”的口号。它的司令员先是斯特凡·罗威茨基将军(化名格罗特)。罗威茨基被盖世太保逮捕后，就由塔德乌什·柯莫罗夫斯基·波尔负责指挥。

“国家军”的小组和支队遍布全国，从事过一些恐怖、破坏活动，有时也同德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它拥有组织得很好的情报部门。1943年春天，它的情报人员发现，德国人在奥得河口的一个特别的研究中心正在进行某种新型秘密武器的

试验，情报送到伦敦后，英国的空军根据这一情报轰炸了班涅明德，摧毁了该研究中心。后来，“国家军”的情报人员又发现另一项德国人的秘密，那就是当时英国人还一无所知的臭名昭著的“V型武器”。

战争爆发时，在波兰不存在有组织的共产党，因为原来的波兰共产党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被解散了。这时，才看出这项命令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失：在那生死攸关的日子里，波兰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以尤利扬·连斯基、阿道夫·瓦尔斯基、维尔·柯斯特舍夫为首的波共领导人，都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处决了。

但是，没有有组织的党，并不意味着在波兰没有共产党人，也不意味着他们在袖手旁观。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信念和斗争本能，自发地建立了许多地下组织。这些地下组织使用了各种不同的名称：“镰刀和锤子”、“解放斗争联盟”、“苏联之友协会”、“人民波兰”，等等。

1942年1月，这些地下组织建立了波兰工人党。这意味着波兰共产党的重建，党的领导人是马尔采里·诺沃特科和巴威尔·芬德尔。从1943年起，由瓦·哥穆尔卡担任领导。

从一开始，波兰工人党为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对占领者开展积极的斗争，争取波兰的独立和解放。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近卫军”，即“人民军”，简称AL。“人民军”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及在华沙采取了行动，它的司令员是罗拉·日米埃尔斯基将军。

这对整个抵抗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

家军"的一些组织。这些组织不能再消极地奉行"持枪待命"的政策了，他们也要奋起战斗。此外，以前建立的"农民营"（它的组织者是农民党），也开始同"人民军"合作，在全国各地多次采取过共同的战斗行动。

最重要的行动

波兰的抵抗运动并不具有广泛的、不断的军事行动的性质，也不是由大规模的武装部队组成的。它主要是进行破坏、罢工、暗杀和城市行动，但有时也同敌军部队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武装对抗。

根据一些波兰人提供的材料，在战争期间开展过以下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行动：

1942年底，为报复德国人在华沙绞死五十名波兰爱国者，哥穆尔卡领导下的"人民近卫军"战斗小组袭击了"咖啡俱乐部"的德国军官，后来又袭击了火车站和德国人控制下的《新华沙信使报》编辑部；

1943年2月，"人民近卫军"支队组织袭击了华沙造币厂；

1943年3月，在华沙，当德国人把二十五名囚犯从一个法西斯监狱押送到另一个监狱时，"国家军"战斗小组解救了他们；

1943年4月，"人民近卫军"支队袭击了正在毁灭华沙犹太人区的德国人；同月，袭击了储蓄所，缴获了那里的货币资金；

1944年6月，“人民近卫军”、“国家军”和“农民营”的联合部队，在扬诺夫斯基森林里，经过十五天的战斗，突破了三个德国师对他们的包围。

此外，还进行过数百次战斗，歼灭了大量德军，炸翻了许多辆德国列车，摧毁了许多设施。

当然，波兰抵抗运动规模最大的战斗行动，是1944年8月1日的华沙起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下面还会讲到。

波兰工人党从一开始就提出倡议，要联合一切力量，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协同进行战斗，这样可以大大加强整个抵抗运动的力量。早在1943年1月，哥穆尔卡就致公开信给在“国家军”司令部的流亡政府的所谓代表机构，提出了关于共同战斗的详细建议，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因此也没有达成协议。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和它的“代表机构”，坚持关于波兰的“两个敌人”的理论，所谓“两个敌人”，是指德国和苏联。他们认为，他们的行动应当是在军事上反对德国，在政治上反对苏联，因此他们拒绝同共产党人合作。这就大大削弱了反对占领者的战斗力量，也导致了那个时期的最大的悲剧——华沙起义。

“人民近卫军”（即“人民军”）在结束占领以前已拥有六万名战士。据报道，一共进行过四百五十三次大、小战斗，炸翻了四百六十五列火车，破坏了六十一座桥梁，摧毁了五十五个火车站。

“国家军”在1944年夏天华沙起义之前，在全国组织了三十万人。

华沙起义的悲剧

1944年夏天，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库尔斯克、斯摩棱斯克和乌克兰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越过了从前的波兰边界，开始向华沙进军。在红军中，也有波兰军队参加战斗。他们在苏联经过补充组建，总数近十万人，其中也包括“波兰人民军”的游击队。波兰东部的许多城市和居民点已经解放了。

在解放了的波兰领土上，建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7月22日，在解放了的卢布林发表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宣言，宣言中包括有建设新波兰的纲领。7月22日这一天后来定为波兰国庆节。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宣言，反映了波兰工人党、社会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等政党的共同立场。它们首先就建立民族统一阵线达成了协议。可以说，这一宣言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基石。

当时，以波尔·柯莫罗夫斯基为首的“国家军”司令部，预料红军很快就可进入华沙，企图在苏联军队进城之前夺取首都的政权，以便作为“主人”出现在红军面前，于是，发出在华沙起义的信号，而在此以前也没有将自己的行动通知苏军司令部。

华沙居民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他们满腔热血，一片爱国热忱，匆忙揭竿而起，投入了战斗。这确实是一次真正的人民起义，“国家军”的拥护者和“人民军”的拥护者，以及一切能够

参加战斗的人，全都行动起来了。

结果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当时苏军司令部（正如后来所说的那样）在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并没有打算攻入华沙，而是准备突破战线的另一部分。苏军部队驻留在维斯瓦河右岸，在“布拉格”郊区，并没有采取任何渡河的措施，而在河左岸的华沙，却点燃了起义的火焰。死守城市的德国人，看清了这个形势，于是倾全力扑灭起义。战斗持续了两个月，唯一试图为起义者们提供援助的是红军中波兰部队的成员，他们已经到达维斯瓦河的左岸，但全军覆没了，他们建立的桥头堡也被摧毁。

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没有饮水，城市陷于死亡之中。在每条街道、在每幢房屋、在下水道系统的每条管道，起义者们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在占领者的大规模报复性袭击下，起义者坚持了两个月的战斗，终于被击溃了。华沙城毁灭了。将近二十万华沙居民死在自己城市的废墟下面。整个华沙除了一片废墟之外，一无所存。一座座房屋、一条条街道，都被德国人破坏殆尽。他们不仅从地球上抹掉了一座城市，而且也抹掉了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根据波兰官方的看法，对华沙起义的评价有两点：第一，华沙起义是起义者为解放自己的城市，抗击侵略者而进行的英勇的、爱国主义的、最后浴血牺牲的战斗；第二，华沙起义又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筹码，这一方面是隐藏在起义背后的筹码，另一方面是由于起义而拨弄的筹码。而“国家军”和“人民军”流血牺牲的战士们，并没有识破这种政治上的筹码，他们为了解放自己的城市而冲锋陷阵。从 1939 年以来，这个城市就生

活在占领者的黑暗统治之下。“人民军”在华沙的领导人在起义中全都牺牲了。

上述对华沙起义的第二点评价，以后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国家军”的战士们受到敌视，他们的斗争不被承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受到迫害。直到1956年，当哥穆尔卡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以后，这种状况才被纠正过来，凡是真正参加过反对占领者斗争的人，不论他们属于哪一个系统，都承认他们的功绩。

历史上最大的刑场

我们已经提到波兰人民在战争中遭到的巨大牺牲——死亡将近六百五十万人，他们并不都是战死的，而更多的是被法西斯占领者残害而死的。法西斯德国并不隐瞒他们要逐步地从地球上消灭波兰民族的意图，在波兰的领土上，有着人类难以忘却的最大的刑场，例如奥斯威辛、布热津卡、华沙犹太区等等。

波兰人民为自己的自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个国家在战前有三千二百万人口，这时缩减为二千六百万。在牺牲的人中间，死于战场的约占百分之八，死于集中营、监狱、刑场的约占百分之九十。死难者主要是城市居民。据估计，在死难者中间，有百分之八十来自城市，百分之二十来自农村。

如果不谈一下天主教教会在战争中的表现（天主教教会至今在波兰仍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影响），读者就不可能获得有关战时波兰的全面印象。在其它一些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在

内，有相当数量的天主教教士曾经是同占领者合作的，而在波兰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地，希特勒分子鉴于波兰天主教的爱国立场杀害了几乎三分之一的教士。这说明天主教教士对人民有很大影响，也说明他们的爱国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使教会的声誉在战争中不仅没有受到损害，甚至还以自己的爱国行为和对占领者的反抗作出了贡献。这就能够部分地回答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提出的问题：在波兰这样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里，教会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根据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宣言的原则，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波兰人民共和国，在战争结束以后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十分艰巨的，因为这个被战争破坏和摧毁了的国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荒无人烟。首先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来从事恢复，然后才能继续前进。

波兰人是在极其严酷的条件下重建自由生活的，回到已经毁灭的华沙——这个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城市，需要极大的勇气。过去，华沙曾经是一个先进的都会。它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有着许多引人入胜的文化古迹，有着繁荣的商业。由于它美丽壮观，由于它悠久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生活，曾经被人们称为“北方的巴黎”，而现在剩下的却是一片废墟和瓦砾。1945年，在华沙有幸生存下来的居民只有十万人。

自由地迈出第一步

掀起全民性的行动重建华沙。这是新政权首先关心的事情。“全体人民建设自己的首都”的口号，是向废墟开战的那

一天提出来的。直到今天，这一口号还镌刻在市中心的一座建筑物上。

首先要重建历史悠久的华沙古城堡。这是早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建成的城市的最古老部分。根据照片和原有的设计图，照原来的样子重建街道、房屋、商店，使它们重新获得过去的外貌。正象人们所说的，如果没有华沙古城堡，没有它在历史上的本来的形象，华沙就不再是华沙了。

重建工作靠的是波兰青年的力量，也得到了其它国家的青年，包括南斯拉夫青年的帮助。当时重建的街道之一曾经命名为"南斯拉夫青年大街"。后来，情报局时期，这一街名被改掉了。

就全国来说，情况极其困难，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某些地区出现了由新政权的反对者组成的叛乱匪帮。在被占领时期从来没有发生过波兰人自相残杀的情况，而现在，正当需要建设新国家、巩固新政权的时候，叛乱者们却残忍地杀害波兰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和政府官员。他们希望波兰回复到过去的资本主义制度，重建资产阶级政权。保卫年轻共和国的新政权，成了波兰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关于那些日子的情景，波兰作家耶日·安杰耶夫斯基曾经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灰与金刚钻》中突出地作过描绘。

以总书记瓦·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工人党，从一开始就奉行人民阵线的政策，有效地保持和加强了同波兰社会党的联系（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是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战时曾被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也保持和加强了同统一农民党和民

主党的联系。这个民主党派的联盟包括了大部分波兰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

从侨居地归来的瓦·米科瓦伊契克，组织了一股得到外国支持的反动和“极端”的势力，反对民主党派联盟。这股势力不仅反对在波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反对波兰的新边界。这条新边界同1939年的边界不同。战前的波兰还包括它国土以东的一部分地区，那里居住着相当数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现在根据同盟国的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精神，将那一地区连同大部分非波兰居民，都并入苏联的主要的加盟共和国。与此同时，波兰在西部获得了自己从前的“比亚斯特国”（比亚斯特王朝时期）的领地。这块地方已经长期被割占，而且遭到全面的日耳曼化。这是一片广阔的、富饶的地区，包括弗罗茨瓦夫、沃波累、什切青、瓦乌布日赫、科沃布热格、热洛纳—古腊等城市。这里是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波兰国的领土，战前移居到这里的德国人，大部分跟着德国法西斯的军队逃跑了，来自东部地区的或者从国外回来的波兰人，开始迁移到这个地区来。

这样，正如通常所说的，波兰在西部获得了自己的奥得河和尼斯河历史边界。波兰的东部边界当时主要是按照寇松线，那实际上是按人种划分的波兰边界。

当波兰工人党同民主联盟的其它政党一起，为争取波兰的新边界和“比亚斯特国”的领地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在伦敦的流亡政府首脑阿尔茨舍夫斯基在英国报刊上写道：“我们不要弗罗茨瓦夫，也不要什切青！”其实，这里也反映了要控制东部地区的非波兰人的原来的夙愿。

1946年6月，在波兰举行了公民投票，人民需要对三个紧迫的问题发表意见：第一，设置参议院作为未来议会的另一部分（这是米科瓦伊契克要求的）；第二，土地改革；第三，西部地区并入波兰。

在公民投票中，有百分之六十六的选民表示反对设置参议院，百分之七十七的选民赞成土地改革，百分之九十四的选民赞成西部地区的并入。

这是对反动势力最好的回答，因为他们企图就这些问题在国内制造混乱，妨碍波兰新政权和新政策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准备通过选举产生议会的良好时机，现在议会需要尽快地产生出来。

普选是在下一年，也就是1947年进行的。在选举中，民主党派联盟令人信服地击败了以米科瓦伊契克为首的反动势力。这个联盟的主力是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密切合作，对于工人阶级和大部分劳动人民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

这是一个反映出大量的客观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个还没有被斯大林主义的一套办法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期。因此，波兰还能够扩展一些政治生活和组织机构的特殊形式。这些形式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及其特点。

波兰人漫长的、多灾多难的历史，在德国封建主义和俄国专制主义之间被撕得支离破碎。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看到，多少世纪以来自己梦寐以求的民族自由发展的愿望实现了。因此，在他们的战后发展中，明显地反映出这样一种思想：寻求波兰式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在这里还需要

补充一个事实，即波兰人有着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也有过卓越的成就。

关于这一点，1946 年 12 月 30 日哥穆尔卡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过如下一段话：

"波兰工人党根据两个工人政党一致行动的原则，与其它民主党派密切合作，形成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发展道路的设想。这一设想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波兰的发展中，不存在急剧的革命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不需要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最困难的转变时期的执政形式。以现实的前提为基础，我们确定了通过由民主党派联盟行使权力的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一设想是打算和平地、逐步演化地发展，如果不建立我们两党之间的紧密合作，如果没有工农联盟，那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民主包含了许多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也包含了不少自由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原则……"①

1946—1947 年间的这些论点，可以从当今正在兴起的"欧洲共产主义"的某些早期形式中看到。无论如何，这反映了当时波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以便尽可能地符合波兰的社会实质、结构和特征。在当时，这种探索还没有被戴上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枷锁。

工人自治的发端

在波兰战后初期的发展中，还可以举出一个耐人寻味的

①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文章和演说》，华沙，1947 年。

事例。这个事例在当时舆论界知道的很少，但从后来以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来看，它却是有意义的。这个事例就是：在波兰曾经出现过工人自治的某些雏形。

在刚解放的时候（有的地方就在赶走敌人的当天），许多工厂就开始建立“集体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企业，防止盗窃和转移财产，保证企业能够早日进行生产。这些工厂的老板一般都在国外，或者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凡是没有老板的工厂都表现出特别富有首创精神，并且立即组织了生产。

这些“集体委员会”是自发产生的，领导其活动的一般都是属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工人，或者是战前在工会工作过的工人。当时并不那么看重党派归属和思想倾向，他们都热情地工作，而且特别维护组织纪律。这是真正的工人的“自下而上”的首创。

集体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取名“工厂委员会”。这种工厂委员会很快得到了公认和法律上的批准。早在1945年2月6日，当时的波兰政府就通过了《关于工厂委员会的法令》，其中规定了工厂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它在企业中的地位。在很多情况下，在领导生产、确定收入、交付商品等方面，委员会是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过去是雇主管理一切，而现在工厂委员会主席成了企业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在国营企业中，工厂委员会在国家监督下，在领导业务工作，解决工资等级等问题方面起主要作用。1947年，对于工厂委员会的法令又作了修改和补充。

工厂委员会履行经济领导职能的时期比较短暂。当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根据“一长制”原则实行国家中央集权制领导的时候，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就逐步被削弱，以至完全消失。

波兰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希拉伊·明兹在经济方面的教条主义观点是众所周知的。正是他对工厂委员会的作用最先提出异议。他宣称，集体管理的方式不符合个人要对企业的命运负责的原则。

工厂委员会在形式上始终没有撤消，但是逐渐地被经理及其机构日益扩大的作用所取代，从而工厂委员会以“自生自灭”的方式消失了。

“党的领导任何时候都不赞成把这种工人阶级自发的直接行动作为党的、以及新的人民政权的原则立场和政策。”①

后来，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工厂委员会完全被遗忘了，即使是在今天，在文学作品和政论作品中也很难找到有关工厂委员会的痕迹。阐明最初的工人自治机构性质的罕见的尝试之一，是瓦迪斯瓦夫·多明诺博士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2月4日《工人委员会》报上，文章的标题是：《自治思想是从哪里产生的?》多明诺在文章中指出：工厂委员会的建立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斗争合乎逻辑的继续。当工人阶级认识到，国土的解放为实现他们的利益创造了条件，他们就采取了行动。多明诺写道：“这是毫不奇怪的，当波兰从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时刻，各工厂集体越过法律条文，自行分别掌握某些工厂的权力，采取措施在这些企业中保障、恢复和推动生产，并通过自己的代表对工厂实行经常性的领导。”

扬科·克里科瓦茨在自己的关于波兰工人委员会的书中写道：

---

① 扬科·克里科瓦茨：《波兰的工人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出版，贝尔格莱德，1971年。

“工人们把这些活动看作是实现工人阶级更广泛、更崇高的目标。这些目标超出了政治流派和党内派别之间的冲突。工人阶级以这种方式实现在基层的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并在实际上指出了摆脱整个国家困难处境的可能性和途径。”

斯大林主义对波兰的冲击

然而，1947 年底，在波兰开始感觉到吹来了另一股风。到 1948 年，这股风发展成龙卷风。在领导层开始逐渐出现了分化过程。例如，哥穆尔卡在情报局成立以前是不同意成立这个机构的。他认为，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在自己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情报局里，他预感到有限制这种独立性的明显趋势。

那是一个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其它东欧国家都在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个变化是苏联战略的产物，而苏联的战略则导源于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新形势。

在共同战胜法西斯之后，战时盟国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美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尖锐化了，导致大国都开始巩固并加强各自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美国为此而制定了“马歇尔计划”(1947年)，以后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特别是在发明氢弹之后，西方掀起了反共的歇斯底里，而西欧国家还妄图影响东欧国家的发展。这一切，都引起了苏联的相应的反应。它开始促使东欧国家“同质化”。建立情报局本来应当是作为“党与党之间合作”的因素，但是，情报局很快就变成了控制这些党的工具（有意思的是，情报局是在波兰成立的。1947 年

9 月，欧洲共产党在波兰的斯卡日斯科·波连伯召开会议，决定把情报局设在贝尔格莱德）。

人民民主国家中业已开始的、充分尊重各国各自的特殊性的过程（有的国家成立了民主党派的人民阵线，有的地方通过演变的道路逐步地消除资产阶级权力的残余。与此同时，还采取了革命措施。）都突然中断了。而强加于这些国家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中央和国家领导经济，国家控制整个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的。

到 1948 年，情报局进而攻击南斯拉夫，因为它坚持维护自己真正的革命成果，拒绝接受控制。这种冲突被利用来日益加紧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也被利用来日益明显地控制其它的党，把它们“团结成一个阵营”。

在波兰，由于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情况，教条主义势力、首先是从苏联回来的干部越来越占优势。他们开始清算工人党和社会党的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著名活动家。打击首先是落到了被占领时期抵抗运动的组织者们头上，其中有：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泽农·克利什科、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伊格纳吉—洛加·索文斯基等人。此外，在农村政策上，在新归并的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上，在党的工作的独立性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

例如，哥穆尔卡在制定波兰发展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把发展新归并的西部地区作为主要目标之一。他在 1946 年就曾经说过：“我们在重建整个波兰的时候，应该特别致力于恢复和发展新归并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需要应该放在第一位，并且提到国家一切任务的首位。这些地区的恢复和建设，意

味着增强波兰的安全和力量，意味着增强我们的工业潜力，也意味着为波兰及其人民开辟从来未有的发展的可能性。我们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大胆而艰巨的任务，即在1946年我们要迁移三百万波兰人到那里去，其中有从苏联和法国被遣送回国的，也有从波兰其它地区迁移过来的。当这一任务完成之后，这个地区同整个波兰的有机的结合过程就将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然而，在领导层中也有许多人根本不同意哥穆尔卡把这件事情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优先地位。他们认为波兰有另外一些急迫的任务。

哥穆尔卡先是被解除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和政府副总理的职务，由博莱斯瓦夫·贝鲁特来领导工人党。后来，于1951年，哥穆尔卡被逮捕入狱，在1956年以前一直被排除在波兰的政治生活之外。

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一个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成为波兰社会和波兰国家的唯一领导力量，党的总书记是贝鲁特。在此以前一直领导波兰社会党的约瑟夫·西伦凯维兹，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这两个原来是以平等合作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政党的合并，就是在波兰发生斯大林主义式的大转变的开端，尽管这一合并是早就准备进行的。

重大的变化

当我们谈到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时候，很明显是指

从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时期。在波兰人的思想和记忆中，那些年代是“错误和歪曲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都是斯大林主义的准则占统治地位。

很难在一篇简短的述评里描绘那个时期的全部特征。不仅在波兰，而且在其它国家，以至于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都有关于那个时期情况的一系列文献。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南斯拉夫人民对于斯大林主义的特点了解得特别清楚，因为他们曾经不得不为维护独立和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进行长期、艰巨的斗争。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要叙述一些波兰所特有的情况就够了。

首先，在波兰完成了国家管理经济的严格的中央集权化，实行一切经济过程集中计划化，严格地规定了必须完成的计划任务，而且必须完全服从上级国家机关。这样就排除了企业具有任何一点独立活动的可能性。与此相联系的是，充分扩展国家的和与它平行的党的机构，因为要通过党和国家这个双重系统来进行领导。

新的经济发展六年计划(1950—1955年)，是这一变化的反映，是以苏联的实践为蓝本的那样一种经济发展概念的具体化。

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从这样一个概念出发的：资本主义意味着无政府状态，而社会主义意味着计划化。是的，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化为前提，但计划化并不自动地意味着社会主义。况且，这种计划化不是直接由社会来实行，而是通过国家和它的机关来实行。在人民民主国家，由苏联专家所制订

的计划，很少考虑生产的现实条件和需要，而且一旦计划制订完毕，又谁都不能再对它提出问题。其实，这种计划都是主观愿望的产物，正如萨特写道："他们强加给这些国家一种人为的经济，这是现实经济情况无法承受的……"

新的波兰六年计划的基本特征，是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开始按照苏联的榜样建设重工业，从而吞噬了巨额资金。当然，重工业是需要的。但是，这种发展重工业的方式大大加剧了波兰经济中比例失调的现象，特别是重工业和生产一般消费品的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工业建设一直不是遵循首先使用波兰原料的原则。例如，在克拉科夫地区建设了大型的"诺瓦胡塔"钢铁厂，而矿石则要从克里沃洛格，从苏联运来。

在波兰，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49 年投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四，1955 年增至百分之二十点六。对于一个经受了战争严重破坏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由于大部分投资是用于重工业，牺牲了一般消费品的生产，于是导致了后者生产的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每一个国家在自己的发展中，都需要首先经过一段工业化的困难时期，以及伴随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中央集权化。问题只是在于，这个时期需要延续多久，工人阶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忍受这一点，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由于实现工业化而形成的比例失调现象。

这个时期，斯大林主义具有最大欺骗性的行径之一，是在苏联称为"斯达汉诺夫运动"（以矿工斯达汉诺夫的名字命名

的)，而在其它国家称为突击队员运动。突出个别人物，让他们在特殊条件下工作，并在生产中获得难以置信的成绩，以此来形成一支劳动尖兵队伍，让这些为宣传目的服务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工人阶级，来鼓励其他工人更好地工作，利用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和美好未来的真诚信念，使人的个性及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发生某种变异。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过了多年之后，波兰导演安捷依·瓦依达拍摄了一部极其精彩的影片，名叫《大理石人》。

如果可以说那种经济计划和经济关系都是强加于人（这在那个时期是很典型的）的话，那末，与此同时，相应的政治制度、政权体制、工作方法、宣传方式等等，也都是强加于人的。

那个时期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情况，仅仅作过局部的研究和科学的探讨。关于这些情况，有待历史作出回答。实际上，当时业已发展、生根和融入生活的一切事物，后来都是用诸如“斯大林主义”、“个人迷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违背列宁的原则”、“官僚主义的畸形”等等概念来加以说明的。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对这一切还会开展许多讨论。

实践将表明，战胜法西斯以后，开始在一系列国家建立的那种制度，与其说是确立了社会主义，不如说它将导致严重地损害社会主义的声誉。一套政治和经济的模式也是这样地强加给波兰了。这种模式不是产生于波兰的社会本质、波兰的历史发展、人民的传统、波兰工人阶级迄至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实际内容，而是来自斯大林设想出来的一整套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千方百计地限制民主自由和人民

的自由，而臃肿的国家机构、特别是庞大的保安部门则无法无天、肆意妄为，许多人被逮捕、受刑讯，有的人被杀害，到处散播着恐惧和猜疑的种子。

按照传统作为最高代议制机构的议会，其作用简化到几乎成了一种形式。一切大权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更确切地说，是掌握在由政府总理和副总理组成的主席团手里。副总理作为这个极其狭小的政治领导集团的成员，分别领导着某几个部门，这些部门的部长都直接听命于他们，在工作中没有多少独立性。

不是议会，而是国务委员会进行立法活动，而这类立法活动又大多简化为通过法令。

在军队和政治核心中对干部进行清洗，最先受到打击的是参加过西班牙战争的战士，随后轮到在波兰本土战斗过的游击队员，以及许多已经包括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它政党里面的原社会党成员。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担任了波兰的国防部长。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将领，是波兰血统。

工会的作用归结为拥护政府的法令。它甚至还承担了这样一些工作：采取惩罚性的纪律措施，限制工人物质上的权利，促使工人遵守劳动纪律，等等。于是，这个组织在工人眼里开始失去了任何威望。

同天主教教会的关系尖锐化了。勒令斯特凡·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暂时停职。将他赶进了一所修道院，由一个适应制度的人担任了教会的首领。于是，出现了一种不谋而合的情况：原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和原天主教教会首领维辛斯基，

同时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

然而，在居民中间本来已经有着很大影响的教会，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更高的威望。教会巧妙地利用了强加给它的形势，几乎成了社会上道德和人道主义的唯一体现者。

在文化和艺术生活中，硬把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唯一方针，使真正的创作变得不伦不类。对于波兰文化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波兰在艺术的所有领域中，都有悠久的传统和卓绝的成就。很难设想，它如此发达的文化会被束缚在“无冲突社会”的模式里，会去专门反映和歌颂“正面的英雄”。

波兰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它的整个特有的社会本质、它的全部特征、它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都要安放在这种制度的普罗克鲁斯特床上①。这既不适合波兰的躯体，也不适合它的气质。

这个时期象征性的反映，就是华沙的部分建筑物，如文化宫、宪法广场等等。它们的形式同华沙城市结构、居民生活方式、人们的习惯和要求丝毫不相协调。它们今天是，而且今后也将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物。在那个时代，虚浮的宏伟和枯燥乏味，与生活的需要格格不入。

斯大林化的后果

在生活中，斯大林化的后果：一方面，反映在庞大的官僚

① 普罗克鲁斯特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过路人躺在他的一张床上，比床长的就砍去其足，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译者

机构的滋长上，它日益脱离群众和他们的实际要求，并且按其固有的某种逻辑来说，它就是以自身的存在为目的的，尤其是，这些机构本身日益畸形，变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累赘；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对官僚主义的畸形和斯大林主义的生活准则日益增强的反抗，特别是在斯大林死后，这种反抗开始强化和扩大了。这时，苏联本身的冰块开始逐渐消融，卸掉了它的粗大的鞭子和沉重的枷锁。例如，释放被捕的医生，大赦关押了多年的囚犯等等。

波兰的城市居民对于贫困越来越难以忍受，为了食品排长队，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从1939年国家被占领以来，人民就忍受着日益深重的灾难、损失和生活的贫困。现在，战争结束十年之后，却要他们同样地忍受，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

大吹大擂、歪曲现实、粉饰太平的国家宣传，使人们感到特别反感。然而，最使人们感到沉重的，是在波兰社会上迅速巩固起来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这副重担。这个社会过去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缺乏深厚的民主传统，而官僚制度和等级关系却已形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渗透到各个时期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

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个人迷信”体制，在波兰如同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已经全面发展起来，而且渗透到社会的最基层单位。在官僚等级阶梯的每一级台阶上，站立着权势的体现者，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敢干，决定着一切，并在他管辖的地区领导一切。不论他是否有知识，是否有才能及其它特长，他都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这个体制框住了人们的头脑，构成了党和国家机关大批工作人员思想方法的模式，也构成

了广大党员思想方法的模式。一种职业官僚形成了，无论是谁的意见，无论是什么样的批评，都约束不了他们。

尽管波兰人认识社会的方式本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种体制的毒害，但这种体制仍然得到了充分的确认，特权制度由此而加强了。因为，等级制度阶梯的每一个位置，都是同合法地获得一定的物质权利相联系的，从使用汽车、获得特殊的住房，到派给服务人员、参加出国代表团等等。

对于这一切，人们都进行了自发的抵制。这反映在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生活的表面形式表示冷漠，感到回到家庭的小天地或宗教的传统上来才更有价值。但是，也有公开提出批评的。那个时期也流传着某些“黑色幽默”①，这种“黑色幽默”在形式上具有波兰的特点。

无疑地，波兰舆论界的气氛究竟还是不同于阵营内的其它国家，因为在波兰还没有对党的领导人提出骇人听闻的政治诉讼，那种斯大林主义式的迫害，还没有能够采取最剧烈、最丑恶的形式。例如，在保加利亚发生了特拉依契·科斯托夫案件，在匈牙利发生了拉斯洛·拉伊克案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卢道夫·斯兰斯基案件，在阿尔巴尼亚发生了科奇·佐泽案件，而在波兰没有发生这样恐怖的政治诉讼案。在波兰对高级军官确实进行过若干次审讯。这是为了通过审讯来为哥穆尔卡和斯彼哈尔斯基的诉讼案准备材料，也是由于主观臆断地认定在军队和国家机关渗入了敌对势力。然而，由于考虑到那样做将更加激怒公众舆论，这一诉讼案才没

① 指政治笑话。——译者

有进行下去。在舆论界，从某种角度已经感觉到越来越明显的不满情绪。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反响

社会上的气氛和情绪，即使是对党的领导层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在他们中间逐渐开始出现了某种分歧，尽管这种情况出现得比较晚。在1955年1月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三中全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改变领导工作的必要性，而且通过了“关于充分尊重党的生活中的列宁主义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的决议。

可见，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波兰并没有特别着力于真正意义上的非斯大林化。斯大林是1953年去世的，而可以看作是党的工作发生变化的“先兆”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三中全会，却到1955年初才召开。在这方面，普遍可以看到一种有趣的、而且多少有点反常的情况。1948年以后，东欧国家的斯大林化和官僚主义化，是由苏联推行和强加的。而当苏联本身的气候开始改变时，解冻之风却很难吹进这些国家。这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加以解释：在那些年代，每一个国家的官僚机构都已经成长起来，而且根深蒂固。这种官僚机构本身的逻辑和力量，已经把社会上的首创精神压制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需要发生某种重大事件来更快地推动非斯大林化的进程……

在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对政治局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要求确立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正常关系，即重大的

决定不能在一个狭小的领导集团中作出。全会特别讨论了保安部门的工作，作出了改组保安部门的决定，撤消了领导保安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拉德凯维奇的职务，成立了社会安全特别委员会，希望以此表明在党内存在着能够建立社会关系正常化、恢复生活中最基本的法制的积极因素。在苏联清除了贝利亚（由于大量的非法行径和罪恶而受到谴责并被处死）之后，这是以波兰的方式卸掉了被斯大林主义加上的镣铐。

三中全会精神使公共舆论和社会生活中的气氛发生了急剧变化。城市居民开始表现出较大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为自身开辟了道路，回到了大街上，回到了公共生活中，尽管到处尚笼罩着小心谨慎的气氛。传来了释放一批被囚禁、被审讯的无辜的人们的消息(到 1956 年为止，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释放了三千二百八十一人)。

在这整个过程中，任何事情都不是顺利地、轻而易举地就能做到的，每走一步都要作出努力，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和限制。

1956 年 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就象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对于加速波兰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就阵营内部整个气候的变化，还是就整个国际关系来说，这都是一个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事件。赫鲁晓夫《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产生了特别大的反响。这个报告大胆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变态和专横，有力地谴责了对社会主义法制和党的民主的最基本原则的践踏，为在苏联迅速消除斯大林式的实践开辟了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唤醒和激励社会主义国家的

民主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全世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是，它的真正的价值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确实加速了对积累下来的矛盾的解决，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一进程具有爆炸性。

在波兰，这时开始在公共场所、集会上、报刊上出现了更加大胆的批评。在华沙古城堡组成了名为“曲环”的辩论俱乐部(以它所在街道命名)。俱乐部里开始聚集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对有关社会形势、创作自由、生活民主化等问题进行了生动活泼的讨论。大学生的《直言》报摆脱了陈词滥调和严格的书刊检查所加与的限制，成了非常重要的、脍炙人口的论坛。它大胆地反映实际情况和波兰公众舆论的意愿，对社会气候的变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在这种变革的良好气氛中，党和国家领导层中间那种人为促成的团结一致也被打破了。在高级领导人中间，有些人感到了变革的气候，认为党应该采取主动。他们的力量得到了加强，而那些带着“顽石般”脑袋的人，则认为任何变革和对某种新事物的企求，都具有动摇制度的危险，都意味着对波兰社会主义的威胁。

波兹南街头的鲜血

“灼热的波兰夏天”是从1956年6月开始的。这个月意味着波兰社会紧张局势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并且表明了非斯大林化有自己的高潮和低潮、冲锋和退却，而且要付出

人的生命作为代价。正是在这个月，发生了工人骚动，导致了流血的所谓波兹南事件。

这个悲剧性事件的起因是工人代表团从“切卡尔斯基”工厂走出来，要求向地方政权（后来又要求向中央政府）申述工人的问题和愿望。正象工人们所估计的那样，打算举行谈判的代表团没有被接见，政府无意听取工人们的要求和愿望。这激怒了工厂的全体职工，于是工人们走上波兹南街头，举行示威。波兹南人一般地说是安分的、讲道理的、守纪律的人，并不十分倾向于造反和抗议，而这次的愤怒实在是异常强烈。

可是，大街上出现了保安部门的警戒线，他们要立刻整顿秩序。对于那个时候还抱有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的概念和观点的人来说，根本没有想到工人阶级会起来反对自己的工人政权，甚至还走上街头。

发生了严重冲突，流了血。于是愤怒的工人们武装了起来，在保安部大楼对面的公园里修筑了避弹壕，而保安部的工作人员则在大楼里面固守。

射击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数十名工人被打死，一百多人受伤。

这一后来被称之为“波兹南的黑暗星期四”表明，长期积压在工人阶级心头的愤怒爆发出来了，他们要明确地告诉党：“够了！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工人们要求回答使他们苦恼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打算给予他们回答。如果带着全部事实真相走到工人面前，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概工人就不致于走上街头，无论如何也不会拿起武器。然而，党的领导人长期脱离工人

阶级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对于他们的要求无动于衷，以为工人们会理解他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情况。党的领导人不去直接同工人谈判，却派出了保安部门的武装力量，还专门出动了军队。

这是一次最大的失败。在遭到这次失败以后，党应当作出抉择，或者是加剧同工人的冲突，或者是改变政策。

党决定走后一条道路，这首先是由于领导层中有这样一些干部，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社会矛盾，而且敢于面对事实真相。

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波兰，在全世界产生了反响。在国内，抗议和抵制的浪潮遍及各个阶层。

波兹南事件加深了党内和领导层内部的危机。现在已经不再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间的讨论和批评，而是工人阶级直接的、积极的行动，他们要求解决社会上堆积如山的问题。工人阶级毕竟不同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差别是根本性的。早在十九世纪末，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波兰社会学创始人鲁德维克·克希维茨基，就曾经把现代工厂看作新人的发源地，看作当代新型英雄的发源地。他写道："工厂工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英雄主义！"

波兹南的冲突，说明了为什么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必须直接从改组保安部门开始。这些保安部门是官僚制度的最突出、最危险的保护者，它们采取特殊的暴力方式，压制群众并使他们就范和屈从。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就更清楚地懂得，为什么首先应该惩处苏联的贝利亚及其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同行。他们是斯大林主义的化身，没有他们，这个体制就没有

统治力量。

召回哥穆尔卡

1956年7月，拖延了一段时间(据说是由于在领导成员中难于商定统一的立场)之后，在华沙举行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全会由新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奥哈布主持，因为博·贝鲁特在这段时间内去世。在这次全会上，作出了党对波兹南事件的第一次评价。会议指出，波兹南事件首先是波兰社会存在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同时又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某些敌对分子利用了这个事件或者是可能利用了这个事件。

全会对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工人阶级的不满有着深刻的根源，并在这个意义上作出了应当扩大工人阶级权利的决定。实际上，这个决定只是以一定的方式尊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各个工厂里，现在又重新开始自发地组织起工人委员会。同时，全会还决定扩大地方政权机构的职权范围，议会也重新活跃起来。

在中央全会上，曾提出过应召回在这期间已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哥穆尔卡，让他回到中央委员会。但是，当时并没有审理这个问题，而只是撤消了1948年作出的把他开除出党的决定。

所有这些决定，尽管多多少少反映了社会上的新形势，但并不表明党的领导层内部的统一，相反地明显存在着分歧。包括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在内的一批人，要求在党内和社会

上进行认真的改革，而人数较少的另一批人，则站在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地与前者对立，而属于动摇的、“温和派”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种分歧虽然未能妨碍通过新的决议，但实施决议却变得十分困难。说过了、决定了的事情，要付诸实现极其困难和缓慢。不仅在中央，就是在全国各地的党的领导人中间，也是要求实行“有控制的民主化”的人占优势，就是说，接受工作上的某些民主的方式方法，但必须以不致威胁到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的本质因素为限度。

在社会上，紧张局势还在继续发展，领导班子的更换已迫在眉睫，因为情况已经很清楚，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严肃认真地办成任何事情。

华沙犹如一座锅炉在沸腾，那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工人们则激动和愤怒。华沙市党委会决定改组，因而华沙党组织对于为即将召开的八中全会创造气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某些工厂，工人自治的思想、主张又重新活跃起来。华沙“热兰”汽车厂党委会（书记是一位年轻工人列霍斯拉夫·哥什迪克），要求更大地发挥工人的作用，并发起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气氛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需要有一个人来指明方向，并且说：“前进！”

在这种疾风迅雷、具有爆炸性的形势下，传来了哥穆尔卡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消息，这预示着他即将返回政治生活。

显然，已经有更多的领导人感到危机需要解决，希望党对此指明方向，定下调子。很清楚，必须在上层来一个改变……。

选择落到了哥穆尔卡头上，因为他本人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是从前党的总书记，在创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人们清楚地了解他的立场和观点。在领导人中间，与其他较少为人所知、较少受到欢迎的人相比较，他是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

可是，哥穆尔卡已经多年脱离政治生活，他不是从当前的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这个运动已经遍及全国，无法遏制，并且渴求普遍的民主化。不过，他也不是这个运动的异己者，因为他自己身受斯大林主义之害，仍然能够比某些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一运动所传来的信息。于是，就达成了一个自发的、主要是对于一切人都可以接受的协定：哥穆尔卡不仅回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委托他领导全党。

四、波兰十月的希望和现实

这些日子，全国的眼睛都望着华沙，因为在那里即将召开八中全会。预计在全会上将对许多令人焦虑的、刻不容缓的问题作出回答。

全会在1956年10月19日正式开幕。会议一开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爱德华·奥哈布马上提出建议：由全会自行增选瓦·哥穆尔卡、马·斯彼哈尔斯基、泽·克利什科和伊格纳吉—洛加·索文斯基等斯大林式清洗的牺牲者进入中央委员会。

同时，奥哈布还宣布，这天早晨，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飞抵华沙机场，代表团成员有：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奥哈布建议全会暂停，由政治局全体成员加上哥穆尔卡一起同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谈判之后全会再继续进行。由于事态的这种发展而异常激动的中央委员们，接受了奥哈布的建议，委托政治局同苏联代表团谈判。当时已经传闻，赫鲁晓夫得知全会将作出决定之后，非常生气；此外，关于苏联军队向华沙调动的消息也迅速传播开来。

形势看来确实有些反常，赫鲁晓夫推动了非斯大林化的进程，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大量的罪行，1955年曾经到贝尔格莱德实现了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现在却跑到华沙来，对于波兰发生的事情满

腹猜疑。

其实，这里一点反常的情况也没有。在苏联发生的变化还仅仅是开始，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从直接经验出发的，几乎仅限于涉及它的表面现象，仅限于列举“非法的事件”和大批的“人们悲剧性的命运”，还来不及把“个人迷信”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因而，在苏联领导人中间，对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还不可能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那些抵制改变现状的势力也仍然留在苏联领导层中间，来到华沙的代表团的组成就说明了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属于保守势力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就在代表团里面。事实上，他们在下一年就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员被撤消了领导职务。

同苏联代表团的谈判是十分艰巨的。据说，赫鲁晓夫刚一瞅见波兰人就叫喊起来：“你们这里在干什么?”接着便喷出一连串道地的男子汉说的粗话。

显然，苏联领导人对于波兰事态的发展感到意外，认为波兰人走得太远了。因此提出，必须保证控制事态的发展。

波兰代表团作出极大努力，以使苏联代表团相信，波兰不会作出任何有损于苏联和整个阵营的事情，波兰人能够自己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消除积累下来的、在社会上引起严重后果的不正常状态。他们注意到国家已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以致领导上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局势，使之不再进一步恶化。波兰人建议，中央全会之后，最高级代表团将立即去莫斯科，将全部情况告知苏联领导人，届时将达成有关继续合作的一切必要的协议。

谈判从10月19日上午一直进行到10月20日清晨，苏联代表团终于平静下来，并在商妥之后登上飞机就返回莫斯科去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全会在非比寻常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首先由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向中央委员们报告同苏联代表团谈判的情况。

萨瓦茨基说："苏联同志突然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其中有的你们已经知道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深切关注波兰局势的发展。他们说，他们想要同我们一起讨论这一局势今后的发展方向，并且想了解我们的观点。其中特别引起他们不安的是各种形式的反苏宣传的发展，而我们没有对这种宣传加以反对，或者反对得不够。苏联同志把所有这一切都同我们国内形势及其发展联系起来，特别是同波苏关系、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党的合作联系起来，以及同整个国际形势联系起来……。谈到我们这里的反苏宣传时，他们向我们列举了引自我们报刊的词句和例子……。苏联同志对于将要由八中全会通过的我们领导成员新的组成方案也很感兴趣。他们指出，所建议的领导成员的组成方案已经尽人皆知，可是同我们有着密切联系的苏联同志，却没有被告知这回事。总之，他们认为在最近一段时期双方没有足够的接触，有关波兰的形势及其发展情况没有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谈到关于领导成员的组成方案时，我想指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我们党和党中央的内部事务来加以研究的。讨论是按党性、原则性进行的，有时双方都很热烈，但无疑已很好地把情况

解释清楚了……，我们尽量使苏联同志平静下来……。我们尽力向苏联同志说明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民主化过程、它的实质、它的意义，说明不存在倒退的可能性。我们还告诉他们，全会将把这个问题作为主要问题予以研究。这就是党和它的领导人如何比迄今更为有效地走在民主化运动的前列，领导运动，使运动符合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①

萨瓦茨基通知中央全会，已经商定波兰代表团要在这次会议之后立即访问莫斯科。由双方领导人就进一步合作的问题进行磋商。

中央委员们鸦雀无声地听取了萨瓦茨基的报告，报告未经任何讨论就通过了。

随后，中央委员斯塔莱维奇接着发言并提出问题：

“同志们！昨天在同苏共代表团进行那次困难的、非常重要的谈判时，一支军队在我们国土上朝华沙方向调动。我不是搞军事工作的，不知道详细情形，但是我从关心军队在国内的调动情况的同志那里知道，出现了若干朝华沙方向推进的坦克部队，苏联军队在我们的西部边境和弗罗茨瓦夫区也有某些调动。我想问一下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同志，你为了什么目的调动军队？根据谁的命令？这是政治局的决定，还是政府或者国防部的决定？还有，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否考虑到这将会引起什么样的政治后果？会在华沙引起怎样的不安？或者，会在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军队之间引起什么样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速记记录。《新路》，1957年10月。

的误会？这可能还会产生国际反响！”

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回答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知道，现在正是军队进行战术演习的时候，因为连、营、团的演习已经结束了。现在师正在演习场进行演习，也在演习场以外进行演习（因为演习场太小）。这是每年都进行的，从未引起过任何不安。为特殊目的部分调动军队，政治局是知道的，这样作是鉴于波兹南事件的教训。至于说苏联军队，我已经从政治局接受任务要对此加以解释，因为有某些部队调动的消息。事实上，苏联军队是进行了调动，在部署有苏联军队的地区进行演习，他们朝着比得哥煦方向和罗兹方向移动。因此，按照政治局的指示，我已通知指挥这一演习的科涅夫元帅，停止把北方的军队调往东方，让他们返回自己的驻地。这就是一切！”①

正象人们所看到的，军队进行了调动；另一方面，在华沙的工厂里也有很多武装的工人。形势一度是危险的，只是有赖于理智的态度和双方都没有贸然从事，才防止了导致同一个秋天在匈牙利所发生的事情。在匈牙利，苏联军队是用坦克来维持秩序的。

哥穆尔卡的报告

八中全会在继续进行。哥穆尔卡事前已知悉七中全会的立场和决议。他作了纲领性报告，在报告中，对斯大林主义时

①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速记记录。《新路》，1957年10月。

期，对领导人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了纠正错误、树立党和政府的另一种工作作风的方向。

哥穆尔卡在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中，发生过很多不幸的事情。在某些生活领域里，那个时期给党、工人阶级和人民遗留下来的问题，比我们所担心的还要多……"

他详细地分析了经济情况，列举了丰富的材料，说明某些经济部门的生产是下降和倒退了。例如，据哥穆尔卡所说，按职工人数计算的煤产量1955年与1949年相比减少了百分之十二点四，而与1938年相比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六。他批评了六年计划规定建设的某些项目，例如"热兰"汽车厂。它生产的是在技术上已经过时的苏联"胜利"牌汽车。这只是在形式上提高了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

哥穆尔卡坦率地谈到了居民供应方面极其困难的状况，尖锐地批评了农村政策。他特别着重于分析价格政策，以保证将来更好地尊重价值规律。他要求每一个企业都能够真正地而不是虚假地遵循经济核算原则。

在评价波兹南事件的时候，哥穆尔卡说：

"波兹南的工人们走上街头并不是反对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社会主义。他们是反对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广泛发展起来的、使他们身受其害的坏现象。他们是反对歪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社会主义是他们的主张……。企图把这一不幸的悲剧看作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挑拨者的活动，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的。当然，间谍和挑拨者一直是存在着的，并且在进行活动。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都不可能左右工人阶级的立场。如果间谍和挑拨者能够迫使工人阶

级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那末波兰的敌人的任务也太轻而易举了。问题在于恰好不是那样……。在战后的波兰曾有过一个时期，真正的敌对势力曾经拥有广泛分布的地下组织。在那段时期，我们党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党员……。在战后初期的岁月里，波兰人民共和国确实经历过这样严酷的时期。但是，即使在那样困难的时刻，任何间谍、任何敌人的组织，都没有能够使工人阶级的队伍发生分裂，没有能够控制任何一部分工人阶级……。波兹南的悲剧和整个工人阶级深为不满的根源在于我们，在于党的领导，在于政府。易燃的材料已经积累了若干年，曾经大肆吹嘘为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新阶段的六年计划，却带来了生活水平的下降。用玩弄数字游戏来说明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提高百分之二十七，这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更加激怒了人们。”

哥穆尔卡提出，当前一段时期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如何使工人作为直接生产者关心提高生产，更好地劳动。行政的压力、威胁、以及惩罚收效甚微，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哥穆尔卡要求推行经济刺激。他甚至走得如此之远：建议拨出一部分超计划开采的煤给煤矿工人集体，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支配这些煤，国家可以按市场价格收购这部分煤，也允许工人集体用这些煤交换其它的、工人所需要的商品，包括建筑材料和进口商品，工人们应当自己决定怎样支配这部分属于他们自己的产品。

人们怀着特殊的兴趣听取了哥穆尔卡的以下一段话，这段话表明了他自己对于实行工人自治的首创精神的态度。

他说：“应该欢迎工人阶级为改善工业管理、为工人参加

他们的企业管理所表现出的首创精神，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说明工人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的、根本的信任。经济机构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应该在能够建立所建议的形式的地方，尽力支持工人的首创精神。但是，全面的实践还是应当逐步地进行……”

后来的情况表明，哥穆尔卡对待建立工人委员会的自发运动的态度，实际上是有很大保留的。但是，在当时，在“来自下面”的压力下，他支持了工人们的首创精神。

转折和期待

八中全会的决议和哥穆尔卡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举国上下感到轻松和兴奋。从华沙到最小的村庄，到处都使人感到，整个波兰犹如恶梦初醒，重见光明。“波兰的十月”在人们中间传颂，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频频不断地加以报道，舆论界充满了欢快的情绪。唱出了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新的歌曲，舞会上第一次奏出了爵士乐和摇摆舞曲。人们的穿着也有了变化，尽管这方面的可能性还不是特别大，因为纺织品的短缺还十分尖锐。恢复了华沙的咖啡馆，剧院开始上演新的、过去不知名的作者编写的讽刺剧。

哥穆尔卡成了全国注意的中心，人们把对未来的一切希望系之于他一人。他获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充分的、政治上的信任。除了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以外，每个人都相信，波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那么坦直易行，然而它将不会辜负劳动人民的期望。

1957年1月进行了新的议会选举。这是哥穆尔卡和十月方针的一次新的胜利。这一次和过去不同，每一个议席的候选人人数必须多一些。这样，选民们真正得以确定自己所要选的人。这也说明开始采用新的、民主的方式进行选举，放弃了旧的作法。过去选民们只是去确认一下预先制定好的议员名单。此外，现在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以及最大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协商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提名候选人。

参加选举的选民达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人们看到选举站的出口处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形式的压力。这引起了真正良好的反应。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选民投票选举人民统一阵线的候选人。这也是对"十月方针"的巨大支持。在所有候选人中间，得票最多的是哥穆尔卡，他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四的选票。这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群众信任党的政策的证明，因为他将是这种政策的体现者。

按党派归属计算的被选进议会的议员人数如下：

波兰统一工人党	239名
统一农民党	118名
民主党	39名
无党派人士	63名

在这一次新式的选举中，天主教教会也采取了特殊的态度。它支持这次选举。以维辛斯基（他已被释放并恢复了原来的神职）为首的主教团，号召教徒们到选举站去，在许多地方，神甫们率领自己的教民到投票地点。在当选的无党派议员中间，有十二名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议会中组成了

称作“标志”的天主教议员俱乐部。

这次选举，从它所处的条件来看，实际上是波兰人民的一次特殊的公民投票，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表达工人阶级和人民充分信任的公民投票，把国家的命运交付给了新的领导和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十月方针”的光辉和阴影

在波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社会上温度升高、情绪极度不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是很自然的。斯大林主义时期对于波兰人民来说是太沉重、太痛苦了，从而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烈地期望改变现状。

然而，“错误和歪曲的时期”所带来的后果已经根深蒂固，并不那么容易消除。官僚主义的关系、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的僵化、脱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特权、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都已经极度地渗透到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习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之中。因此，迅速地、彻底地实现“十月方针”，并不象舆论界所期待的那么容易。波兰向前推进了，但是还要以足够的力量排除一切障碍。

然而，尽管有困难，波兰仍然开始了新的纪元。新纪元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带来了在波兰国家和波兰社会的发展中毋庸置疑的成就。在对领导方法作了一定的改进和人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之后，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城市活跃起来了，建筑形式开始起变化，华沙正在成为一座生气勃勃的现代化欧洲城市。人们希望有更多的商品、更多的住宅、更多

的旅游活动、更多的自由。看来这一切已接近于实现了。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感到有了民主化的新风，例如，新的议会现在完全不同于1956年时的情况，在举行会议的时候开始进行真正的、议会式的辩论，议员们在辩论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转达选民的愿望。一年之内，议会通过了三十多项法案，这还不包括其它一些决议。在议会闭幕期间，国务委员会只颁布了一项法令。而过去这方面的情况完全相反，1955年议会只通过一项法案，而国务委员会则颁布了二十六项法令。

这表明立法活动又回到了议会。

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对于国内情况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过去一段时期，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均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两国之间缔结的经济协定明显地不利于波兰。在一系列这样的协定和协议中，有个协定规定：波兰要参加德国对苏联的综合性赔款，作为对于一部分赔款的抵偿，波兰必须按专门规定的低价向苏联出口煤炭。对于波兰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此，波兰人曾试图争取作某种改变。后来提供煤的定额减少了一些，但价格仍保持不变。一直到1953年，这项已经成为无法忍受的协定才停止生效。那时流传着一个华沙的"黑色幽默"："我们给他们白糖，他们却拿走我们的煤炭。"

诚然，波兰从苏联得到了贷款，用以支付苏联的原料和实现六年计划的成套设备。这笔贷款的总额在当时折合为十亿美元左右。1950年4月，又得到一笔新的四亿五千万美元的补充贷款。这些贷款把波兰置于一种大债户的境地，同时还

造成了对苏联的原料和设备的严重依赖，使波兰完全靠苏联提供大部分铁矿石、石油、棉花、铜等等来满足自己需要。1956年 11 月 1 日的账面余额表明，波兰尚欠苏联五亿美元的债款。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以后，进行了关于经济关系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谈判，导致了相当重要的变化。1956 年 11 月 18 日签署了新的波苏共同声明，声明郑重宣告：将在平等、不干涉内政、相互协商的基础上发展两国之间的关系。声明确立了政治关系的新准则，同时也确立了经济合作的新原则，取消了五亿美元的债务，作为补偿波兰经济在 1946—1953 年期间，由于按极低的价格向苏联提供煤炭而遭受的损失。还达成了一系列其它协议，其中有：关于苏联经波兰过境运输的协议；苏联答应以贷款方式（将近一亿美元）向波兰提供一百四十万吨粮食，1960年后开始偿还；波兰还以同样方式得到新的两笔用于购买苏联原料和装备的贷款。

除了政治和经济关系外，这项共同声明还宣布了某些其它的对于波兰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双方商定，驻防在波兰的华沙条约范围内的苏联军队的临时性逗留，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波兰的主权完整，这些军队的驻扎、调动、演习，应该由双方政府通过协商作出规定。

通过这项共同声明还解决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即把战后划归苏联的那些地区的居民遣送回国。根据协定，这些居民大部分在 1956 年和 1957 年迁回波兰，主要是迁移到靠近弗罗茨瓦夫和奥波莱的西部地区。

所有这些问题的顺利解决，大大地缓和了波兰公众的情

绪，加深了两国之间的了解，为既在双边关系，又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正常的、全面的、平等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波兰领导政策的新动向，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改善了波兰在国际上的形象。波兰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出各种倡议，致力于缓和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从而成为一个十分关心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合作的国家。例如，命名为"腊帕茨基计划"（腊帕茨基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的著名倡议，主张在中欧建立无原子区，不管这个计划本身的现实性如何，它在世界上还是引起了很大兴趣。后来，又在类似的问题上提出所谓"哥穆尔卡计划"。波兰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代表也越来越多地提出各种倡议。

在阵营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系上，哥穆尔卡也冀望摆脱过去的一套公式，表现出要尽量独立一些，自由一些。例如，在最初一段时期，当苏联同中国的关系尚且良好的时候，他常常在讲完话以后高呼："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万岁！"

文艺领域的新风

在"波兰的十月"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以新旧交替为标志，新的在不可遏制地冲出来，旧的在顽强地抵挡和支撑。

经济和治政生活无疑已经活跃起来了。与此同时，在文化、艺术、科学和整个公共生活中，也感觉到了一股清新的风。作家们象是好容易等到机会竞相出版自己的新著，剧院经常演出新剧，新流派的浪潮也波及到造型艺术。出现了"波兰电

影学派"的第一批主角演员，他们在以后一些年份中为波兰电影争得了世界声誉。

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这样一些作品，如卡齐米日·布兰迪斯的《克罗尔兄弟的母亲》、耶日·安捷耶夫斯基的《黑暗笼罩着大地》、罗曼·布拉特尼的《当机立断》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现代题材内容的作品，力图反映斯大林主义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命运。

在诗歌方面，也出现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诗人，其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有阿·鲁德尼茨基和特·鲁热维奇。

在克拉科夫的《横断面》周刊上，出现了颇有才华的青年讽刺作家斯瓦沃米尔·姆罗热克的作品。他的第一部著作《大象》在波兰引起极大兴趣。后来他又写了一组讽刺剧，如《警察》、《在公海上》等等。他的作品无疑获得了最大的讽刺效果。当时，他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更广泛的地区都很出名。

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同样有了很大的发展。文艺批评家在认真地评论上述某些文学作品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作品中是否真正进行了同斯大林主义的直接对话。讨论进而转入更广泛的方面，并且提出了涉及文学在波兰的地位的新课题。阿杜尔·桑道威尔的文章《没有优惠税率》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在文章中批评了一系列的波兰作家及其作品，提出了波兰文学界的某些基本问题。在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中甚至提出："要把桑道威尔烧死吗？"

许多人不满意布兰迪斯在其长篇小说《克罗尔兄弟的母亲》中对斯大林主义时期的描写。一位青年批评家写道："法国人翻译了《克罗尔兄弟的母亲》。这并不说明它写得好。它

对于法国人来说只是文献记录。我们给予欧洲的是历史文献，而不是文学。”

对于其它作品也进行了类似的讨论，例如，讨论了耶日·布罗什凯维奇的剧本《当权人物》。

辩论俱乐部、大学生剧场、新的报纸和杂志——所有这一切，在十月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给生活和人们的行为举止增添了全新的色彩。

在社会科学方面，波兰的社会学特别活跃而引人注目。战前，波兰的社会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克希维茨基、兹纳涅茨基、哈拉申斯基等人），而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几乎完全销声匿迹，现在社会学又重新回到了大学的课堂。除了老哈拉申斯基以外，又有一些专家、教授继承了它的传统。他们是：奥索夫斯基、霍赫菲尔德、扬·什切潘斯基。扬·什切潘斯基的文章《诊断的尝试》引起了人们巨大的兴趣。这是一篇学术论文，它奋力确定波兰社会畸形的社会学概念。

什切潘斯基教授的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广泛的讨论。议会的一位议员宣称，这是一年来在波兰写出的最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什切潘斯基试图说明社会生活中混乱现象的原因。这种混乱现象突出地表现为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盗窃成风、酗酒成癖、擅离职守、流氓行为、破坏法制，等等。究其原因，什切潘斯基提出了以下几点想法：第一，历史条件导致人们的心理平衡遭到破坏；第二，使社会整体化的非形式上的联系被抛弃了；第三，体制在形式上的组织（机构、团体）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第四，政权的结构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执行其决定的方法不适当；第五，由于上述原因，历史形成的波兰人

性格的某些消极的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此外，什切潘斯基还写道："应当说，近几十年的历史是给波兰人民带来了过多的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常现象的成因。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失业、输掉了1939年的对德战争、华沙起义的失败、国家解放后的各种悲剧、对六年计划的失望、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些只是肯定会对人们的心理平衡产生不良影响的某些现象……。使人们不易理解的是另一些现象……。当人们把他们已经有的东西同按照他们的想法认为可能有或应该有的东西不断地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反常。无疑，把我们的条件同其它国家的条件经常进行比较，就往往带有一种病态的性质。这种病态对于反常来说是典型的……"

"我认为，在波兰的困难中，经济因素并不起最主要作用。困难首先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性质。许多这一类的困难，即使没有大量的贷款和投资，也有可能加以克服。克服的方法是改进各种机构和政权机关的工作，发挥其它一些社会团体的职能。政权过多的、拥有相互交叉职能的领导机构，造成了它们相互推脱责任的可能性……。居民们往往不知道该由哪一级政权解决他们的问题。政权机构极其复杂，而且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断发展和扩大，犹如一座可怕的迷宫，进到里面就很难找到出路……。政权机构无能和缺乏效率，以及由于这些机构是组织社会的唯一正式机构而带来了更大的损失。由于种种原因，不允许成立自愿的公民团体和协会来解决自己的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甚至经济的问题。缺乏这种自愿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无能，就抑制和分散了社会力量，导致了社会纪律的涣散和居民的不适当的行为举

止……"①

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几乎是奄奄一息的电影界，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安捷依·瓦依达的电影《下水道》，被当作具有全国意义的头等大事而受到欢迎。这部影片第一次用电影的语言表现1944年夏天华沙起义的英雄主义和悲惨结局。对于参加过起义或者有亲人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华沙人来说，观看这部电影是一个令人异常激动的时刻。因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华沙起义是一个忌讳的主题。

瓦依达实际上是把这部影片包括在自己的三部曲之内的。他的三部曲是：《一代人》、《下水道》、《灰和金刚钻》。这三部曲充满激情、感人肺腑、惊心动魄的画面，表现出一代人所经历过的战斗和牺牲，华沙起义和战后初期的悲剧性的内部冲突。

除了瓦依达以外，还出现了一大批人材，他们今后将作为波兰电影学派的主角载入电影史册，并且将使波兰电影闻名于全世界。

安捷依·蒙克是杰出的艺术家和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是瓦依达的对立派。他主张少一些激情，多一些思想，试图以自己的每部影片来传达某种信息、来鞭笞某些恶行、惩治某些社会上和精神上的病症。这种影片是讽刺性的，然而是严肃的，也多少带有一点悲剧性色彩。他留下了几部令人难忘的影片，例如：《小茅屋里的人》、《爱洛依卡》、《斜视的幸福》。不幸的是，由于过度紧张地创作，他去世了。他没有能够完成影片

---

① 《文化评论》，1957年4月5日。

《旅行者》。这是一部描写法西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滔天罪行的影片。

耶日·卡瓦莱罗维奇是第三位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他以自己创作的影片《火车》和《约安娜——安琪儿的母亲》而闻名。影片是根据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的长篇小说改编的。

除此以外，接连迅速地成长起来许多电影艺术家，如：沃伊切赫·哈斯、卡齐米日·库茨、罗曼·波兰斯基(影片《水中刀》的编剧)、塔德乌什·赫米耶莱夫斯基(影片《夏娃想睡觉》的编剧)等人。

在戏剧界，颇有才华的导演是罗兹的卡齐米日·德伊麦克和诺瓦胡塔的克里斯丁娜·斯库尚卡及耶日·克拉索夫斯基等人。他们以自己独出心裁的、先锋派的创举，在导演手法上进行了一系列小小的革命。他们的这种导演手法在波兰舞台上还从未出现过。

关于"主要危险"的理论

但是，同时也使人感到，滚滚涌来的生活潮流不会不遇到障碍和困难，旧势力和旧关系的残余还在顽强地抗拒一切新的事物，因为新事物已经从大门口进入波兰的生活。

在1957年6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中央全会上，明显地表现出党的领导人之间的不团结并没有被克服。那些希望根据"十月方针"的路线更迅速地、更彻底地进行变革的人认为，一切都进行得太缓慢，"十月方针"被冲淡了，某些

方面从“十月方针”倒退了。同时，为数较少的然而相当顽强的一批保守分子，即所谓纳多林分子（得名于举行会议的会址纳多林宫），则对党的新政策发动了全面的攻击。在这批人中间，叫得最响的是中央委员米雅尔。他后来逃亡出国到阿尔巴尼亚请求避难。

哥穆尔卡既依靠前者，也依靠后者。他企图制定和保持某种中间的、现实主义的路线。例如，很说明问题的是，在波兹南事件一周年的时候，本来预计他将根据八中全会作出的估价的精神，对这一事件进行详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分析。结果，他只是说这是波兰人民历史上的一页悲剧性的篇章，应当在双方的墓前放置花圈。

哥穆尔卡逐渐地同那些为他恢复党的领导职务和实际上执掌政权创造了条件的人发生冲突。这首先表现为同一部分知识分子，随后同大学生，最后同工人发生了冲突。许多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开始退还党证，以此表示自己对于实行“十月方针”的方式的失望。他们中间有安杰耶夫斯基、雅斯特隆、瓦日克、扬·柯特等人。

著名的大学生《直言》报被查禁。它的编辑部被解散。大学生们对此反应很强烈。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严重的骚动。1957年秋天，大批大学生在华沙示威，警察进行了残酷的干预。

同一年，罗兹的电车工人发动了大规模罢工，其它地方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罢工。

哥穆尔卡在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演说中，针对所有这些现象作了回答：

“对教条主义和对过去错误的尖锐的、必要的批评，在政治上不够坚定的、动摇的同志中间，引起了走向另一个极端、接受修正主义立场、对我们思想体系的科学基础产生怀疑等倾向……。在当前情况下，修正主义是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因为它破坏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散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性、合理性的怀疑……”

由此可见，哥穆尔卡实际上是在“两条战线”上开展斗争，而这两条战线并不那末泾渭分明，也就是说，很难确切地断定什么是“主要危险”。

那时，另一位党的高级官员、党中央委员、克拉科夫省委书记卢茨扬·莫迪卡在《政治》周刊（这是一家很接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刊物）上写道：

“我们关心在十月时期惊惶失措的同志们，把他们吸引到工作上来，使他们摆脱内部冲突。因为他们这一批人坚决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在这些同志中间，有的人建议为了某种内部的、不公开的工作而建立老党员俱乐部。有的人还要求省委只按照一条路线，即波苏友谊小组的路线开展工作。我们乐意这样做。但这些小组本来应该按照广泛的、全民的路线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却成了反对党的路线的派别活动的基地……。有的同志以波苏友好协会的名义跑到一个地方，打着向八中全会提出问题的旗号发表谈话，指责党的领导人没有说过关于波苏友谊的话，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哥穆尔卡同志和其他同志没有一次讲话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是对党内外保守集团的反击，保守集团的势力

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加强了。实际上，那次代表大会同二十次代表大会相比是后退了一步。

经济改革的尝试

在这样十分复杂的、矛盾的条件下，领导上程度不同地、一贯地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从而使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给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自然，在经济方面作了最大的努力，因为解决国家的主要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为此，组成了专门的经济委员会，研究制订经济改革的模式，并通过经济改革来活跃经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解决居民的供应问题，等等。领导经济委员会的是党中央委员、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的副手切斯瓦夫·波布罗夫斯基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委员会中，集中了波兰经济学界最杰出的人材和最有经验的实际工作者。

奥斯卡·兰格试图实现自己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设想，同时运用最新的经济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程序设计等等。就信仰来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曾在美国的大学任教，了解世界经济学科的最新成就。在1957年的一次讲座中，他提出波兰的经济模式问题。他的出发点是，这个模式应当从自身的经验中发展起来，而不是“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他把中央计划化同具有重要意义的分散管理的相结合，看作是模式的一个特点。这个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依靠经济中的工人自治和农村的合作自治，然而，这种自治应该在中央计划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最后，兰格在价格问题上的观点坚持

这样一种意见：应该尊重价值规律，但价格主要应当由国家来规定。

“兰格是坦率地对待我们时代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从他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尽可能使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作用，运用最新的经济学和数学方法，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第二，提出了部分非中央集权化、灵活的总计划以及发展工人自治的主张，以避免全国范围的官僚主义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然而，这个完全合理的、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思想，并不是始终一贯地得到贯彻的。”①

兰格作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非常坦率地对待时代加在我们头上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他也提出一个问题：什么力量将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真正代表者呢？关于这一点，他写道：

“当我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时候，应该估计到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一个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性。我认为，这种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性首先会引起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起过大的作用，因此就可能产生象‘个人迷信’那样的现象。国家机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被用来作为工人阶级自发的积极性的一种补充……”

他已经意识到，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应该改变，因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它的熟练程度在增长，它的觉悟在提高。但是，兰格并没有想到官僚主义会产生

① 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第一四七页。

那样强烈而持久的反抗。这种情况刚好在以后的年代中发生了，而且证实了列宁在 1921 年说过的这样一段话：我们能够赶走沙皇，赶走地主，赶走资本家，这我们都做到了。然而，我们不能在一个农民的国家赶走官僚主义，不能把它从地球上消灭掉，只能慢慢地通过顽强的工作削弱它……

经济学家们尽了一切努力，作了各种尝试，提出了很好的措施，下了很大决心研究制订新的经济模式。看来，这个任务是过分艰巨了。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从一开始就进展缓慢，除了令人感兴趣的理论讨论以外，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经济委员会为实际运用它的理论而采取的部分措施，未能维持多久。因为，要想获得某种效果，就必然会触犯到经济体制本身，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委员会建议采取的措施有时甚至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经济委员会委员当时埋怨说："不论我们创建什么，试图改变什么，都被看作是我们带来了损失！"

国家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有过自己合乎逻辑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一种惯性力量。对它所作的某种修补，实际上是当作它本身的一部分嫁接上去的，很难同已经发生作用的社会经济结构长合在一起。它不是一种有弹性的、开放的、灵活的制度，改革和改善只是用来延长它的寿命。它是僵硬的、同庞大的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拴在一起的、笨重的、没有弹性的制度，这使它几乎无法接受任何变革。

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个时期工人委员会的命运上。

工人委员会发生了什么事情

1956—1957年期间，波兰的各个企业自发地组成了工人委员会。这是直接生产者希望改变领导经济的方式所采取的直接行动。根据某些资料的统计，在这个时期组成了五千六百个工人委员会，共有八万二千名成员。

领导上把这个现象当作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了，决定承认它的合法性，于是颁发了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令。诚然，这个法令的条款还有许多不完整、不确切的地方，但是毕竟使一个自行产生的、就各方面来说都是崭新的直接自治形式合法化了。

关于工人委员会的法令的第二条写道："工人委员会以集体的名义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

法令的以下一些条款详细地规定了工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1.提出关于年度计划草案的意见；

2.在总的经济计划指标的基础上制订企业的年度计划；

3.制订企业的执行计划；

4.制订有关企业的结构和组织系统的方案；

5.确定企业发展的方针；

6.作出旨在改善生产和劳动条件的指令；

7.对企业的活动作出评价和规定年度收支平衡，交由上级机关核准；

8.根据经理的意见，作出关于出售不需要的机器和设备的决定；

9.在企业的职权和集体合同的范围内，规定劳动定额、工资等级和奖励办法；

10.决定如何使用属于企业的那一部分收入，以开展企业的经济活动；

11.确定分配企业基金或属于集体的那一部分基金；

12.制订企业内部的规章。

关于设置“企业基金”法令的颁布引起很大重视。这笔基金应当用来鼓励劳动集体更好地工作。从这笔基金中可以提取资金用于发放职工奖金、建筑住宅或者维修职工的住房。法令规定，以货币形式分配给集体的那部分基金，不得超过全部工资基金的百分之八点五。

1957年6月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的决议中写道：“工人委员会应当首先集中注意改善经营状况，节约原料、动力和燃料，改善劳动组织，正确地使用劳动力和配置领导干部，实行切合实际的工资政策，反对盗窃和舞弊，改进劳动纪律，推动辅助性生产。”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这时许多任务都移交给了工人委员会，而这些任务是在此以前的制度用其它方式所不能解决的，因此对工人委员会的期望也由此而增大了。

在扩大企业权利和它的部分独立性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的步骤。例如，过去中央计划规定了几十项指标，现在只规定八项指标。企业在使用银行贷款方面的权利也扩大了。

奥斯卡·兰格主张加强企业的物质基础和扩大企业的独

立性。他说："要能够管理，就应该有东西可管理。"

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直言》报（它后来被查禁停刊了）在1957年1月曾经载文写道：

"我们的意见是，工人委员会是我们国家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此，不仅必须挫败个别恶劣官僚的反抗，而且必须挫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官僚主义者们的反抗。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把工人委员会当作生产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只要这种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就应该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不能要求委员会象迄今为止那样成为一个纯经济性机构。我们认为，把国家生活中的政治任务移交给工人委员会，也是新的社会主义关系的必要前提。"①

当一方在为工人委员会寻求政治权限的时候，工人委员会本身的工作却遇到了很大的障碍。工人委员会很难成为整个制度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制度从总体来说是同它不相适应的。这种障碍不仅表现在企业内部、表现在同经理的关系上（这方面的障碍一度还不突出），而主要表现在当需要解决涉及上级国家机关的权限问题时，便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央的国家行政机关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这种新的机构破坏国家机关拥有的职权的一贯性。

在华沙工人集体代表会议上，"7月22日"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谈到了中央机关是怎样拒绝承认他们的每一项倡议和每一点独立行动的。"帕伐瓦格"工厂的主席则谈到了他们如

---

① 《直言》报，1957年第四期。

何经常被指责为想要制造无政府状态，因为他们为他们的集体寻求最为有利的解决办法。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抱怨，他们继续从中央得到原有指标的计划，中央机关想要继续按旧的体制管理企业，等等。

显然，中央机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这种建立工人委员会的进程。因为它不可能摆脱自己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留给工人委员会的主要是咨询性的职能，而把一切主要的特权抓在自己手中。官僚体制的存在，实际上不可能使这种工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机构进一步发展。

这种对经济管理民主化进程的抵制，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年青的共产党员中间，激起了过左的反应。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应该通过"新的革命"来摧毁官僚体制，并按照工人委员会的原则从下而上地改组整个社会。

1957 年开展的工作毕竟已经显示出它的成果，工业生产比 1956 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工资基金比 1956 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七，市场供应明显地改善了。约瑟夫·霍夫曼在党的理论刊物《新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1957年的经济平衡》的文章，文章写道：

"建立工人委员会，扩大企业的独立性，设立企业基金，都提高了集体关心生产增长和企业赢利的程度……"

从各方面来看，要使工人自治及工人委员会比较顺利地发展，就要进一步调整制度，这就要着手制订新的"经济模式"。然而，这一模式的制订从一开始就很困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委员会越来越感到自己犹如无水之鱼。因此，有的工人委员会开始发生变化，有的甚至同工会围绕着"谁更

重要”的问题发生冲突。工人委员会越来越被看作是国家管理机构中的异己。

到了1958年初，政治领导人就准备提出关于企业中工人管理的新设想。哥穆尔卡在1958年4月14日的第四次工会代表大会上说：

“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在所有企业中，无论是已经有工人委员会的企业，还是至今尚未建立工人委员会的企业，都建立企业的新的社会性机构。这种机构可称作‘工人自治代表会议’……”

按照哥穆尔卡的建议，“工人自治代表会议”的组成应该包括工会委员会，党组织的代表和原来的工人委员会。

虽然这种设想乍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工人对企业的管理，但实际上却意味着取消工人委员会，并以一种很不明确的机构来代替它。新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任何时候都没有获得象十月大转变以后的工人委员会所拥有的那种职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代表会议”只起了古典的“生产谘询会议”的作用。

很说明问题的是，就象在1948—1949年间最初的工厂委员会不复存在一样，现在是由工会来扮演取代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管理企业的独立机构)的角色。按照经典教条主义的公式，工会是政权机构和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工会来说，新的工人委员会的机构也是一种“异己”。

在这段时期内，工人委员会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但不妨也对它作出某些分析性的评论和结论。尤其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是：

“从工人委员会‘从下面’自行产生，到政治领导人‘从上面’提出关于成立工人自治代表会议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前者是工人阶级对于经济管理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反应，而后者却是将工人参加管理的愿望适应于行政方式的经济体制的一种形式。”①

工人的行动和罢工

工人阶级本能地感觉到，而且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本质的变化，整个权力仍然掌握在国家机构手中。因此，他们对待国家机构的态度就象对待某种雇主一样。这从以下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阶级在这段时期也时常拿起自己传统的武器——罢工。诚然，罢工的规模并没有象1957年罗兹的罢工那样大，但在取消工人委员会之后，罢工几乎一直在发生。

应当记住，罢工是波兰工人阶级的一种传统，当他们感到自己受到某种威胁的时候，总是诉诸于罢工。早在1861年，刚刚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波兰就出现过“宪章运动”，当时罗兹手工业工场的纺织工人第一次捣毁了一家纺织厂的机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发生过相当大规模的罢工，工人同警察发生了武装冲突。当时，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波兰广泛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当波兰共产党成立（1918

① 扬科·克利科瓦茨：《波兰的工人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出版，贝尔格莱德，1971年。

年）以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以致当时的毕苏斯基政府甚至为此而建立了集中营。

在1936—1937年间，工人们罢工反对当时的“健全化”① 政权，同时还发生了农民暴动。

可以说，罢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与生俱来的。其它国家也发生过罢工，正象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发生罢工一样。但是，如何解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罢工呢？

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无冲突论”，工人阶级不能以罢工来“自己反对自己”。这就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一件武器。正象波兰作家瓦日克所说的：鼓吹“无冲突论”的那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剁掉了的手指不知道痛”。他们实际上是脱离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回避工人们存在的问题。波兹南发生的事件提醒了他们，不能仅仅在上层的会议厅里决定人们的命运，以至于整个民族的命运，在街头、在罢工者中间也能决定这种命运。

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波兰社会学家扬·什切潘斯基，曾经以1957年罗兹的电车工人罢工为例子著文，文中写道：

“作为一个见证人，我考察过罗兹的罢工。我可以强调指出：一年来波兰发生的百分之五十的罢工事件，首先是由于企业和整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对于工业冲突心理学缺乏理解，才‘突然爆发’的。他们不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把一切都仅仅归结为经济因素。对于工人为什么在工厂劳动的

① “健全化”，是1926—1939年波兰实施的法西斯制度。——译者

问题，他们的答案是：为了挣工资。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真相。除了挣工资以外，他们还要寻求其它东西。事实的全部真相要复杂得多……”

什切潘斯基接着谈到了关于工人参加管理的愿望，关于官僚主义者的抵制，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离心，等等。总之，存在着一系列决定工人地位、使工人满意或引起工人不满的因素。

哥穆尔卡时期的成就和困难

现在，情况尽管比前一段时期有了明显的好转，工人们还是感到主要的东西仍然保持原状。工会并没有真正地为争取工人的权利而进行斗争，自治也没有能够行得通。因此，当他们感到应当为什么事情而斗争的时候，就继续诉诸罢工。诚然，导致罢工的不是特殊的、具体的经济要求，而是国内的总的情况。

哥穆尔卡及其逐渐更换并年青化了的领导班子，掌权达十四年之久。这是波兰相对稳定而且不断发展的时期。当然也伴随着时而出现的国内紧张局势和冲突。遗留给哥穆尔卡的、由制度本身的性质而产生的基本矛盾，通过各种措施和方法而缓和了一些，但是仍然存在。在“波兰的十月”的时期提出的、并写入八中全会决议的某些主张，要求“党应该在自己队伍中消除保守主义和胆怯、惧怕新生事物、顽固坚持过时的理论教条、回到陈旧的领导和管理方法上去的企图。”后来，久而久之，这些主张被冲淡了、被忽视了。

这也是一个在波兰继续进行工业建设并取得很大成就的时期。波兰进入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十个工业国家的行列。重点仍然是在重工业、冶金工业和采矿工业方面，同时开始发展石油化学工业和化学工业。还发现了储量极大的铜矿，使波兰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成为欧洲重要的铜生产国。

在这个时期，对基础设施也给予很大的重视，修建了现代化的道路、百货商店、飞机场等等。国家越来越对世界开放，并且相当迅速地摆脱了过去的孤立状态。

农业仍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尽管在农业中也发生了可以感觉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在农村实行新政策的结果。新的农业政策是统一工人党和统一农民党共同制订的。这两党的联盟是人民统一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八中全会以后，过去建立的农业社百分之八十都解散了，同农民的联盟已经建立在新的基础上。放宽了对个体所有者的投资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关心。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更接近实现波兰人多年来的夙愿——停止进口粮食和饲料。肉类供应问题(这是波兰每一个家庭的老问题)还没有从议事日程上勾销，虽然在个别年份有所改善。

总的来说，这十四年都是在没有发生什么大“地震”的情况下发展过来的。当然，时而也出现过一定程度的冲突和紧张局势。这是指关于工人的问题，或者部分地是指关于知识分子、大学生、天主教教会等问题而言的。到了1968年，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时无论是在波兰，还是在其他欧洲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在这些

示威中，大学生们要求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扩大民主、让劳动人民更多地参加管理，等等。

人和人的幸福

作为对于这些现象和这些运动的回答，领导上不时地掀起“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有时也采取行政手段查禁某些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著作。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问题的看法。被查禁的有沙夫、鲍乌曼、布鲁斯、科拉科夫斯基等人的著作。

在“波兰的十月”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首先是针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后来逐渐越来越多地转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这方面，除了批判那些确实是从异己的、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人们以外，受批判打击的对象往往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因为他们的立场不完全符合官方的政策。

也许，在这里可以引用波兰哲学家阿达姆·沙夫的情况作为例子。在“波兰的十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沙夫曾被看作是新方针的忠实拥护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官方的思想家”。在关于自由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是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和文艺创作问题的讨论中，沙夫为在科学和文艺领域中出现敌人活动的情况下实行干预的政策作辩护，但他反对离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干预。例如，很说明问题的是，1958年沙夫在同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中说过：“党给予写作和辩论以很大的自由，相信在自由的思想斗争中马克思

主义者将会更主动、更富有战斗性，而且将会以自己的论据获得胜利。"但是，当这种自由显示出它的消极面时，也就是说，当这种自由转化为异己分子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时，党就应该在政治上干预。这种干预表现为撤换某些报纸和杂志的主编，加强书刊检查，等等。

当时沙夫大概还没有想到，连他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干预的对象。

这位在巴黎研究过法律和经济，在波兰和苏联研究过哲学的博学多闻的人，曾经十分坦率地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曾经十分积极地参加过有关"青年马克思"问题的论战，因此他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关于人的问题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热门课题。沙夫同意这样一种主张：当马克思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时候，他的学说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不应该把早期马克思的学说同他后来的学说截然地分割开来。

"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问题的时候，沙夫也持有特殊的立场。如果社会主义承认人的个性，那么就应当在幸福生活的范围内给这种个性以尽可能广阔的场所。因此，如果企图为一切人建立一种幸福生活的统一的模式的话，那末幸福对于一切人来说就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①

沙夫写道，问题不在于给人们开处方，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才会得到幸福，而在于限制和摒弃一切可能导致人们不幸的因素，诸如饥饿、疾病、死亡、缺乏自由，各种形式的剥削和

---

① 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二卷。

奴役等等。

沙夫写了许多文章论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离心问题，政权的上层以及这个上层的生活方式，这个上层对于教育新人的影响问题。他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不能只是通过政治决定加以解决，不能仅仅在一个封闭的政治圈子里解决。他要求为了解决复杂的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批判性地看待社会生活和科学生活。

阿达姆·沙夫坦率的批判态度，以及把政治生活的某些常规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引起了政治官僚们激烈的反应。后来，在国内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沙夫也象其他某些知识分子一样，不仅被解除了政治职务，而且被解除了学术职务。

在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年青一代的社会学家，如耶日·维雅特尔和齐格蒙特·鲍乌曼。他们尖锐地反对政治领导对于发展社会学理论的垄断，强调指出社会学仍然限于经验主义式的研究。这样只会给社会主义带来损失，因为没有掌握为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资料，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应该知道本身的真实情况的。

整个这个时期，思想战线热气腾腾，十分活跃，因为有许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竭力通过自己的著作来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曾经出席许多国际会议，是波兰马克思主义思想界的当之无愧的代表。

当然，也有一些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以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观点来批判波兰社会。在思想战线的斗争中，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曾经定期地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竭力维护由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原则，认

为只有无条件地实行这一原则才能通向社会主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68 年 11 月）就贯彻了这个精神。例如，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泰伊赫马在会上说："应该清楚而明确地强调指出，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制，再好的计划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按他的意见，中央集权制是巩固党内的必要纪律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如果缺少这种必要的纪律，党就不能实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泰伊赫马继续说道："党的软弱性会导致自己威信的下降，而在党处于执政的情况下，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国家地位的软弱……"

为波兰不受侵犯而斗争

1968 年还给波兰劳动人民带来另一事件。这一事件对他们本身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国家被牵涉进去了。这就是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中也有波兰部队（尽管为数不多）；他们越过邻国的边界，到那里"拯救社会主义"。虽然官方政策是同意并参与了这次入侵的，但不能说人民也鼓励自己军队的这一行动。在事件的全部过程中，显示出某种不祥的、令人感到压抑的东西。

但是，除了必须克服的一切矛盾和紧张局势以外，总的来说，波兰无论在内部发展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都逐步地有了起色。

在这段时期，波兰的局势显著地稳定了，国际地位也加强了。哥穆尔卡是这样一个人，在自己整个一生和在政治斗争中，最为重视的事情就是保障波兰的领土完整、承认波兰的新

边界。他在1945年和1948年为此而斗争过，在他为国家掌舵的十四年期间也是如此。后来，许多人批评他，说他为了自己的“圈子”而忽视了很多国内问题的解决。但是，他确实把巩固和保障波兰在奥得河和尼斯河的边界，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和毕生的事业。很多国家早已承认了这条边界，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承认了；但是，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没有正式予以承认之前，这条边界就没有充分的实际意义。因为，在整个战后时期，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有相当强大的复仇主义力量在活动，他们对波兰的西部地区“提出了要求”。

这样一天终于到来了。由于西德社会民主党本身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以及勃兰特“东方政策”的成功，西德改变了对于波兰边界的立场。1970年12月初，维利·勃兰特以西德总理的身分正式访问了波兰。这次访问曾经哄动一时，使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死难者纪念碑前面下了跪。这一姿态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促使两国关系的气氛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圆满结果，就是达成了承认奥得河—尼斯河边界的协定，勃兰特和西伦凯维兹在协定上签了字。这样，哥穆尔卡的夙愿便成了现实。

1970年12月7日签署了协定，可是，一个星期以后，哥穆尔卡由于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而下了台。

这个时期同苏联的关系也正常化了，而且不断地得到了改善。1956年11月的共同声明所阐述的原则获得了公认，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互相尊重。波兰的经济通过互相合作同苏联经济更加联系在一起。就经济潜力来说，波兰是经互会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波兰同经互会以

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也有了广泛的发展。

那时，波兰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极其良好，两国特别有成效地发展了经济合作。我国是最先同波兰人发展工业上合作关系的。这给双方都带来了益处。1957 年，哥穆尔卡访问了南斯拉夫，1964 年铁托总统回访了波兰。这一切都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事件。它促进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要始终建立在平等、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而不问其社会制度和国际地位的差别如何。

诚然，当“阵营”内的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由于某种原因而冷淡下来的时候，波兰也参加了某些反南斯拉夫的活动，但这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恶化两国的关系。

众所周知，1958 年 4 月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南共纲领。而在这次大会的筹备期间，就在阵营内的各国共产党中间引起了反应。于是，在报刊杂志上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波兰人是最后参加这场运动的，他们对于纲领草案的批判性意见只局限在某几个问题上。首先，他们对于霸权的定义感到不悦，其次是关于如何评价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同盟国协定问题，还有对于集团政策的态度和关于国家消亡的设想，等等。他们认为，如果南共纲领草案已经通过，那么，纲领的内容应当是有关南斯拉夫发展的问题，而应删去有关国际关系和动向，以及一切不属于南共联盟管辖范围内的问题部分。

也是在 1968 年，在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入侵捷克以后，我们国家和铁托总统个人坚决表示反对这种入侵，认为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危险的先例。波兰人在《人民论坛报》发表了

一篇文章，为这次入侵辩解，说这是“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并且攻击了南斯拉夫的立场。

但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削弱、更没有中断颇有成效的经济合作和基本上良好的政治关系。双方的合作在日益发展和扩大。

波罗的海地区的风暴

1970 年底，波兰发生了新的、大规模社会经济动荡。引起这次动荡的原因纯属内部性质，而它的导火线看来是平淡无奇的——肉类和另外四十种食品价格的上涨。

真正的根源还更加深刻一些。

许多人后来把社会上紧张气氛的增长及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尖锐化而归咎于哥穆尔卡，更确切地说，是指责他对于生活水平的态度。对于这个问题，在他公开讲话中所申述的观点，是令人失望的。这些观点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他在提倡某种“禁欲主义”、淡泊、清贫。例如，人们告诉他，工人们对于住宅大楼里几家合用一个卫生间表示不满意，他就回答说：“我家只是在院子尽头有一口水井。他们应该理解，波兰现在有很多叫人操心的事情……”。人们告诉他，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得到一辆汽车，公众舆论对此相当不满，而他却不能理解这个对于他来说是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他是农民的儿子，青年时代当过工人，战前是地下工作者并坐过牢，战争期间是游击队员，战后又再次成为政治上的受害者、斯大林主义的牺牲品。但是，难道这能成为他很难迈入新时

代门坎的理由吗？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时代里，生活水平、“消费者心理”、人们新的需要等因素，在日常生活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现代生活的要求，哥穆尔卡即使理解，也并不予以十分重视。因此就影响到他的生活方式、工作作风，也影响到他的政策。显然，问题还在于教条主义观念的残余。按照这种观念，社会主义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他们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毫无关系。按照这种观念，党、国家以及管理党和国家的上层领导力量，必然会使人们得到幸福，感到愉快。

然而，远不是都能用哥穆尔卡对生活水平的看法来说明一切问题的，尽管第一书记的地位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党的政策、对领导方法、对党和人民的关系都能产生重大影响。

工人们迸发出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在社会上实现非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程度，远不足以克服教条主义的势力和重新强大起来的官僚主义管理体制的反抗。许多事情都半途而废了，经济又重新处于极大的困难之中。这同行政—官僚主义体制早期出现过的情况十分相似。计划和总产量的增长又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尺度，而忽视了质量指标和生产中的比例关系。教条主义的发展概念已经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并逐渐地重新获得了优势。企业中劳动力过剩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而导致劳动力过剩的是人数众多的新的一代的压力（波兰在战后年代的出生率是欧洲最高的，形成了人口上的“繁荣”）。

在国内，发放了巨额投资，而投资效率极差，项目建成的时间拖长，大量浪费材料和资金。报纸刊登了一家工厂的情

况：这家工厂到了一批设备，当需要安装这些设备的时候，才发现修建好的建筑物太小，设备根本无法安放进去，于是只好统统拆掉重建。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例子，它们既说明了官僚主义的计划和设计的性质，也说明了直接的执行者和生产者不关心工效和质量。

尽管领导上企图扭转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的情况，但这种意图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因为，计划没有完成，基建期限一延再延，生产设施的造价极高。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容易牺牲某些轻工业工厂，而不是那些已经吞噬了大量资金和国外贷款的大型冶金企业。

农业相当落后，因为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进展缓慢。“从上面”规定的价格制度缺乏刺激作用。这种价格制度虽然看起来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却导致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例如，按六个兹罗提一公升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的牛奶，却以四个兹罗提一公升的价格在商店出售，其差额由国家补贴。结果，农民就以比较高的价格出售牛奶，然后又以比较低的价格买回去。最困难的是肉类，由于进口饲料和价格制度的问题，肉类的生产从来都无法满足需要。三十多年来，波兰城市居民在肉店门口经常排长队的现象，看来还会长期地存在下去。

国家意识到应该提高某些类别的产品价格，否则就不可能提高产量。而提价的决定一旦公布，就在一向不满的居民中间引起强烈反应，掀起罢工，发生真正的工人暴动，在波罗的海地区对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于是，又以某种不同的方式重演了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

格但斯克街头的鲜血

1970年12月14日，星期一，在华沙举行了党的中央全会，全会讨论了与提高食品价格有关的形势和任务。与此同时，在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也举行了代表会议，会上谈到关于组织生产的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规定劳动定额的问题。当天，在造船厂各车间宣布提高价格的决定之后，立刻在工人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们表示不满，因为价格增加了，劳动定额也要提高，而工资仍然不动。笼罩着这座工厂的动荡不安在代表会议上也感觉到了。

瞬息间，有一大批工人离开代表会议的会场，走上街头，形成了一支有大部分工人参加的游行队伍。他们走向省的党委会，抗议和申述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实际下降。

当示威者到达省委会的时候，一名党的干部在汽车上相当生硬地对工人们说，他不能同所有的人谈话，工人可以选出代表团来，他将接见代表团。

似乎正是缺少他投下的这一星火种了！已经极其愤怒的群众开始呼喊和抗议，袭击汽车，打碎附近商店的橱窗，愤怒的洪水涌泄出来了！

激动的群众走上街头，焚烧了某些建筑物。

情况立刻传到了华沙，党的最高领导人和省委书记们正在那里开会。

政府在惊惶失措的情况下采取了武装干预。当然，在混乱之中，不知是谁，是警察还是群众中的某一个人开了第一

枪。但是，在枪声打响之后，保安部门的武装部队都开了火。

在发布给保安部队的命令可以看出，是按照政府的指示动用武器的。命令的第二项写道：

“命令警察机关和保安部门，以及其它与这些部门配合的机构，采取一切法律许可的强制手段，包括使用武器，反对那些以暴力威胁居民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抢劫或破坏社会财产或公用设施的人。”

正如从这项命令中可以看到的，从国家机器的逻辑来说，重要的是强制措施在法律上是否许可，而不是在政治上是否适当。

不过，这样的命令也是出自于一种政治上的估计。就在同一天，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代表领导在广播电视中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了这种政治上的估计。他激烈地抨击示威和骚乱，把它同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敌对分子们竭力制造一个新的无政府主义的策源地，干扰企业的正常工作节奏，破坏国家的生活秩序。”

正象我们所看到的，紧接着这种激烈抨击的是激烈的行动——动用武器。

骚动还在继续，而且第二天扩大到格丁尼亚和索波特。出动了陆军和驻防格但斯克军区的海军陆战队来帮助警察。

发布的第一批消息谈到在格但斯克死亡六人，受伤多人。然而，实际的死亡数字比这大得多。在格丁尼亚的冲突更加残酷，因为那里的港口工人直接同武装部队发生了冲突，所以死伤的人数最多。

12 月 17 日，星期四，在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最大港口

什切青发生了罢工。但是，参加罢工的不仅仅是港口的和一部分企业的工人，而是整个城市。在什切青，事态进行得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不同。在那里立刻选举了罢工委员会，掌握了城市的全部权力，行使了市政机关和党的机关的一切职权。由罢工者自己来维持秩序，一切部门都继续行使它的职能。没有发生骚乱，因此在什切青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没有任何人受到损伤。也正因为这样，罢工才顽强地持续下去。甚至到12月20日以后，当哥穆尔卡在华沙下了台，领导班子更换了，什切青的罢工还在继续，仍然由罢工委员会来维持城市的秩序，掌握城市的权力。只是当他们从以盖莱克为首的新领导那里得到保证，保证城里的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参加了罢工而被追究责任，这才停止了罢工。

罢工者们牢牢地记住了什切青的这个经验！

五、爱德华·盖莱克的政策

12 月 20 日，在华沙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七中全会，目的是估计形势和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

全会宣布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撤消哥穆尔卡的第一书记职务，选举爱德华·盖莱克接替他。据说，哥穆尔卡下台的原因是由于他的病情，而实际上他是被送进医院的，并且在第二天才发表了关于他患血栓的正式医疗公报。

显然，促使哥穆尔卡下台的，仍然是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深刻矛盾，因此不得不更换党的领导。波罗的海地区事件过份强烈地震动了全国、全党和整个社会，以致在上层也不能一切都保持原状。

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据说，他一开始就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持有错误的观点，这种观点导致了对罢工工人使用暴力。哥穆尔卡、克利什科和雅希楚克在政治局里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它决定一切，直接领导各种行动和宣传工作。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在1956年，当时哥穆尔卡曾经明确地表示：波兹南事件是社会上深刻矛盾的结果，而不是反社会主义势力活动的结果。可是，现在，当发生了间接地反对他本人及其领导的骚动时，他却采取了相反的立场。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地位是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必须退出政治局。和他一同离开政治局的还有泽农·克

利什科、波列斯拉夫·雅希楚克、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和里沙尔德·斯柴莱茨基。稍晚，从领导班子中又去掉了伊格纳吉一洛加·索文斯基。这样，由于种种情况，使这四位在1956年被当作未来的希望和支柱而从斯大林主义的监狱里提升到党的领导层的知名人物，又一次被命运玩弄了。

新的政治局的组成，除盖莱克外，还有约·西伦凯维兹、彼·雅罗谢维奇、斯·英德里霍夫斯基、斯·科乔莱克(他在同波罗的海地区的罢工工人谈判中起过重要作用)、弗·克鲁切克、米·莫查尔、斯·奥尔绍夫斯基、扬·希德拉克、约·泰伊赫马。

爱德华·盖莱克成了党的领袖。在波兰舆论中，他并不是一位不知名的人物。相反地，他的命运和党内经历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十分特殊的。他年轻的时候曾当过矿工，在法国、比利时生活和工作过。早在1931年，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战争时期，参加过比利时的抵抗运动。战后，于1948年，他回到波兰，先是在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工作，后来担任卡托维兹(希隆斯克)省委书记。在那里，他边工作，边学习，获得了矿业工程师的文凭。

希隆斯克省的省委书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因为希隆斯克是"波兰的鲁尔区"，那里密集着波兰的工矿企业，因此也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

久而久之，盖莱克逐渐地成为希隆斯克和全波兰的显赫人物。许多旨在提高矿工生活水平的倡议和活动都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希隆斯克的住宅建设比波兰任何一个地方的建设都要讲究和整齐。据说，盖莱克曾要求改变标准住宅的

建筑设计，因为按原来设计的标准住宅厨房太小，而矿工家庭大部分时间是在厨房里度过的。他还要求并积极奔波，使每个工人都得到一小块土地，用以栽花种菜，让工人们在繁重的井下劳动之余，能够搞一点“地面上”的劳动。人们如果要去找盖莱克，也比较容易。可以找他摆摆问题，要求他到华沙的中央政府去想想办法。每逢星期天，他都不带警卫在公园里散步，人们可以走近他，同他握手。他还非常喜欢观看足球赛，并且和矿工们一起为“索斯诺维茨”俱乐部当拉拉队。

这一切使得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人们没有必要去知道比亚威斯托克或者奥波莱，甚至波兹南的省委书记是谁，但在整个波兰人们都知道希隆斯克的省委书记是爱德华·盖莱克。

希隆斯克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也使人觉得与华沙不同。虽然，华沙是党和国家机关的中心，可是，在勤劳的希隆斯克人看来，那是一个“谈话和讨论多于实干的城市”。

希隆斯克像是不停地跳动着的整个波兰的脉搏，因为那里是波兰经济力量的基础。甚至连华沙人也开玩笑说，波兰应该归并给希隆斯克。

显然，在当时的形势下，当工人们以那样激烈的方式把他们的问题和要求提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需要由一个在解决工人问题的过程中已经有过一些成就的，并且在工人中间有威信的人来担任党的领导人，这是很自然的。所发生的事件本身似乎也正是要求盖莱克出场，尽管他当时还没有被正式承认为党的“第二号人物”。

整个国家怀着急切的心情和以极大的关注，等待着听一

听这位新任第一书记将用怎样的词藻和语调来对民族和工人阶级说话。他们听哥穆尔卡的讲话已经整整十四年了，他们熟悉他的风格、他的声调、他的观点和看法。可是，现在，在新的形势下，这位新的人物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盖莱克在第一次对公众的讲话中宣布，中央委员会必须对波罗的海地区和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作出自我批评式的回答。他强调今后领导将经常向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征求意见。

盖莱克说："这些事件提醒了我们，需要使党永远和工人阶级及全体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党绝不能失去和劳动者的共同语言。"

盖莱克允诺要立即提高最低收入者的工资，并采取紧急措施，解决一些最急迫的任务以促使形势好转。同时，他还宣布要进行重大的改革。他宣称："我们将重新认真地审核1971年计划和整个新的五年计划的问题。我们着手制定的计划和实行的改革，应当能够保证我们祖国的蓬勃的、同时又是均衡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进行工作时将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进行商量。"

在自己的第一次讲话中，盖莱克就明显地改变和缓和了领导上称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是"流氓式的、冒险主义的攻击"的评价。他试图把工人的抗议同破坏社会主义秩序和安全的行为区分开。

这位新任第一书记的第一个步骤，预示气候的改变，提高了人们对于改善国家状况的信心。因此，舆论界满意地予以接受了。

盖莱克的这种观点也是为波兰的一些邻国所乐于接受的。因为，在那样的形势下，这个国家国内问题的尖锐化对谁都不合时宜。

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教会在这些事件中所持的态度。几天以后，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在圣安娜教堂的圣诞节讲话中也同样地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表示遗憾：教会没有及时告诫已经成为严重威胁的形势，以致工人的不满酿成骚动。同时，他以一个教会领袖的身份呼吁居民们维护安定和秩序。

教会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它在任何形势下都不允许自己处于消极和漠不关心的状态。同时，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又防止冒公开与党和国家对抗的危险。

“盖莱克时代”的开始

有了新的领导、新的希望以及情况将会转好的特别令人信服的征兆，波兰跨入了新的1971年。

继政治局人事变动之后，接着是政府和国家机关的人事变动。曾经担任过社会党领导人、贝鲁特和哥穆尔卡的亲密共事者、担任过多年总理的约·西伦凯维兹(那时流传的笑话说，他将担任总理一百年)，取代了马·斯彼哈尔斯基，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新的总理是彼·雅罗谢维奇，他过去是将军，是在苏联组建的波兰第一军成员，随该军经历了从苏联的列宁诺城到柏林的全部战斗历程。他曾长期在西伦凯维兹政府里工作过，非常熟悉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也熟悉经济业务和经济部门的干部。

盖莱克作为党的领袖，立即开始贯彻新的工作作风，他每天要会见各行业的工人代表，各种职业和有专长的人士的代表，以及各机关和各业务部门的代表，并同他们交谈。首先，他会见了国内所有最大企业的经理们，和他们交谈了关于恢复生产的迫切任务。从此以后，他实际上每天都接见代表团，其中有冶金工人、矿业工人、化学工人、建筑工人、造船工人、农民、医生、教授、教师、设计师、铁路工人、妇女、青年的代表团，还有各城市和地区、学校和工厂的代表团。

盖莱克在以后的十年中都坚持这种“直接领导”和直接对话的作风，因为，显然，他认为这是“和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协商”最重要的、最显著的、可能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这一点，他在刚上任的时候就说过，实际上过去在希隆斯克也是这样做的。

不久，于1971年2月6日和7日，召开了党的八中全会，会上详细地分析了过去发生的事件，为使形势好转制定了必要的改革政策和措施。

在八中全会上，在党的领导层里，新老之间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内容并没有马上发表，而是在几个月以后才公诸于世。哥穆尔卡、克利什科和雅希楚克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被指责在政治局里建立“三头政治”，不仅控制政治局，而且控制中央委员会。

在全会上谈到：“从一开始，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就擅自作出决定，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事件采取了错误立场。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而且直到12月19日才由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雅希楚克和克利什科同志一起制定了宣传活动的路线。这

条路线不顾实际情况，摒弃任何认为波罗的海地区事件的基本原因是党的领导的决定和工人阶级的观点之间的矛盾的看法……”

雅希楚克驳回了关于他的错误是在经济工作中失策的指责，而指责了政府和计划委员会。他拒不接受关于政治局里存在着包括他在内的“三头政治”的说法。

国务委员会主席西伦凯维兹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想到自己的责任，我至今还感到内疚。因为，我虽然看到了我们在朝什么地方走下去，也想避免这些悲剧性的事件，但我未能做到……”

会上，党的老干部波·鲁明斯基的发言，给人们留下了特殊的印象。他不同意说犯错误的只是哥穆尔卡及其亲密的共事者，而要求全体中央委员都作自我批评。他回顾了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的危机和十月的日子，他说，当时哥穆尔卡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因而人们对他抱有过大的希望。可是，不久我们便失望了。鲁明斯基接着补充说，早在1964年，当哥穆尔卡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换人事，当开始同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已经感到哥穆尔卡的工作和领导作风中有些不正常的地方。鲁明斯基批评了最近的一次党代表大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他说，在会上应该讨论使波兰社会不安的严重问题，然而却讨论了群众集会和举杯祝贺的方式。

“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哥穆尔卡同志的责任吗？”鲁明斯基问道，并补充说，即便是现在也不要对新任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喊“万岁”，因为他不需要，“我们不要奉承他，而是要在困难而责任重大的工作中帮助他。”

八中全会确定了当前迫切的任务：新的领导班子应该着手工作，使国家形势好转，并开辟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全会还确定了发展的四个基本方面和党的工作的新作风。决定改组中央的政权机关，实行新的以省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并改变经济政策。

同时，全会决定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届时将研究和制订新的政策并在最高一级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很不轻松的形势下，盖莱克和波兰的领导得到了苏联直接而迅速的援助。显然，苏联在这方面也看到了自身的利益和阵营的利益。苏联领导人很现实地估计到，波兰的局势由于波罗的海地区的动乱而变得多么微妙和危险。因此，他们保持了谨慎和克制，在事件进程中避免一切可能导致进行干涉的行动，因为他们知道那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当这个强调自己忠于华沙条约、经互会和对苏联的友好关系的新领导班子上台之后，苏联领导人反复权衡利弊，认为最为有利的是帮助他们，并使波兰能够尽快地团结起来。波兰按面积和人口是阵营内占第二位的国家，它的战略地位和经济潜力对于华沙条约和经互会都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苏联领导马上决定给波兰一亿美元的现金贷款，使波兰政府能够购进波兰市场匮缺的食品和其它消费品。同时，还提供了在当时形势下对于波兰领导很有帮助的其它优惠条件。

虽然后来波兰也得到了西方的大笔贷款，但在那个关键时刻，苏联的“头号援助”对于巩固新领导的地位来说，确实起

了相当大的作用。

六大和"十二月政策"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和优秀的策略家，盖莱克明智地决定提前一年，也就是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悲剧一周年(1971年12月)的时候，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那时应该扭转一下社会上最突出的反常现象，并为一种新的政策打下基础，这一新政策是在八中全会上提出来的。它将为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开辟另一种前景。

全国又复苏了生存的希望，即使生活不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善，但无论如何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代表大会会前的讨论和多少有些好转的经济形势，改变了国内的气氛。在普遍存在着疑虑的同时，也带来了对于未来的某种信心。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个人作出了很大贡献。正是他，一年前忐忑不安地来到波罗的海地区，站在工人们面前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请帮助一下吧！"而他们也确实帮助了他。在那严重的形势下，给了他很大的信任和支持。因此，现在，在事件发生一周年的时候，必须以各种方式避开那些不愉快的回忆，而要激发新的、前进的动力。党的代表大会就应该直接地带来这种动力。

在中央委员会关于代表大会的公报中，涉及一年前的事件，不过寥寥数语，人们也并没有过多地指望会给予这些事件以某种新的、更详细的评价，会议公报简短地说：

"社会经济政策中的困难和错误纠结在一起，形成了1970

年底尖锐的社会冲突的基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和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制止了这种冲突的悲剧性的、危险的发展。两次会议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对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必要的修正。八中全会对12月发生的事件作出了充分的评价……”

这就是全部的内容，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不要预期对政治悲剧作更多的评价。因此，在公报的其它部分，没有再提到这一政治悲剧。

但是，代表大会公报的全部材料，毫无疑问被认为是实事求是地、冷静地和公开地分析国内问题的文件。它实际上受到波罗的海地区事件的强烈影响。可以看出，公报的编纂者首先是想让波兰工人阶级和波兰公众信任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其它任何美化形势、掩饰问题的作法，都会引起相反的效果。

对于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前，包括第五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1968 年 11 月—1971 年 12 月）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简而言之，就是：

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正确的决议和方针，但是，当时的领导在实施决议和方针中犯了大错误，在实践中又歪曲了这些方针和决议。

1970年12月事件以后，新的领导尽力纠正这些错误，彻底地实现第五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政策，在对这些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完善的过程中继续前进。

在大会文件中，还借助于数字和事实说明过去的领导之错误所在。文件指出，首先，由于缺乏一个长期的、深思熟虑

的、分阶段详细制定的发展决策，所以造成某些经济部门的发展不平衡，采取了主观的、欠考虑的作法以及自相矛盾的实际措施。因此，当化学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九，动力工业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冶金工业也以同样的幅度增长的时候，生产一般消费品的经济部门却令人不能容忍地停滞不前，甚至还落后了。这必然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党应该看到这个事实，特别是应该注意到食品生产和食品工业状况很糟糕，而居民每日必需品的供应正是取决于这个生产部门。供应的恶劣状况已经延续达几十年之久（实际上从1939年就开始了），它经常成为人们不满的原因，导致社会上的冷漠态度和对工作的不关心。

过大的投资对于波兰社会肯定是一个特殊的负担。从1965—1970年，投资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从百分之十八点八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二。这对于国民收入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而在生产效率低、某些项目建设时间延长、超定额耗费原料等情况下，这些投资就变得更加昂贵了，从而也就更加延缓了生产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尽管作过减缩投资的努力，投资仍超过将近六百亿兹罗提，这只能带来更多的负担和消极因素。这笔款项不可能用别的方法来补偿，只能向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开刀，让人们勒紧裤带。

在过去的一年中，新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目的在于实行合理的经营管理、改善市场供应，并且鼓励人们更好地、更有效地工作。在华沙和其它一些城市，张贴了许多大幅标语，诸如："我们要更好地工作"、"我们要生产更便宜的东西"。甚至还利用波兰人传统的民族自尊心，引用数字说明波兰过去

的发展速度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快(大约百分之六)，但是，在最近几年，其中有些国家超过了波兰。这样做是有意识地让人们了解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因为对于波兰人来说，一向认为有必要在欧洲或者某种意义上在全世界引起人们的注意。

当然，新领导也很清楚，真正的成就不能只靠宣传、号召和唤起民族自尊心来取得。应该尽快地行动起来，要在为鼓励更好地工作而推行物质刺激方面有所作为。尤其是波兰拥有令人羡慕的人力资源和文化素质良好的干部基础，在就业人数中有大约六十万人具有高等文化水平，三百五十万人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这二者相当于当时南斯拉夫的全部就业人数(约四百万)。启用这样一支专业劳动大军，促使更好地、更有成效地工作，打下真正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要成倍地挖掘出国家的潜力，获取更大的成果。但是，这并非轻而易举所能做到的。这不仅取决于更多的报酬，而且取决于是否将这些人安排到机关或生产部门中工作，他们处于怎样的社会地位，以及什么样的气氛在社会关系中占优势。

在大会以前以及在大会的材料中，对此都作出了评价。过去，甚至连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是在领导层的小范围内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例如，关于曾经引起波罗的海地区混乱的种种措施的问题，只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极小范围内进行过讨论。讨论和批评的机会甚至在政府一级都受到限制。因此，正像人们所说的，这样的领导方法就导致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消极被动，遏制了各部和各总管理局的主动精神，而企业的经营状况又是取决于它们的工作和指示的。在这种情况下，

还怎么谈得上企业本身和地方机关的主动精神呢？

新领导在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的决议中，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在关于发展政策和领导经济的工作中，国家应继续起主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必需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和独立性，这样也会加强他们对工作和工作成果的责任感。国家实际上是一个管理整个经济、领导复杂经济机构的“超级企业”。因此，应当排除那种又重新时兴起来的老一套作法，即：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或者，党和国家同时平行地管理经济事务。

按照这种观点，还需要把党的工作和国家的领导分开。为此，第六次代表大会没有制订发展经济的新的五年计划，而只是拟订了五年计划的思想政治纲领。计划应该由政府去制订，而实际通过计划则完全属于议会的权利。

根据这条路线，也考虑到在波兰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在制订宪法的权利归还议会的同时，需要加强人民统一阵线、工会和其它社会团体的作用，以便通过这些组织更多地、尽量公开地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并对它施加影响。在人民防卫、政治领导等一切核心部门，都应更多地挑选产业工人参加，因为他们将能使这些部门的领导接近劳动人民的生活和了解他们的问题。永远同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协商，这也是盖莱克所作出的保证的一部分。

盖莱克的幻想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始至终都是按照预

定的方针进行的。盖莱克的主要报告，也是以这一方针为依据的。他再次强调，要通过采取一切与生活水平有关的措施，为提高生活水平而斗争。这是国家内部发展的最重要的、最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所有代表都拥护盖莱克的路线，并表示党、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愿意为它的实现作出贡献。

盖莱克在闭幕词中说：

“第六次代表大会实现了我们的期望，全体一致地坚持了原则性。从这个原则性出发，我们党摒弃了领导方法中的缺陷，在自己的工作中恢复了列宁的原则。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为加强党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之间的联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联系是党的思想政治力量的主要源泉，是党的活动在一切生活领域中获得成功的保证，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

应该补充一句，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还有很多外国党的代表团。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他高度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以原则性的、果敢的行动，纠正了在波兰出现的错误倾向。他特别强调了爱德华·盖莱克个人所作出的努力，并肯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以及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中的活动。

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新成员，其中多半是产业工人。这一点被认为是对未来的保证，使党和工人阶级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使领导和工人更加接近。

政治局也发生了变化，解除了约·西伦凯维兹、米·莫查

尔和斯·英德里霍夫斯基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他们都是“老近卫军”。

被选入政治局的新成员有：科学家、教育部长亨·雅布翁斯基、计划委员会主席米·雅盖尔斯基、内务部长弗·什拉赫齐茨以及国防部长沃·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毫无疑问，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是适时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首先，它十分有力地、全面地填补了在波罗的海地区十二月事件一周年之际可能出现的真空。这样，就没有留下任何余地引发此刻很可能出现的、唤起对这一事件回忆的事情，以及其它难以预料的事情和作法。确实，再也没有更好的、更有效的办法来迎接这个敏感的一周年了。

其次，以盖莱克为首的新领导，发扬忘我精神，在非常艰苦的客观条件下，战胜了波兰战后的一次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从而在大会上获得了党和公众的充分支持。新领导在此后四年的任期内是稳固的，得到了充分信任。

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家今后发展的方针，虽然当时这个方针本身并没有在体制的改变上提出什么带有根本性的新东西，但它开辟了通往经济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道路。这个方针继续坚持中央计划和国家领导经济作为基本制度，但提出了较多的灵活性并要求完善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并使这些机构适应解决实际问题和需要。更多地强调了在顺利地实现国家计划范围内发挥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实行一定的“市场”制度，但要以国家机关的严格监督为前提，使计划规定的数据不至于被搞乱。

为了使确立的体制发挥作用，就需要有一大批年轻的、有能力的、有文化的人。因为他们会从新的角度来理解波兰国家和社会对于现代化技术、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这个国家不缺乏这样的人材，并对他们寄予巨大的希望。即使体制本身不发生什么重大的新变化，这批人也会带来一些新时代的精神气息。

一句话，召开了一个为形势所迫的、急需的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在其可能限度和职权范围内解决问题的代表大会。盖莱克提出了“为了人的社会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当时在波兰要求变革的愿望。同时它也是旨在表明要同三年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划清界限。

五个“好年成”

这样，波兰就开始了“盖莱克时代”，更确切地说，是盖莱克的十年。这个时代开始是很困难的，但是充满着希望。力量虽不很大，但可以壮大和加强。

最初几年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兴旺景象，这既表现在生产的成绩上，也表现在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的气氛上。

这个时期一开始，幸好赶上东西方关系解冻，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赫尔辛基召开。世界市场比较有利的行情，使波兰新领导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向整个世界敞开大门，然后向西方寻求巨额贷款。当时得到贷款也相对地比较容易，因为在那种形势下，西方财团也认为波兰不仅可以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而且也可以成为向其它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渗

入西方商品和技术工艺的枢纽。

波兰人本来就急于使自己的经济现代化，他们确信有可能较大规模地扩展经济，并较快地纳入发达的和现代化的经济轨道。因此，他们带着极大的自信心向西方寻求大量贷款，购买专利，进口现代工艺。

看来，遵循这种方针和观念，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投资日益增多，到七十年代中期，投资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诚然，只是在一年多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困难增加，贷款条件日益苛刻，波兰商品投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削弱，这一切都表现为业已成熟的经济危机中最困难的因素。但是，在1972、1973和1974年，在波兰仍然是一个成就和希望战胜了困难和社会紧张气氛的时期。

在过去一段时期，哥穆尔卡提出对于生活水平的看法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应该生活得尽量俭朴一些。与此不同的是，现在，盖莱克提出了另一种口号：更多地工作，才能挣更多的报酬，才能更多地购买和消费。他向矿工们说："你们拿出更多的煤炭来，让我们去换外汇，用更多的外汇就可以进口更多的商品。因此，你们多工作就会有更多的商品，有更多的报酬来购买更多的东西！"

报酬增多了，这是因为实行了物质刺激的奖励制度，尽管这种制度还有不少缺陷。商店里的商品品种增加了，不仅有本国商品，而且也有进口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以前好多了。

由于波兰的货币比价定得不很实际，因此制定了其它多种比价（旅游比价，外汇储蓄比价等等），以便尽量更多地吸收

外汇，使来到波兰的外国人在这里花掉自己的外汇。

外国的观察家和记者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到波兰，想看一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关心这里的巨大变化。人们确实穿得更好了，供应也更好了。现代化的商店、超级市场和百货商店也越来越多。购买小轿车也不必等很长时间。如果用外汇购买的话，甚至马上就能提货。住宅建筑也活跃起来了，仅1972年就修建了十六万套住宅，而整个五年计划打算修建一百万套。

实际上，新领导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他们指望采取一种实质上是通货膨胀的政策来刺激消费、刺激生产。于是，在迄今为止消费品不足和市场供应很差的情况下，提高工资和购买力，这等于火上加油。

当然，以上这一切，都是用以冲破过去的障碍，发挥人们主动性的第一个步骤，同时也是对新领导的实际考验。因为他们想表明，他们是把人和人们的需要，而不是把某种一般性的社会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

按照波兰的惯例，在报刊上、在电视中、在政论文章中，对这一新形势展开了很多讨论。著名的经济学家利平斯基提出，不要过分地追求“汽车文明”(当时购买汽车的需求已经大大地增长)，而首先应该是“住宅文明”，因为住房同其它需要相比更为急迫，此外，还因为住房不足，出生率就会下降。有人说：“年青夫妇首先需要的是床铺，而不是汽车。”另外一些人认为，这两种“文明”都不可排除，都很需要。甚至有人还补充了第三种所谓“电气文明”，因为人们也需要家用电气设备和其它一切现代化的生活用具。

气候在变化

"消费心理"的普遍化，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波兰居民去国外旅行也越来越容易了。在长期受限制之后，大批波兰人现在享受着出国探亲访友和旅行的自由。和民主德国签订了护照免办入出境签证的协议，这样波兰人可以直接进入东德，德国人也可以直接进入波兰。波兰人出国是为了采购，但也是出于一种打破多年封闭的纯粹心理上的需要。

盖莱克仍然坚持自己的工作方式，还是几乎每天都会见各种代表团并同他们谈话。到工厂、城镇和学校巡视，参加各种集会和庆祝活动。他表现出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主人，在这些会见中，他努力创造一种直接的、自然的、非正式的气氛，这种气氛反映了领导和人民的密切关系。在一次对工厂的访问中，他注意到工人们都穿着新工作服，于是就问工人是什么时候得到新工作服的，工人们回答："今天早上！"他转过身去简短地对工厂的行政领导人说："我不是为了竞选代表来的。我下次再来吧！"说罢，便转身离去了。

1977年3月，议会进行选举，有一百多万青年第一次参加投票，也有很多年轻人被选为议员，盖莱克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八的选票，在选举中赢得了个人的胜利。

社会上的气氛逐步地发生了变化。当时有一位评论家写道："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往往被指责为懒惰的波兰人，也想要更好地、更有效地工作了，但必须在获得很好的报酬和基本上满意自己工作的条件下……"

一位外国记者证实，在人们中间没有象过去那种可以觉察到的不安情绪。他们现在比较满意了。因为，他们至少消息比较灵通了。这位记者写道："在哥穆尔卡时期，政治局是秘密地工作。一切情报都掌握在上层。而现在，比方说，每个人都知道政治局每星期二召开会议，还会发表关于会议的公报。"

公开报道的形式也更加丰富、更加灵活了。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居民和政府之间有了比较直接的联系。

在这期间，还完成了一项重大的改革，这就是国家按省、区进行行政区划。采取这一行动，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行政区划从全国解放以后就几乎没有变动过。省的划分还是在过去确定的。当时波兰还处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政权制度的统治之下。

确实，过去实行的是很僵化的、所谓三级制的政权机构——区、县、省。这使地方和中央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联系非常困难，从上下达每项决定和从下递上每个申诉和建议，都要通过所有三级，这是一种繁琐的行政阶梯。

决定取消县，只保留区和省，这样可以分别给予这两级以更大的权力。人们认为，这样做将会打破地方性的"封地"，在这种"封地"里，县的官僚主义者长期安家筑巢，既逃避自下而上的监督，又逃避自上而下的监督。而两级的行政体制则可以更多地发挥区的主动性，省这一级也可以更多地接近基层，接近居民的日常生活。

同时，还进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干部制度的改革。恢复了过去曾经设立过的省长职位。现在省长成了省里的第一号

行政职务。这样做也满足了波兰人对传统的偏好。

当然，人们也并非过着毫无困难、毫无问题的安逸生活，但毕竟保证了某种稳定和“上升的路线”。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在这段时期，波兰的人口达到将近三千五百万，也就是说，整个民族将完全恢复并且还要扩大。就业人数将达到一千二百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将达到三千美元。

最初的困难和新的骚动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又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困难。这时，世界上出现了危机将要到来的征兆。这表现为通货膨胀加剧、石油涨价、关闭某些市场等等。所有这些，都开始对与世界经济有着多方面联系的波兰的状况产生了影响。

波兰的外债近一百七十亿美元。虽然国家还是有偿付能力的，是能偿还债务的，但偿还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了。靠取得投资性贷款进行某些项目的建设期限延长了。这就需要日益增加新的资金。而其中某些项目又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例如，“卡托维兹”钢铁厂，要将它建成为欧洲最大的钢铁工厂之一。由于一些外国的市场关闭了，也由于波兰商品的质量不能令人满意而缺乏足够的竞争能力，波兰对外国的出口越来越困难。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已经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需要不断地通过新的贷款来解决遇到的问题。

此外，波兰的农业也由于干旱、水灾或严寒不幸遇上连续歉收的年份。粮食，这个波兰经济最敏感的环节又重新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波兰需要年复一年地进口七百万到九百万

吨小麦，同时还需要进口大量的饲料。这都大大地加重了国际支付的负担，并且重新出现明显的缺粮现象。

实质上没有什么变化的价格制度，仍然是建立在国家调节的基础上，而在恶化了的条件下，非经济价格在市场上引起了更多的不正常现象，导致了生产的亏损和商品的短缺。

1975 年 12 月，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虽然当时已经显示出新困难的几乎一切征兆，而且也明显地感觉到经济中和社会中的趋势的变化，但是，这次代表大会仍然坚持继续致力于工业的迅速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等等。大会的基本观点是，波兰不能放弃既定的经济政策，而且必须坚决加以贯彻。至于出现的困难，应该在前进中去克服，而不能影响到改变方针。

但是，实际却是另一回事。它并不听从于任何按照既定的政策路线制订的、往往不符合新情况的指示和计划。

半年之后，在 1976 年 6 月，领导上认识到，原来的农产品价格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或者说，用来自预算的巨额补贴人为地维持农业的办法不能继续实行下去了。但是，由于价格不是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而是由国家决定的，所以必须由政府下令决定提高肉类和其它一些产品的价格。实际上，采取了和六年前哥穆尔卡时期几乎同样的步骤。而当时曾经引起了波罗的海地区的骚动，导致领导下台。

现在，公众的反响也几乎是同样的。又重新开始了罢工和骚动。在拥有二十万人口的拉多姆市，“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钢铁厂的工人走上街头，组织游行示威，引起了严重冲突，党委会大楼被烧毁；华沙“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其它一

些地方也发生了骚动；铁路工人也行动起来了，列车停止了运行。

为不使骚动扩展开来，避免引起更坏的后果，彼·雅罗谢维奇政府马上撤消了提价的决定。

一切又都恢复了原状。

“蓬勃发展”的反面

尽管新发生的事件被认为是有害的并公开受到谴责，但是当时已经可以看出，工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又重新破裂了，信任动摇了。虽然，这次动荡没有形成更广泛的规模，但是，已足以使迄今为止的气氛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肉和肉类价格又重新成为神经痛的痛点，某种混乱现象正围绕着它在蠕动。谁都知道，目前的价格是一种非经济价格。谁都知道，国家要继续拿出一大笔补贴。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前一个时期还进行了宣传，列举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并且说，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另外一种价格制度下，物价上涨威胁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波兰的价格制度下，国家保证价格稳定，并用补贴维护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想法和习惯。因此，破坏这种“优越性”总是引起很大的反应。

由于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低价格就促使大量的需求。根据波兰的统计资料，波兰人按人口平均每年的肉类消费量为七十点三公斤，几乎和法国相同，比意大利和奥地利还要多。由于需求扩大，也使其它食品供不应求。在生产不足和

农业歉收的情况下，肉类短缺是常事。然而，每一次采取限制需求的提价，又总是遇到强烈的反对。

当然，肉类问题并不是不满的唯一原因。简单地解释为是肉类供应问题，也不能说明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平中问题的全部真相。但是，由于各种情况凑在一起，肉类问题仿佛包含着这个国家经济政策中的很多矛盾，一碰到肉，就会牵动所有其它问题的链条，以致引起链条的断裂。

虽然，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等处发生骚动之后，社会上的气氛开始尖锐化了，但是，领导上还是继续执行既定的政策，并要人们相信暂时的困难是会被战胜的。

1976年10月初，在华沙工业学院开办科学讲座的传统纪念会上，盖莱克对大学生说：

"我们决不允许浪费时间，必须克服困难和压力，更快地前进，发展我们的国家，实现党的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实现每一项政策，我们都必须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

很难说清盖莱克所想象的是什么样的代价，但是，仍然可以得出结论，他所持的观点是：如果改变"蓬勃发展"的既定政策，就会使国民经济落后，就会减少就业人数，从而加深社会上的紧张情绪。

形势确实复杂。市场上的均衡被严重地打乱了。由于多种原因，生产费用不断增加，并要求提高商品的价格。但一提高价格，就又会威胁到关于生活水平的政策，而这又是迄今为止领导的成绩和威望赖以存在的基础。因此，当时还是继续大谈其"蓬勃发展"，而很少讲到平衡和稳定。

教会在舞台上

在当时的情势下，不只是党对社会的状况表示担忧，天主教教会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示了同样的忧虑。他们竭力做到在每一种场合都露面，处于一种给教徒们出主意的地位。每逢出现困难的时刻，教会总是堂堂正正地出场。

有一次，盖莱克在回答一个工人提出的国家和教会的关系问题时说，在波兰“国家和教会之间没有冲突，在政府和教徒之间也如此”。在他表态之后，紧接着以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为首的主教团也作了回答。在书面文件中，主教团表示：“认真的劳动和忘我精神的基本条件是对政权的信任，而政权通过自己对全体居民的福利的真正关心才能获得这种信任……”

在文件中还说：“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克服我们国家面临的困难。”

显然，这份文件的措词并非全部都得到了当局的赞赏。文件也并没有暗示教会和政府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盟”。但是，有一点还是很清楚的，双方都是从国家所处的现实情况出发，都是从必须尊重这一现实情况的事实出发。

同教会寻求共同语言的下一个重要步骤，就是爱德华·盖莱克对梵蒂冈的访问，也就是他在1977年12月对教皇保罗六世的访问。在访问中，他告诉教皇说：在波兰实际上不再存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冲突的形势；相反地，双方都希望为实现一个伟大的、全民族的目标而共同作出贡献。当时盖莱克说：“使我们联合起来的事情，以及我们同波兰教会的最高首领维

辛斯基红衣大主教在有关我们不久以前的谈话的声明中共同强调的事情，就是对我们祖国命运的担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六百多万波兰人被杀害，他们是作为为祖国的自由付出代价而牺牲的。在他们中间，有成千为自由而牺牲的天主教教士……”

盖莱克还补充谈到，整个波兰民族不仅为国家的发展而推崇爱国主义的团结，而且正在努力克服信仰上的差异。

这种对波兰教会在维护民族统一中的作用所作的肯定的评价，为广大的天主教教士所接受和欢迎。这加强了教会和政府关系上的“伙伴趋势”，但教会也在小心提防赋与这种趋势以政治性质。它的活动和影响将首先表现在信仰和社会道德上，因为它知道，这样才能最直接地触及每个人本身和每个家庭的生活。

经济中的严重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深化了。这迫使领导上终究要在经济政策上采取某些重大行动。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上，都提出和深入研究了所谓经济手段的概念。

采取这一步骤的目的是，由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不好，在改变了的和恶化了的条件下，坚持“蓬勃发展”的同时，使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目标有比较实际的措施。打算作出一定的改变，把力量集中用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最直接相关的那些部门。这样，居于优先地位的任务主要是：住宅、食品、一般消费品、出口、服务行业项目。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取消其它一些同样也是重要的需求，首先是取消吞噬了大量资金的一些投资项目。但具体取

消哪一些项目呢？政府要求无论如何要把那些最大的项目保留下来，因为这关系到政府自己的发展政策。雅罗谢维奇总理在递交给议会的关于“经济手段”的报告中，提出了必须保证不受限制的重大项目的清单。例如，修建“卡托维兹”钢铁厂就是战后波兰最大的一笔投资。

撤消的项目主要是各省、区和市的一大批较小规模的投资。这类投资项目在整个波兰为数众多。近几年来，独特的“地方分立主义”发展了。这并不奇怪。由于建设大的中心而长期被忽视的“波兰各省”开始活跃起来。它们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自信心，在各区和各省都拟订出各种自作主张的计划，为了完成这些计划而经常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求获得补贴。在波兰的财政体制中，补贴起着决定性作用。正象人们所证实的，“不是挖掘自己的储备，而是首先采用官僚们的狡猾手段和夸大问题的方法”，从中央获得补贴。往往把从中央获得某些地方项目的补贴，当作地方的领导和行政机构有能力解决本地区问题的证明。

此外，新的行政区划将原来的二十二个省增加为四十九个省。这本应减轻分立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压力，然而，实际表明，这将是一个不会那么迅速奏效的漫长过程。

“经济手段”要求党和政府机构作出巨大努力，并且要得到居民的支持。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解释“经济手段”的意义，使人们理解和接受。1977年9月的九中全会就是为此而召开的。在会上，对国家机构、经济部门、企业和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怎样扩大生产、厉行节约、提高生产效率等指示。全会决定于1978年1月召开全国党

代表会议，在此以前，必须作出一定的成绩，并改变现状。动员了所有舆论工具、报纸、广播、电视和社会团体，齐头并进，大张旗鼓宣传“经济手段”，正象在当时流传的笑话中所说的，这是一场大“演习”。

能源危机

“经济手段”只收到了部分的、极其有限的效果。它没有能够解决波兰的经济结构所引起的主要问题，这种经济结构是由于当时实行的投资计划所形成的。在投资计划中，冶金工业、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比重增大了，而食品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下降了。

确实，国家的经济潜力在继续增长，尽管并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近几年来，波兰建成了一系列大型工厂，也建设了很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城市干线、现代化的旅馆、百货商店等等）。的确，不能再说城市和住宅区象过去那样是一片灰色，也不能说建筑形式单调而划一了。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存在着紧张的经济形势，正象1979年11月《人民论坛报》所报道的，因为国家“已经被长期的工业革命、投资的热潮、粗放的经营、大量增加的就业和广泛使用外国贷款等等消耗殆尽。”

能源危机，是出现的新困难。对于一个遍布煤炭的国家来说，看起来这是非比寻常的。可是，新时期的波兰，象其它国家一样，越来越多地依靠石油，而所有对石油的需求都要通过进口来满足。每当东西方的石油明显提价的时候，能源危

机就接踵登门而来，迅速波及全波兰。一些工厂不得不暂时停工，日用消费受到严格限制，从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农业遇到严酷的、接连不断的歉收年。1980 年初出现空前的严寒，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79年，在比过去更加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进口九百万吨小麦。

波兰确实面临严峻考验，经济学家们认为，除上述情况外，还有主观因素。这表现为“粗放的经营、社会纪律松弛，以及对浪费现象漠不关心的趋向”。

开始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外汇投机、个人发财致富和贪污等现象。这一切也影响到社会上的道德状况。例如，人们说，哪里存在两种货币，哪里就会有两种道德。而在波兰有着多种货币，既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使用多种货币必然导致非法行径。同时，这一切又引起了自食其力的人的强烈不满。

在这种气氛下，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作家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增长了。文化生活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变得日益贫乏和拘谨。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政论家的名字逐渐从报纸上、从书店橱窗里消失了。对文化生活拥有监督权的机构增多了。对作品实行检查的作法，使许多作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一度使舆论生活富有特色的广泛的讨论活动也减少了。

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两类出版活动：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一些作品以特殊的方式（油印、复制）公诸于世，人们互相传阅，以逃避检查。

一些知识分子、记者、政论家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某些留在国内的自称为“叛逆者”。他们编写宣言、请愿书、书信，以尖刻的批评反对政府。在他们中间也有党员，

但也有站在反共立场的人。成立了“叛逆者”小组，其名称为“KOR”(保卫工人委员会)，从而同党的领导和政府发生了冲突。在个别情况下，当局采取了压制手段，于是更加扩大了不信任的鸿沟。

所有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预定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以及会前进行的讨论过程中。

教皇的来访意味着什么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桩大事，从它的规模和在公众中间留下的印象来说，确实是没有先例的。1979年6月，克拉科夫从前的主教卡罗尔·沃依蒂瓦，即现在世界天主教领袖约翰一保罗二世教皇，访问了自己的祖国——波兰。

一个波兰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红衣主教被选为教皇，这本身至少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的宝座一直把持在意大利人手里，而现在却选择了一个外国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于是，从很多方面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天主教教会未来将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它同社会主义国家将会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不是梵蒂冈的某种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行动吗？

当沃依蒂瓦教皇决定访问自己祖国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处于一种不寻常的境地。教皇昨天还是波兰的主教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而今天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天主教教徒的领袖；他是一个波兰人，但同时又是一个主权国家——梵蒂冈的首脑。

领导考虑到各种情况，首先是考虑到人们的情绪，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适当的、也是唯一可能的立场。他们虽然理解这次访问的微妙作用，但还是尽一切努力使访问进行得圆满而有成效，甚至在国家所处的那种形势下，要使这次访问能够为促进全体波兰人的团结，改善社会气氛和推进教会同国家的关系作出贡献，而所有这一切都能对国内气氛的稳定发生影响。

沃依蒂瓦教皇走下飞机，吻着故乡的胸膛，开始了自己庄严隆重的祖国之行。迎接他的是众多的教徒们，参加露天做弥撒的人数达两百万之多。在波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人，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的领袖，能够象他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听众。在华沙、克拉科夫、琴希托霍瓦以及在他所到之处，人们象潮水一般淹没了街道、广场和路边的空地。这真是一幅别开生面的社会景观。虽然过去人们也都知道，波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且教会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一次却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天主教行列。

教皇会见了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说教会承认现存政权，甚至将会帮助它，并表示希望政府尊重波兰公民的信仰和其它权利。

教皇在对信徒们发表演说时指出，波兰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为它工作，并告诫教徒们，决定他们命运的地方将在这里，在波兰，在欧洲中部的这块土地上，而不是在西方，或者其它什么地方。

教皇走遍了全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随即离开了。一切都很有秩序地、平静地度过了，没有出现任何故障和不愉快的

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正常现象。同时，这次访问也没有使人感到有什么明显的后果。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这时才看出教皇的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从教士们和信徒们的举止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会感到自己更强大、更自信、也更有吸引力了，并且想要世人皆知，有口皆碑。这不仅反映在教士们的传教中，而且也反映在对于“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以及他们提出的某些要求中。一言以蔽之，教会竭力在群众中加强自己作为波兰社会结构一支现实力量的地位。

一位外国评论家在谈到教皇的访问时写道：“这不是一次地震，而只是一次轻微的气候变化，但这样的气候变化有时也足以引起一年中的风云变幻。”

波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国内继续在筹备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广泛地讨论着代表大会的提纲，议论着社会经济状况。党列举了波兰已经和可能取得的成绩，即波兰按人口平均为三千美元以上的国民收入，从而成为中等程度发达的国家。波兰的工业已经能够制造诸如计算机、集成电路、程序控制机床、小轿车、家用电器设备等产品。国内保证充分就业，因为近十年来开辟了二百五十万新的工作岗位。从哥穆尔卡时代起，就业一直是困扰波兰领导人的问题之一。这是不奇怪的，因为战后的波兰是欧洲出生率最高的国家，那时出生的、为数众多的一代即将成长起来。

生活水平也比前一个时期有所提高。如果拿汽车的数量来衡量生活水平的话（现在小轿车已经成为一种需要，而不是奢侈），可以看出，1970 年每七十一个人有一辆汽车，而 1980 年每十八个人就有一辆汽车。

此外，正象前面已经讲到的，波兰经济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除了食品、肉类和其它一般消费品长期供应不足以外，能源的日益短缺也越来越突出。

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提出了新的关于下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的建议。从实际面临的困难出发，领导有意识地在计划的前三年整顿经济状况，建立对能源状况的监督，再就是改善铁路交通状况，加速发展食品经济。

在新的计划中，没有规定象前一个时期那样的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但为此也规划了比较符合现代化的国家发展途径。新的、命名为“维斯瓦”的综合规划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这个规划预计要解决贯穿波兰全国的最大河流流域的基础设施、水利工程、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

这样，大幅度减少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把建设方向由重工业转移到通盘解决国内问题，解决人民的需要方面来。

现在，在经济效果和利用三十多年来形成的巨大潜力上面，波兰人看到了主要的希望。如果使这些潜力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要改变工作态度，采用另一种方式组织经济管理，采取措施使经济企业自主化。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来自工厂和企业的代表，根据自己集体的实践，分析了现存的管理体制和设计体制，并公开指出

了它的许多缺陷。他们要求尽快改革和完善这种与现实生产力明显不协调的结构。实际上，是在大会讲坛上继续了公众中早已开始的讨论，参加这一讨论的有经济学家、报刊和大批工人。在所有这些讨论中都贯穿着一个愿望：争取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加强工人的自治作用。

盖莱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会的讨论。他在报告中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到1983年底，在所有的经济部门中，完善并建立新的经济的、财贸的、组织的经济管理体制。正象盖莱克所说的，这个体制将唤起责任感、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对经济核算的重视。这个体制也将确定体现经济价格的作用。这是一个急待尽早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的价格制度如同一块绊脚石，使得无论什么样的改革都无法推进。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领导上作了人事变动。彼·雅罗谢维奇退出政治局，并在当天辞去政府总理职务。在大会文件中，政府受到严厉批评，因为它缺乏主动性，对党的领导所建议的改革推进得很缓慢，过多地靠发指示办事，某些部的工作缺乏效率，等等。很明显，在党的领导层本身，包括雅罗谢维奇在内，对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看法。斯·奥尔绍夫斯基离开政治局就说明了这一点。他被认为是对领导工作和政府工作作出过分尖锐批评的批评家。

大会之后，议会马上提名爱德华·巴比乌赫为总理。他早在盖莱克上台时，就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也是盖莱克最亲密的共事者之一。他是经济学硕士，党的富有经验的工作者，并多年担任华沙党组织书记。

在新的政治局里，除了盖莱克以外，还有：爱·巴比乌赫、

兹·格鲁津、亨·雅布翁斯基、米·雅盖尔斯基、沃·雅鲁泽尔斯基、斯·卡尼亚、阿·卡尔科什卡、斯·科瓦尔奇克、弗·克鲁切克、耶·乌卡谢维奇、扬·什德拉克、安·维尔布兰、塔·弗热什奇克。

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卡·巴尔齐科夫斯基、约·平科夫斯基、塔·佩卡、埃·沃伊塔谢克和兹·然达罗夫斯基。

政治局和政府的人事变动，意味着新班子将在大会纲领的基础上，更坚决、更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因为这也是形势的要求。

很多人相信和期待着新的人马会立即开始并广泛地进行经济改革，纠正业已明显暴露出来的弱点。但也有人对仅仅撤换几个人物，并且只是换掉上层的人物，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在现政权机构中，仅就政府的工作而言，就受很多因素的限制，而且问题也并不完全在于政府的组成如何。他们回顾过去的情况指出，波兰多次出现危机的形势，都是通过人事的更换寻找出路，并把罪责推到那些走下政治舞台的人身上，而极少讲到危机的深刻原因，也极少谈到管理体制本身对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全部工作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人事变动是必要的，特别是为了使领导班子年青化，但仅仅这样还不能够解决积累成堆的问题。

波兰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动精神

在同国内困难进行如此艰巨斗争的时候，波兰领导在国

际政治中采取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步骤。盖莱克知道，波兰内部困难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中的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困难。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以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尖锐的交锋，缓和变成了危机，新的冲突中心不断地开辟。而波兰需要和平，因为，很明显，只有在缓和的气氛中，才能比较有效地赢得较长时期来解决它所遇到的困难。

在忠于华沙条约国政策，并与苏联保持步调一致的同时，盖莱克采取主动同西方建立联系，继续进行缓和的对话。他利用自己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国享有的个人声誉，安排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和勃列日涅夫在华沙的会晤。尽管他自己没有参加，但是作为这次会晤的东道主，他当然还是在世界舆论中赢得了较高的评价；虽然德斯坦和勃列日涅夫的会晤并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结果，但毕竟为维护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出了贡献。

盖莱克继续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提出在华沙举行两大集团代表的扩大会议，以便继续进行缓和的对话。

作为下一个实际步骤，盖莱克商定了对西德的访问，即对施密特总理的访问。而施密特在西方也扮演着和盖莱克同样的角色。

所有这些主动性和实际活动，都提高了波兰的声誉，因为波兰在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中，成了一个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但是，就在盖莱克访问施密特的前夕，这个过程由于波兰的内部事件而中止了。

新任政府总理爱·巴比乌赫大概想尽快消除怀疑和消极情绪，在议会的政策报告中，马上宣布了要实行某些改革。他声称改善经济状况的巨大潜力在于划分中央和地方机关之间的权限。他说，在现行结构的范围内实行一定的分权化之后，将会给干部、劳动集体和全体劳动者带来极大的主动性。

1980年春天，巴比乌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相当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也同样地是从人事调整开始的，撤换了几百名企业经理，在他们中间，有的是被认为在那个职位上呆得时间太久了，有的是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作出应有的成绩。

这种在公众中引起了不同反应的敏感的行动，预示政府决心另敲锣鼓重开张，以便改变现状。

不久，即见诸于行动了。

1980年6月，政府制订了一项关于肉类和其它一些食品新价格的决议。决议的根据是：这些价格长期冻结不能再维持下去，而且供应问题也不能靠国家拨出大量补贴人为地保持低价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决定冻结工资基金，在所谓“议价商店”中提高肉类价格。这冒很大风险。但是，显然，政府未能找到其它不同办法。

这项措施马上引起了反对和不满的浪潮，仿佛1970年和1976年的旧剧又开始重演了。“乌尔苏斯”工厂的工人再次举行罢工，他们还联合了华沙“热兰”汽车厂的工人。罢工开始在华沙的交通运输企业中扩展开来。卢布林的罢工规模最大，那里大批的人停止了工作。

对于所有这一切，政府马上作出了反应，但不是采取某种压制手段，而是试图使罢工者的要求同自己的意图协调起来。

政府同意给经济上遇到最大困难的行业，如机器制造、运输和公用事业增加工资。

但是，这似乎无济于事。在整个7月份，忽而在这一地区，忽而在另一地区，此起彼伏，不断地发生罢工。在忙于提高工资的地方，那里事态稍许好些，而在其它地方则又闹腾起来。就这样，整个国家又处于一种极度沸腾而紧张的气氛之中。

政府急切地要求平息罢工，疏导不满情绪，并保持和平安定的气氛。

8月12日，星期二，负责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耶·乌卡谢维奇在华沙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宣布罢工已停止，国内很有秩序，工人阶级对政府的努力表示充分理解。

波罗的海地区旧戏重演

但是，这只是一种幻想。整个国家仍然处于不安和徘徊之中，不满情绪在滋长，丝毫没有显示出一点平息的征状。

记者招待会开过仅仅两天，即8月14日，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停止了工作。这里在1970年12月曾经发生过骚动，现在这次罢工浪潮，波及的面更广，声势更大。紧接着举行罢工的是格丁尼亚、索波特、埃尔布隆克的工人，随后是什切青的工人。大规模的罢工浪潮再次席卷了整个波罗的海地区。

8月15日，星期五，爱·巴比乌赫总理对罢工工人和全体人民发表电视演说，试图解释国家正处在左右为难、进退维

谷的夹缝之中，政府要满足罢工者的要求又有多么困难。他许诺将肉类价格冻结到1981年的下一个收获季节，并继续呼吁要限制增加工资，因为那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巴比乌赫说："多年来，我们分配的多于我们所生产的，我国的国民收入高于我们的社会产品，我们是借助于外国贷款而发展起来的。"

巴比乌赫的呼吁没有得到任何反响。更有甚者，他指出已经出现反社会主义分子可能利用和正在加以利用的形势，这种说法更加激怒了工人，罢工迅即扩展开来，造船厂停工了，港口停止接待外国船只和为外国船只卸货，国内运输也停顿了。

但是，可以明显地感到，这一次罢工同1970年的情况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人们没有走上街头，没有发生任何骚乱和冲突，也没有造成牺牲。罢工工人在自己工厂的范围内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它领导罢工并负责维持秩序和保持安定。这可以使人们回想到1970年什切青工人的罢工，那时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组织罢工的。现在到处都吸取了这个经验：没有骚乱地罢工，坚持自己的要求！

六、罢工和谈判

格但斯克的“列宁”造船厂，是这个城市最大的集体，也是这次罢工运动的中心。在这里组成了由其它工厂的罢工委员会选派代表参加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了领导中心，也就是波罗的海地区所有罢工委员会的区域性领导。它的主席莱赫·瓦文萨是一名电工，在1970年罢工和后来的1976年罢工期间就出了名。此刻，他已成为公认的、也是所有罢工者十分推崇的领袖。

在罢工者举行的集会上，工人、家庭妇女、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都发表演说，“叛逆者”的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也在集会上讲话。这个组织同党和政府的官方政策发生冲突已经有几年时间了。不久以前，它要求在波兰成立自由工会。一批教士在造船厂内临时设置了神坛，组织名为“为了波兰人和祖国”的弥撒。在墙上和建筑物上，可以看到悬挂着教皇沃依蒂瓦的照片。

罢工者中间也有许多党员，一些地方党的领导人也站在罢工者一边，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罢工者提出的全部要求。

领导上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措施，而是不断地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盖莱克也通过电视对罢工者发表演说，并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漏洞，但是，他呼吁要保持健康的理智，并号召进行协商。

盖莱克呼吁，“我们应该协商”，并宣布党将坚决地回到1971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回到“十二月政策”上去，因为，近几年来，在许多方面都背离了这些决定和政策。

后来，罢工并没有缓和下来。国家生活陷于摊痪。港口上停泊着一百多艘装有原材料的船只，而波兰的工厂没有这些原材料是无法开工的。这时，就连国家如此急需的食品，也无法运往内地。

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要求同政府谈判。开始政府没有接受，认为这样的委员会不能成为它的谈判对手。政府期待着罢工者象1970年一样接受它的自我批评和作出的保证，给予领导以充分的信任，并继续解决矛盾。

但是，这次情况却完全不同。罢工者不肯退让，他们提出了包括二十一项要求的文件，要求同政府就这一文件进行谈判。政府终于被迫答应谈判。

在什切青也建立了象格但斯克这样的罢工委员会，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因此，政府先派塔·佩卡，后来又派政府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米·雅盖尔斯基到格但斯克参加谈判，而派另一名政府副总理卡·巴尔齐科夫斯基到什切青。

这样，就开始了不仅是在战后的波兰，而且也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不寻常的谈判。

工人大讲坛

与此同时，罢工遍及了整个波兰，波及其它一些大单位，他们都支持波罗的海地区的罢工。各地的罢工虽不是同时

发生，也不是使用同一种方式，但各地都表示同样的愿望，并支持波罗的海地区罢工者的要求。

例如，在克拉科夫，拥有四万人的大型钢铁厂——“诺瓦胡塔”钢铁厂，又名“列宁”钢铁厂，那里罢工是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地逐步展开的，其顺序是：轧钢车间、机械车间、炼钢车间和运输部门等等。

当波罗的海地区的罢工开始以后的一个星期，“诺瓦胡塔”钢铁厂也停止了工作。那时，一个工人对厂里的气氛作了如下描绘：

“在我们轧钢车间，通过扩音器宣布（车间里噪音很大，因此，我们所有的通知都是由扩音器播送的）不要再出钢材了，因为，我们罢工了！您知道，我在这个钢铁厂已经干了很长时间了，我熟悉人们，知道他们不那么容易被怂恿和欺骗。他们曾经五次反复考虑该怎么办，因为钢铁厂的工作要求非常要有秩序和谨慎。但是，这一次，当播出这个‘不要再出钢材了，因为，我们罢工了’的通知时，人们全都停了下来。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情：人们真正地厌烦了，厌烦得厉害！”

在这里，工人们当然知道熄灭钢铁厂的高炉意味着什么，因此，按车间地进行了罢工。一些人提出自己的要求，同经理室进行谈判，然后返回工作岗位，另一些人又停止了工作，如此等等。8月25日深夜，钢铁厂的最紧要关头来临了，工人们停止了厂内交通运输。这实际上是使整个钢铁厂陷入瘫痪。运输工人同经理室的谈判从二十三时持续到第二天清晨。直到上午十一时左右，同冶金部进行的关于工人的要求的谈判结束之后，运输才恢复。

这个钢铁厂如同所有其它地方一样，围绕着新工会的问题展开了最激烈的讨论，工人们提出了非常具体的问题：

——加入新工会是否意味着自动退出旧工会？

——互助金和工人需要归还它的债务应该怎样处理？

——如果加入新工会，过去由旧工会提供的疗养证，是否继续保留和有效？

到9月初，该厂登记加入新工会的已经超过一万人，即占全体职工人数的四分之一。除上述这些问题以外，还对其它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讨论。

一个工人说："在我们这里对人所作的各种各样的划分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又是党员和非党员，又是教徒和非教徒，又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难道我们不都是波兰人吗？难道我们不愿意自豪地呼唤'波兰'和'社会主义'的称号吗？"

一个女工高声说道："我以就业妇女和波兰母亲的名义发言。我们要大声疾呼：我们愿意工作得更快更好，但毕竟也想安谧地生活。妇女的工资同男人的工资不一样，我们的家庭预算总是不足，尤其是那些单独过活而又有孩子的妇女……"

发言的人排成队，每个人都讲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并且多数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但是，当一位发言者从"谁也没有证实过没有上帝"开始讲起天主教教义时，大厅里引起一阵骚动和笑声。"够了！够了！你还是让神父去讲这些吧，这是他的事情！"

人们打断了他的话，并继续发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波兹南的大型"采盖尔斯基"钢铁厂的情况吧。这里的工人在1956年6月同保安部的冲突中，有

些工人被打死在波兹南的街头。

这一次，“采盖尔斯基”工厂在 8 月 28 日和 29 日(星期五和星期六)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如同一位罢工委员会成员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次警告性的和团结的罢工。在这里也是全部时间都在提要求，并展开激烈的争论。

罢工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除了同波罗的海地区一致的基本要求以外，我们自己还提出大约三百项要求。这些要求都近乎是琐碎的、局部的，但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却是重要的。”

这个厂全体职工中，现有一万八千名新的一代工人，但是，大家对于 1956 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当时的牺牲，都记忆犹新。

整个波兰都是如此。

到处都在谈论，到处都在批评，到处都在提要求。这一切都涉及到社会问题、住房、工资、劳动保护、车间的卫生条件、领导人的官僚主义行为、社会差别等等。一直保持着劳动者和劳动集体所需要的气氛。当然，在这里也有自发势力的成分。在这方面，可以引用在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工作的马莱克·诺瓦克的话：

“我们决不容忍自发势力。因为在一段时间里开始形成了某种‘欲望论’，也就是说，在共同决定的要求之外又不断补充新的、谁也满足不了的要求……。因此，我们自己制止了它。现在，到了对一切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在辽阔的波兰大地上，到处都有工人阶级的声音，他们开始讲到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事情，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波罗的海地区，因为那里正进行着重要的斗争。在这个时刻，那里的结局决定着一切人的命运，也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在罢工的浪潮中，8 月 24 日在华沙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四中全会，全会就整个形势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听取了政治局委员斯·卡尼亚作的关于国内情况的介绍。讨论是坦率的、尖锐的，同时表明领导层中对形势的评价并不一致，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措施的意见也不尽相同。

这次全会的消息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政治局进行了重大的人事变动：撤消了总理巴比乌赫、负责宣传工作的耶·乌卡谢维奇、工会主席扬·什德拉克以及塔·弗热什奇克的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职务。

新的政府

同时，选举斯·奥尔绍夫斯基和约·平科夫斯基为政治局委员，选举耶·瓦什楚克和安·热宾斯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次全会上，盖莱克发表了演说，他认为应该尽快实行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对经济政策的改革，并呼吁全体波兰人团结和安定。

同一天，政府也进行了改组，选举了约·平科夫斯基接替巴比乌赫担任新总理。

波兰工会也承担了大部分责任，选举了冶金工人罗·扬科夫斯基担任工会主席，接替了扬·什德拉克。扬科夫斯基马上宣布要对工会的组织工作进行根本性改革。

这些急剧的、令人目眩的变化，使波兰的公众和全世界都感到极大的意外。然而，总的来说，它对波罗的海地区的罢工工人和他们的观点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罢工工人的代表

们表示，他们并没有要求党和国家上层作任何人事变动，对于他们来说，最主要的是首先要接受他们列入文件的二十一项要求。

在罢工者的要求中，有一些是社会和经济要求，例如：提高工资、建设住宅、缩短工作时间、建立儿童福利设施等。但也有一些是纯政治性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罢工权利、取消书刊检查、释放政治犯、通过电视和广播转播教会的弥撒等等。

主要要求是组织"独立自治工会"。这个工会将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在同党和政府的关系中保持独立性。罢工者表示，承认党在波兰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尊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打算把这个工会当作政党来发挥作用，也不希望对以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作任何改变。关于这些要求的谈判经历着漫长的、艰难的进程。整个国家，以至全世界眼睛都在盯着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大厅。在那里，罢工者为自己的每一项要求都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在谈判过程中，不断同华沙取得联系的政府代表，不得不一再让步。

为了说明谈判的课题是多么微妙，而谈判进行得又是多么艰难，我们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也就是已经达成协议中的两点：

"在第二点要求中提出：保证罢工的权利以及罢工者和援助罢工者的人身安全。——对此，兹规定：

罢工的权利将在新的工会法中予以保证。该项法律应规定宣布罢工和组织罢工的条件，解决争端的方法和破坏权利的责任。'劳动法'的第五十二、六十四和六十五条不适用于罢工的参加者。在新的工会法通过之前，政府将保证罢工的

参加者和支持者的人身安全及原有的工作条件。

在第三点要求中提出：尊重宪法所保证的言论自由、报刊和出版自由，不取缔独立办报，使宣传工具成为持各种信仰的人士都可享用的宣传工具。对此，兹规定：

政府将在三个月内向议会提交关于检查报刊、出版物和文娱活动的法律草案，拟定该项法律草案依据以下原则：

检查应该维护国家利益。这应该理解为：保守在法律条令规定范围内的国家和经济机密，保证国家的及其国际利益的安全，尊重宗教信仰者和无神论者的感情，以及防止扩散道德上有害的内容。法律草案还应规定，对报刊、出版和文娱活动的检查机构的决定，有向最高行政法院申诉的权利。这项权利还应在补充修定'行政工作法'时予以考虑。

广播、电视、报刊和出版活动，必须为反映各种思想、观点和意见服务。这类活动应受到社会的监督。"

怎样挽回信任

围绕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发生了最大的争执。这种工会意味着什么呢？它将怎样发展呢？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是一项罢工者最坚决捍卫的要求，同时也是最不明确的要求。这样的工会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真正起决定性的作用。

看来，在这项要求中反映出波兰很多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建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表明了工人阶级对待这些矛盾的立场。

罢工工人感到，不能再恢复到1956年和1970年的那种情况了。当时，在罢工和动乱以后，更换了政治领导人。然后，受到信任的新领导又继续领导国家，并解决造成危机的问题。罢工者很清楚，在波兰存在和发展的现实条件下，如果没有党和国家，是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的；但他们同时也知道，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直接参与和监督，党和政府就可能脱离工人阶级及其利益。其实，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会前和会上，关于这一点，就进行过许多讨论。当时，一些代表发言都表示要加强社会民主化，发展企业自治。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响。

这次，工人们则想把某种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用来直接保卫他们曾经为之而奋斗的利益。但是，这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至今为止的工会，一般地说，就是管理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对它缺乏更多的信任。一度自发形成的工人委员会曾经被寄予很大希望，但实际上，它们已经被废除而不复存在了。在此以后建立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也没有作出任何成绩。

显然，工人不可能进行某种重大的选择，而在那种形势下，他们仍旧感到，手中没有其它武器，就不能放弃罢工。于是，起着参谋作用的知识分子的建议——成立自由工会——就被采纳了，而工人们自己也提不出其它形式。

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波兰社会所特有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党之间互不信任，达到了顶峰。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以后，萨特就在其著名的《斯大林的幽灵》一文中提到过。他尖锐地写

道:“……如果党不首先信任群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形成基层对机构的监督,群众怎么可能信任党呢?……”

此时此刻,波兰党确实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近十年中,党是否有能力,是否有勇气去信任群众,以及党是否能够期待挽回群众对它的信任?

这些问题看起来是抽象的、理论性的,但现在却非常具体地摆在格但斯克的谈判桌上,并且要求作出回答:怎么样挽回信任?

在过去十年中以至更早一些时候,不能说在这方面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在某些时候,党确实表示过要建立和加强信任的愿望和意图。国内民主化的某些尝试、工人自治的确立、直接和工人阶级协商,等等,本身都带有这种信任的萌芽。但是,官僚主义的冷风又重新把它们冻僵,毁掉了它们的生命。

现在,看来一切必须从头做起,首先要弄清楚“独立工会”这个不够明确的概念。

独立工会应当是罢工者渴望为工人阶级争得的主要武器,以便工人阶级借助于它,并利用罢工的权利,去防止造成当前危机的一切东西。至于这种工会将是个什么样的工会,将怎样发挥职能,当时还不知道,也并不很明确。

在谈判过程中,谈判时而变成广泛讨论的讲坛,公开揭露出来的许多现象引起了工人和其他阶层居民的愤怒。

关于工资谈论极多。过去在政治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所有报告中,通常是引用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数字,在波兰,1980年前八个月的平均工资是五千三百九十七兹罗提,确实比上年多二百九十七兹罗提。但是,只要稍加具体地分析,就可以看

出，在这个平均数背后潜藏着很大的工资差别，实际上存在着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多十一倍的情况。大家知道，连绝对不赞成平均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社会上能够接受的高低工资之间的差别应该最高不超过五倍，但这里却大大地高于这个数字。经济部门中的最低工资为二千兹罗提；中等水平的工资，教师为四千五百九十兹罗提，工人为三千五百至七千兹罗提，工程师为六千九百兹罗提，医生为八千三百零四兹罗提，等等。一些联合企业经理和政治官员的工资为二万八千至三万兹罗提。

是什么激起了工人的愤怒

在一个大厅里，一位代表走上讲台，他读了报上的一则报道，谈到一个合作社的经理怎样为自己领取四十万兹罗提的奖金，而这个合作社当时却给国家带来了八千万兹罗提的亏损。

当时，华沙正流传着各种油印的小报，在小报中肯定地说，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委员、议会议员马·什切潘斯基拥有巨大的财富，私人快艇、七辆小轿车、住宅和别墅，并在国外购置私人财产。小报要求对这个情况进行追究。

后来，这个情况被证实了，什切潘斯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并将剥夺他的议会议员的豁免权，检察院将对他提起公诉。他不仅拥有大量个人财产，而且还滥用职权，盗用外汇和耗费人力，任意到世界各地旅行，并在波兰各地招待自己的外国客人。他在国外建立了业务分支机构，从中捞取

很大好处。他还签订了共同生产、联播电影片的合同，接受贿赂。仅仅在一桩事情上，他耍手段在外国银行就弄到一百五十万美元。这种犯罪行为只能在享有高级特权的官僚主义者的圈子里才能存在和发展，因为他们享有巨大特权使用社会财富，而不受任何监督。

进行类似投机勾当的，还有卡齐米日·蒂兰斯基，他是“米涅克斯”公司的总经理、外贸部长负责进口投资装备的全权代表。在同外国商行联系的过程中，他接受了巨额贿赂。从奥地利一家商行获得四十六万美元，从瑞典一个康采恩得到二十五万美元，而给自己企业带来的损失分别为四十七万三千马克和三十一万一千美元。他的妻子塔莱莎·蒂兰斯卡也参与了他在国外搞的大量阴谋勾当。

这只是两个最重大的事例，也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事例。因此，工人们并不是偶然地在会上提出：首先要对那些握有很大权力的官员进行检查，看看他们是否“干净”，然后再允许他们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这并不仅仅是对个别人的怀疑，而是对整个机构的怀疑。怀疑这种机构是否已发展成为特权体系，并且使干部变质了。

罢工者的注意力并非只集中在工资、社会差别和物质问题上，同时还涉及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些“铁腕”人物，如何善于“收拾”那些不满的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罢工者广泛议论着著名科学家布诺佐夫斯基教授的遭遇。这位教授是塑料专家，是十项专利和发明的作者，他的一项发明1975年在日内瓦获得奖章，一度成为世界驰名的人物。但是，当他所在的化学研究所换了新所长的时候，据说是布诺佐夫斯基

如何反对新所长，于是新所长就决定“收拾”他一下，把他调到一个建筑研究所。这样，他就不能再继续进行那些颇有发展前景的研究工作了。尽管工会对此提出了抗议，尽管报纸也报道：“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不去进行塑料的研究，却去搅拌混凝土。”但情况并没有改变。

类似这样使人震惊、令人义愤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

这只是当政府委员会和罢工委员会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进行长时间的、艰巨的谈判时，笼罩着工厂和城市气氛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的警告

在这种气氛下，还发生了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工人罢工的经典概念和为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通常总是以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和无产阶级的标语等等作为标志。但是，这一次在工厂的院子里，最经常出现的却是民族的旗帜、宗教的标志和教皇的照片。这说明了两个情况：第一，对党的信任遭到了破坏（这在前面已经谈到了）；第二，天主教的巨大影响。天主教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在这里又是主动的参与者。这是一种从上到下的主动性，从最上层的教皇和红衣大主教维辛斯基（他们曾寄手谕给罢工者），到普通教士（他们到工厂去作弥撒）。教会首先是作为道德的因素、安定和平的因素和民族团结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亲自向群众宣讲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手谕，他说：“在这个极其困难的时期，需要和平、镇静、谨

慎和对整个波兰民族的责任感。对波兰的维护不能是消极等待，它要求积极努力，使我们祖国恢复和平和安定，特别是肩负国家发展责任的政府，需要认真履行职责，消除影响整个民族的困难……。我们民族刚刚在经济上开始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多工作，少借债，更多地对外国出口，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波兰的分裂会使欧洲国家的平衡遭到破坏。波兰人必须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因为他们对它的开发负有责任，正象每个民族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波兰民族需要有民族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独立性。”

当然，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的讲话，绝大部分充满了宗教内容，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讲话实际上是政治性的，尤其是那个富有特色的警告——欧洲国家的平衡取决于波兰。

同1970年相比，那时教会即使是直接参加了，但也很少出面，而现在教会则直接进入工厂，布置了神坛和十字架，党在那里留下的空白，被教会填补了。此外，可以看到，一年前教皇的访问，这一“不动声色”的行动，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气候”，教会的影响扩大了，它分担了对国家命运的责任。

然而，很难说，在这次罢工中是工人阶级匆忙投入了教会的怀抱，从而工人阶级为已经获得的成果而成为教会的债户。其实，首先应该说是教会欠了工人阶级的债，因为罢工工人为教会争得了一定的权利（通过电台转播弥撒），这是教会本身过去所没有争得到的。

在罢工过程中，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叛逆者”，起了一定的参谋作用。罢工领袖们不仅不掩盖这一点，而且宣称这是给予罢工者的帮助，因为在谈判中聘请他们当专家。由于

他们的参谋作用，工人们得到了一些好处，例如：释放政治犯、提出报刊检查的问题等等。虽然，这些“叛逆者”毫无疑义是有影响的，但是，不能说，工人们接受了他们的立场。工人们利用了他们的建议，但却是由自己作出决定，并且经常提醒他们：工人们不愿被人操纵。

尽管有各种力量参加并发挥影响，尽管都试图争取工人阶级，但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工人阶级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工人中间存在着各种观点上的差别，存在着某种动摇，但他们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的口号，没有置身于任何人的庇护之下。阶级利益仍然是某种最强烈的和最实在的东西。这次也反映出这一点。在这一次，阶级本身直接体现了这种阶级利益。

协　议

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国内的生活已经瘫痪了。连日来，在波罗的海港口停泊了近百艘船只。船上装有十三万吨石油、七万五千吨柠檬、大量的蛋白质饲料、一些工厂所必需的加工材料，等等。波兰每天要付给外国船主一千五百至五千美元的补偿费。成千辆卡车等着装货运往国外。工厂停产造成的损失估计达数百亿兹罗提。因此，在这些日子里，人们谈论说，如果罢工持续更久的话，国家就要遭受一场经济上的大灾难。

世界上人们紧张地注视着，波兰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考虑到波兰的政治地理和战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它所陷入的危机会不会影响到世界力量的均势以及集团之间的关系？最

后会不会诱发他人插手这个危机？所有其它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似乎在这段时间里都凝固不动了。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对这个国家采取任何欠考虑的步骤，在当前形势下，都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事态对一切人的回答仍然是应尽快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并由波兰人民自己来解决。落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颗火星都不可避免地会燃起一场火灾。因此，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提出了直接的或者委婉的告诫：不要插手波兰！

8 月 30 日(星期六)格但斯克的谈判突然中断了，形势一下子变得危急起来。看来，这是罢工者和政府代表之间力量和神经的最后较量。当时，参加罢工的已将近七十五万工人。

双方的理智和为了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思想很快就占了上风，并且在 8 月 31 日(星期日)签署了协议。

这也许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份最不寻常的协议书。在这个国家里，交手的双方似乎结束了一场不流血的战斗，宣布不存在战胜者和战败者，而真正获得胜利的是波兰。不管在修辞上给人的印象如何，但这是真实的。

在什切青，前一天就签署了协议，因为那里的谈判进程略为有点不同。

代表政府在格但斯克的协议上签字的有：政府副总理米·雅盖尔斯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兹·杰林斯基、格但斯克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塔·菲什巴赫和格但斯克省长耶·科诺杰伊斯基；代表罢工委员会签字的有：罢工委员会主席莱·瓦文萨、两位副主席博·利斯和安·科沃杰伊，以及十五名委员会的成员。

在什切青，代表政府签字的有：副总理卡·巴尔齐科夫斯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安·热宾斯基、什切青的省委第一书记雅·布雷赫；代表罢工委员会签字的有：罢工委员会主席马·尤尔奇克、两名副主席卡·菲什海贝因和马·尤什楚克。

参加谈判的人都发表了谈话，对于顺利完成这一重要工作表示满意。

这还不是真正的结局。

盖莱克下台

工人们停止了罢工，并从9月1日起开始回去上班。在波兰，9月1日这一天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1939年的这一天，希特勒进攻波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那九月的日子里，波兰人民进行了英勇抵抗，这至今仍然留在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们的记忆之中。

波罗的海地区结束罢工，使全国和全世界如释重负。诚然，国内还有一些地方在罢工，但那主要是涉及地方上的问题，对已达成的协议没有太大影响。

在华沙，随即开始解决党的最高级领导问题。社会危机反映到党内来，这种党内危机必须予以彻底解决。虽然，在更换总理、改组政府以后，新总理平科夫斯基在议会对于过去发生的事件作了批判性的分析，就解决最主要问题的临时性计划提出了建议，但人们感到这并不等于全部解决了问题。震动太强烈了，不会就此结束。

终于，在9月5日午夜，议会辩论结束之后，马上召开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会上解除了爱德华·盖莱克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情况也真凑巧，他和十年前的瓦·哥穆尔卡几乎完全一样地下了台，具体情节也很相似。那一天，把他送进了医院，次日才发表病情公告，说他前一天在心肌梗塞发作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力衰竭。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几个月，盖莱克作为党的第一书记给哥穆尔卡发了贺电，祝贺他七十五岁诞辰（当时哥穆尔卡作为退休干部住在华沙），电报强调了这位老革命家、工人阶级的战士为党和波兰人民建立的功勋。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在舆论中提到哥穆尔卡的名字。

可是，现在盖莱克也下台了。

全会选举了斯塔尼斯瓦夫·卡尼亚担任新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后来人们才知道，在那决定性的日子里，他领导过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这使波兰公众感到意外，但可以看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一致选举了卡尼亚掌握党领导的方向盘。不应忘记，在这之前，领导人中间曾出现过严重分化。现在的一致，说明再也没有其他人是大家都能同意的了。

这只是会议的开始，这次会议将持续一个月，因此，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

经济危机就是政治危机

同一天，议会也举行了会议。这是最高级的第一个公开

讲坛。在讲坛上，人们坦率地批评了过去的事情和国内的状况。虽然，从组成来说，这仍是罢工以前的同一个议会，但议员们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了，似乎在他们中间迸发出了某种怒火。他们通过了刚刚同罢工者签订的协议，并继续对社会上的情况进行批评和分析。这种批评和分析是从工厂的礼堂和格但斯克造船厂开始的，而在华沙维依斯卡大街的圆顶大厦里继续了格但斯克大厅里的讨论。

最有特色的是著名社会学教授扬·什切潘斯基的发言。此人1957年曾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诊断的企图》，在波兰引起一场很大的争论。

而现在，什切潘斯基，这位多年的议员、非党人士、国务委员会委员，出于政治责任感和科学家的良心，试图成为波兰社会状况的“诊断者”。

“可以说，人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在走向危机。”什切潘斯基博士说：“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和推测中估计到正在到来的危机。只要听一听工人们在工厂，人民群众在商店门前的队列中谈论些什么就足够了。同时，应该认识到，人民很清楚地看到了国家的和经济的状况。可是，政治家们、报刊、广播和电视却不愿谈到这一点。很难设想，那些政治家和记者们在发表谈话和进行公开报道时，会不知道国内正在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知道得非常清楚。但是，坦率地说，出于各种原因，他们认为在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时，需要装出一副天真的、一无所知的样子。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必须马上停止。在今天的讨论中，应当针对实质性的东西。这次讨论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原因，评价恢复经济的措施，而不是在

车轮断裂之后再来卖弄为时已晚的勇敢和聪明。”

扬·什切潘斯基接着说：“总理今天的讲话，只谈到生活的一个领域——经济。这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因为它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就其本身的意识形态来说，是政治对经济实行绝对的控制。我国的经济危机是在政治危机及由它引起的社会冲突的强烈影响下出现的。人们知道，所有那些有关巨额投资的经济决定都是一种政治决定……”

什切潘斯基教授继续问道：“波兰是否存在着充满乐观主义的力量？我们是否有可能摆脱危机？绝对有的！我首先是从罢工工人的能力上看到了这种可能。他们在很短时间内用非常成功的方法组织了生活，这种方法可以作为行政机关的样板。我看到，他们在那些没有停止工作的群众的支持下，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情绪。这样一个事实也增强了我们的乐观情绪。在党内和政府里有英明的人物，他们都能现实地考虑问题，没有允许使用武力，没有使罢工变为象 1956 年、1970 年和 1976 年那样的流血冲突。

人民有意志和信心，人民是会管理的。只要党的领导人和政府找到方法发挥人民的意志和能力。”

议会的讨论非常尖锐并富有批判精神，通过了平科夫斯基建议的“第一筐子”措施，也就是初步的措施。但是，在所有议员的发言中都表示，必须进行更加深刻、更加持久的改革才能恢复群众的信任，才能避免新的动荡。

议会中的公开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不是讨论有关国家局势的唯一场所。各工厂、机关都举行了集会。社会上各

阶层、各行业、不同年龄的人都发表了意见。

在电影工作者的集会上，著名导演安·瓦依达谈到波兰社会生活中特有的"道德上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宣扬道德准则的基调同完全相反的实际作法共存……为了良心的安宁或者个人的安全，我们互相原谅谎言、欺骗和公众中的不法行为，而把诚实、正直和真理留在家庭里或者亲朋挚友的圈子里。"

任何报纸、杂志和书籍，都不可能汇集或者哪怕是部分地反映这无数次讨论的规模和内容。在这些讨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发言，都认为应当讲点什么，或者是就什么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不愿当领袖"

此刻，很少有人羡慕那些走上领导岗位，并承担艰巨任务和重大责任的人。这首先是指新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卡尼亚，因为，按照老传统和实际权力，这个职务不仅在党内，而且在整个国家里始终是一个关键性的职位。

虽然公众对他不太熟悉（他在政治局负责军事、保卫和公安工作），虽然迄今为止他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作为，但他却立即得到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各级领导的支持，并很快得到了国外的支持，首先是苏联的支持。勃列日涅夫衷心祝贺他，并对他表示信任，称他是"为波兰人民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为巩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加强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以及为发展同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而斗争

的坚强战士。”同时，贺电还谈到了苏联在波兰今后的发展中所希望看到的一切。这种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从其它地方也发来了贺电。种种情况的汇集，正如同当年的爱德华·盖莱克一样，把卡尼亚放到了领袖的位置上。

然而，卡尼亚一出任就把自己同领袖的角色划分开来。还在他向中央委员们对选举表示感谢的时候，就补充说了这么一段话：“有的同志在这里以最好的意愿把我称为党的新的领袖，我并不认为需要由我来担任领袖，也不认为党必须要有领袖人物……”

卡尼亚接连几天既没有在公开场合，也没有在电视屏幕上露面。但是，他立即着手进行了一些很不显眼的党内工作，因为当时党内的秩序极其混乱。他是否理解到了历史性时刻的召唤及其使命，即党的作用取决于波兰的现实，党仍然是波兰人民命运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为此他必须坚强起来，并站稳脚跟。

几天以后，在一次讲话中，他没有指名地谈到，在群众工作中，在加强党同工人阶级联系的过程中，“有多少双手就去握多少双手”，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很明显，这是对盖莱克的工作方式的讥讽，因为，十年来盖莱克每天都接待代表团，下工厂，和工人们握手，而且还在报纸的头版刊登照片。

从各方面来看，卡尼亚想要奉行新的工作方式，虽然还不知道这种方式实际将是个什么样子，但可以预计首先会致力于加强党的领导。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现在其他一些高级官员也在公众中间发表了很多谈话，例如：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总理平科夫斯基、政治局委员雅盖尔斯基、奥尔绍

夫斯基，等等。

卡尼亚在格但斯克谈到，首先要制订党的新纲领，因为出现了新的形势。

在一些集会上，也提到了集体领导的问题，以及需要改变过分强调任何个人作用的情况。

卡尼亚不辞辛苦地巡视各省的党组织，首先是格但斯克、什切青、卡托维兹、克拉科夫、波兹南和其它地区。他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而只是指示党的领导人怎样同罢工者一起执行协议，怎样恢复党的工作，怎样解决最迫切的任务。而其它政治局委员则出访各社会主义国家，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介绍波兰事件和波兰党的政策。与此同时，政府则落实议会最近一次会议上制订的经济任务。这些急迫的任务不可能那么迅速地得到解决，因为很多部门的生产削弱了，要弥补罢工期间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困难的。整个混乱状态还在继续。

但是，领导上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讨论和批评中讲得很多而在协议中又居于重要地位的长期任务——经济改革。关于这项任务，在协议中是这样说的："经济改革必须以扩大企业的独立性和工人自治机构实际参与领导为基础。应该通过相应的决定保证工会的作用，如协议的第一条所规定的那样。"

政治局和政府马上成立了"经济改革委员会"，以总理平科夫斯基为首，以斯·奥尔绍夫斯基为副，成员包括有声望的科学家，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以及直接来自生产第一线的代表。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为在全国实行综合经济改革奠定基础。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安排是：1982 年底以前，使已经确

立的经济职能原则在一切经济部门付诸实施。然后，在执行过程中将逐步制订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取决于委员会制订措施的准备情况和执行措施的经济组织的准备情况。

9月17日，该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制订了工作计划。平科夫斯基和奥尔绍夫斯基强调指出，社会上对委员会的工作寄予很大希望。

平科夫斯基说："将来改革的关键问题，是经济组织的独立性问题。在加强这一独立性的同时，必须加强这些组织对工作效率的责任心，尤其必须提高企业的劳动效率和工资水平，以及改善集体的社会条件。扩大基层经济组织的独立性和责任感，必须与加强中央计划化和控制发展战略的步调一致。必须在制订计划过程中找到一种解决办法以提高五年计划在指导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这些原则都不是新的。早在1957年兰格经济改革委员会的时期就听说过了，后来也曾多次听到过。显然，问题不在于原则本身，而在于实际贯彻，更多地是取决于要改革和不要改革这两种主张的力量对比。

翌日，9月18日，波兰经济学家协会也召开了会议，讨论了经济改革和参加经济改革准备工作的方式。经济学家们强调，经济改革的过程不能有技术至上主义的性质。这种改革必须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内容，它将改变人们的观点和论据，因为经济活动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首先取决于人们的观点和论据。因此，根据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改革必须与管理过程中广泛的民主化相联系，这样才能在组织国家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发挥所有参加者的创造能力。

在这次会上，波兰经济学家们认为，如果不在作决定的中央实行改革，就很难为扩大经济中的自治和独立性创造条件，也很难为“经济核算”创造条件。如果不对中央的计划化、工作和领导的方法与作风、标准、结构等进行改革，改革是不会成功的。迄今为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

关于计划和计划化，经济学家们说，它不应成为“自上而下地规定指标和任务的体系，而应依据劳动集体和企业领导所确认的实际生产能力，提出增加生产任务的论据”。

从各方面来看，改革已提到议事日程，人们充分意识到，这将是一项艰巨而严肃的任务，它将决定着波兰社会的许多其它进程。

新工会与党对它的态度

改革工作展开后，也许是因为很少有惊人的东西，更多地是靠经济学家和专家们在工作，所以罢工者的主要要求——建立新工会——则成了广大公众注意的中心。

在这里，回顾一下格但斯克协议的那个关键部分是有益的，协议声称：

“1. 波兰人民共和国工会联合会的活动没有实现就业者的希望和期待。如果新工会正成为劳动人民阶级的真正代表的话，建立新的自治工会被认为是正确的，任何人都有权留在原工会里，而且存在着今后各工会组织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2. 在建立新的、独立的、自治的工会时，厂际罢工委员会确认，它将尊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原则。新工会将维护

就业者的社会和物质利益，并不谋求起政党作用。新工会坚持作为波兰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在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内的领导作用，不轻视业已建立的国际联盟体系的同时，新工会力求获得保障劳动人民拥有监督、发表意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相应手段。”

协议更明确地规定，新工会“得对以下涉及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关键性决定公开发表意见：关于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原则，关于用于（卫生、教育、文化）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关于奖励的基本原则及工资政策的方针，特别是关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工资自动调整原则，关于长期经济计划，关于投资方向和价格变化，等等。政府负责保障履行上述职能的各项条件……”

由于协议的签订马上就面临着新工会的成立和登记的问题。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 9 月 13 日作出了关于登记方法的决定。在这项决定中说，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必须到华沙省法院登记，除工会的名称外，要写明它的活动项目，创建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在决定中还说：必须向法院递交未来工会组织“不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它法律条令”的章程。国务委员会的决定还提到：“如果在工会或工会的地区性联合会登记之后证实其活动和结构违背现行法律条令，华沙省法院则可作出撤销登记的决定。”

虽然第一步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在建立新工会过程中，形式上的法律程序不会成为主要问题。最主要的是，他们将组成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在解决波兰所面临的大量问题中将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组织新工会，看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难预计它将会怎样发展下去。

首先，在罢工领导人中间，对于怎样组织新工会有不同看法。有的人主张地区性的组织和领导组成集中领导下的统一工会，而另一些人反对集中制，坚持建立强大的地区性组织，由共同的协商委员会协调他们的工作。9月17日，在格但斯克召开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会议上，多数投票赞成“弗罗茨瓦夫地区的主张”，建立统一工会，以“团结”工会的名称去登记，“格但斯克”的章程草案将作为它的基础。

新工会代表会议表明，对新工会的工作内容和全部活动的看法，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要取得一致意见，还将继续在一定时间内进行讨论。知识分子、教会以及旧工会实践的影响搅在一起而又彼此对峙，新工会的面目通过复杂的过程，才能逐渐明朗起来。

原来的某些行业工会开始脱离原工会组织，宣布成立独立工会。9月18日，在华沙举行了冶金工会总委员会全体会议宣布成立独立工会。

铁路工会总委员会也作出了类似的决定。考虑到，为了有成效地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需要工会的团结。为此目的，它准备同其它行业工会按照伙伴关系的原则进行合作。

农业工人总委员会宣布成立“独立和自治的、阶级的行业工会”。它从波兰工会联合会中划分出来，并宣称将为波兰所有农业工人工会的统一而斗争。

华沙印刷业团体的代表们建议，印刷工会已有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是波兰最古老的工会，它应修改章程，并召开特别

会议。如果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不采纳此项建议，他们将保留发起建立新的自治工会的权利。

10月初，某些行业工会开始召开各自的代表大会。新的独立工会不无猜疑地看待他们的这一举动，甚至指责他们企图对新工会搞分裂活动，并在其中制造混乱。然而，有些地方，行业工会同新的独立工会之间进行了协商和合作，例如，格但斯克的冶金工会同新的独立工会之间就达成了关于使用工会资金以及船舶工业医疗休养证的协议。

大学教授和科学工作者跟随工人阶级，同样表示也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工会。

记者们决定建立独立组织，他们根据格但斯克协议中有关报刊检查以及国家负责在三个月之内提出关于出版物检查的新法律的条款，要求改变对于报刊和新闻工作的关系。

很难预见，不久的将来在工会运动中或在波兰的运动中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现在只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旧的工会解体了，而独立工会在同自己队伍中的分歧作斗争，在同地方政权的阻力作斗争，以及在同自己领导的缺乏经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地在为自己铺平道路。

无疑，从上述这一切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困难而充满痛楚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过程，工人阶级通过不同意见、利益和影响的斗争，通过或多或少的彷徨徘徊，寻找通向统一的途径，或者可以说，寻找通向最适合它的多元主义的统一的途径。

使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寻求本阶级道路的内在过程，发生在格但斯克的独立工会会议上。在会上，罢工委员会主席、罢

工时期的当之无愧的工人英雄、同时被认为是具有天主教倾向的领导人莱·瓦文萨，在回答工会是否具有天主教色彩的问题时说："教会有自己本身的地盘。我和很多人一样是教徒，但我们不在工会里设立神坛！教会有其它的目标，有其自身的目标。共同点只是在于我们也为平等和诚实而斗争。"

瓦文萨曾提出不建立统一的地区性工会，但他的主张是少数，因此服从了多数人的决定，按地区原则("弗罗茨瓦夫概念")建立了统一组织。从格但斯克选出协商委员会负责领导整个"团结"工会组织的工作。

工人阶级内部的思想斗争和其它斗争肯定会长期延续下去。这对于党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尽管它犯了错误，威信遭到破坏，但很多工人还是在继续观望和等待着党的建议。他们的阶级利益也很自然地使他们向往着这一点。

还没等新工会第一次显示力量，党就提出了对工会问题的立场。党的机关报《人民论坛报》9月27日的文章，对这一观点作了详尽的说明，文章写道：

"党坚持一切工会共同发挥作用的观点，不把它们分成'新的'和'旧的'，'好的'或'坏的'……。只有劳动集体的成员有权决定自己属于哪个具体工会。准备拟定的工会法将创造条件，使工会运动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都能起到自治组织的作用。"

党的这一立场说明，领导中比较迅速地克服了围绕工会的作用和同工会的关系存在的分歧和波折。现在，对于党来说，有多少工会组织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同党将在多大程度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一致行动。

换句话说，波兰工会运动中的某种“多元主义”，不再同党格格不入了，因为在国内社会主义发展方面，在国内建设以及国际关系和义务的基本原则方面，就存在着“多元论”。

同时，国务委员会在9月23日任命了工作组，起草新的工会法。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法律专家、政治官员和经济学家外，还有罢工委员会的七名代表，其中有莱·瓦文萨和来自格但斯克的安·格维阿兹达。

大学生也登上了舞台

当然，对于出现的许多问题，只能从实践中得到具体答案。由于在决定工会命运的过程中，有一批原来在波兰工会运动中默默无闻的工人参加了进来，从而使整个工人阶级站稳了脚跟。因此，毫无疑问，这种实践将会是有趣的，虽然也可能是矛盾的。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最根本的是，工人阶级确实是靠自己内部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多种多样的力量进行自我组织的。任何强加的公式或由外部决定的方针，都会带来比波兰过去所经历过的更加困难的后果。

在社会上，一般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都不能忽视大学生。大罢工时，大学生正值假期，不在校内，因此，他们未能积极地参加，虽然也有个别大学生参加了波罗的海地区罢工者的活动。

但是，假期一俟结束，大学生联合会总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三天之后，提出了宣言，宣言中把1980年的波兰夏天评价

为“还在继续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

大学生在自己的宣言中声称：“我们向正在为社会主义理想——自由和正义——而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工人阶级致敬！”。他们还补充说，这是一场“向党和国家挑战、使任何人都不敢轻视”的斗争。

在表示希望尽快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同时，大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首先，他们要求青年更多地参与制订党的纲领，要求享有评价党对青年问题的决议的权力，要求在一切代表机构中有更大的代表性，以及实行各级领导干部轮换的原则。他们特别批评了教育改革，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这种教育改革没有保证加深知识、相应的价值标准以及年青一代的德育和美育的真正内容。

预定12月15日召开大学生非常代表大会，届时将准备一个大学生组织的新章程。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个组织建成为一个政治组织。

这样，波兰社会的所有阶层和几代人都卷进了高度政治性的活动。

农村发生了什么事情

由于波兰社会危机的主要中心在工厂和大城市，因而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农村平安无事，似乎农村处于所有这些进程和动荡之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产生危机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国内的食品供应。这恰恰

同农村和农业生产有直接关系。农业生产已经多年处于危机状态，其成因不只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且是由于至今一直受到严厉抨击的农业政策。

波兰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农民。目前，个体农户约有三百万户，占有百分之七十五的耕地，其中，大约四十万户个体农户拥有十公顷以上的耕地(在波兰，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是五十公顷)。这就是说，生产潜力低于大农场的小农经济占优势。尤其是，由于波兰的国营农场没有作出什么显著成绩，小农就成了主要生产力量。

国营农场的生产率非常低下，据《华沙生活报》报道：个体农民生产一公斤肉需要二点七五公斤粮食，而国营农场生产一公斤肉则需要四点〇六公斤粮食。如果国营农场能够做到象个体农民一样地消耗粮食，那么每年将节约二百三十万吨粮食，价值三亿美元。

现在，人们批评农业政策的依据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计算，并要求国营农场实行合理化生产，同时更多地帮助个体农民，使他们得到机械、肥料和种籽等等。人们认为，至今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帮助，因此，波兰的整个农业是落后的。

波兰农村长期是波兰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斯大林时期实行的集体化没有成功，后来被放弃了。农民的自愿互助形式(合作社、农业劳动小组)成效甚微。农产品的价格政策没有刺激生产的提高。在机械化和运用现代化的耕种方法方面都很落后。此外，还有恶劣的气候和连年歉收所造成的客观困难。

在目前活跃的讨论中，有这样一种意见：长期进口粮食和

牲畜饲料，削弱了农民和国营部门发展本身的生产基地和利用资源的责任感。目前大约有一百二十万农户不养猪，近一百万农户不养牛。如果对这些农户的情况稍加研究，就可看出那里还有生产饲料的很大潜力，利用这些潜力足可以发展畜牧业。正如人们所强调的，这也是在解决经济困难和居民供应问题时，应当很好考虑的波兰农业的一个实际情况。

除此以外，近十年来，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超过二百万。这削弱了农业的生产能力，而且也给城市的住房、供应、交通带来了新的困难。

党一向是和统一农民党一起研究和制定农业政策的。在议会中，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外，统一农民党拥有的席位最多。可以预料，这两个党今后也还会这样合作下去。但是，正象现在波兰社会的很多东西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一样，也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党，从其联盟的地位出发是否也会要求发挥某种其它作用，而在农村扩大自己的影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存在争夺政权的党派斗争，因为两党的关系早已被规定和确立在人民统一阵线的范围之内（同第三个党——民主党一起）。但是，也不排除会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新形式的利益多元主义，从而也反映出政党之间合作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七、戏还在演下去

波兰就这样进入了恢复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非常复杂、微妙和矛盾的过程。这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过程，因为它处在经济形势比罢工以前更为困难的条件之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由于混乱的生产情况而造成的损失，财政出现了大量亏空。政府承担了提高就业人员工资的义务，表现在数字上，这就意味着每年要追加开支一千一百五十亿兹罗提。为了满足提高了的购买力，就必须保证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但在这期间供应却减少了。

诚然，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以贷款和商品形式提供的援助，以及美国提供的购买小麦的贷款，能够暂时开辟一定的周转余地，但不可能解决实质性问题。

在这样的形势下，两次新的、颇有特点的对峙发生在格但斯克、什切青和希隆斯克达成协议一个月之后。第一次对峙规模较小，但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涉及到对待那些“叛逆者”的态度。第二次对峙则非常严重，也就是在全波兰进行的一小时“警告性总罢工”。

导致第一次对峙的缘由，是华沙电视台在一次电视节目中，播放了两个“叛逆者”——马·普洛宁斯基和雅·库龙对外国记者发表声明的摘录，希望波兰公众舆论确认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尤其是，库龙还谈到“绞死共产党人”。

对此，格但斯克独立“团结”工会的协商委员会作出了反应，断定这是用某些以前讲话声明剪辑而成的摘录，并对自己罢工时期的“顾问”予以保护。

警告性罢工

《华沙生活报》以比较缓和的语气对此作了回答。这家报纸写道：可以理解协商委员会对于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的“集体团结”精神，但必须把“昨天他们帮助了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帮助他们”这种风尚中的集体精神，同“叛逆者”早就表现出来的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制度的敌对立场区别开来。

新的独立工会对“叛逆者”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微妙了，问题不仅是由于内部产生了一定的误会，而且也是由于这种态度经常被当作一种口实，把工人阶级的全部活动说成是反社会主义力量的一部分和外部插手的结果。

围绕着执行协议的问题，缔约双方发生了严重对立。这指的是发生在10月3日的“警告性总罢工”。这一天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开始续会的前夕。

这个只延续一小时的罢工，是为了警告政府按时执行协议。我们不去描述这次罢工本身，只引用双方谈到这次罢工的文件。

格但斯克新工会的协商委员会发表声明强调说，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贯彻执行协议，有的地方甚至还推卸责任。声明说：

“到9月29日，只在一些企业签订了关于成立新工会的协

议，而一系列企业还没有同新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创建委员会谈判。行政上就单方面地作出了关于工资的决定，其方式是同工人所理解的公平合理背道而驰的。更多的情况是，在那些没有卷入广泛的罢工行动的地区，在实践中则不准许实施协议。地方上的政治机关和行政机关经常刁难和妨碍新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的活动，同时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借口反对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力量，利用宣传工具攻击新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已签订的协议的严重破坏。我们要求，政府在预定期限内诚心实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包括解决工资问题，解决舆论宣传工具问题，以及解决国家和政治机关对执行政府签了字的协议制造障碍的责任问题。为了支持这些要求，协商委员会被迫宣布全波兰举行一小时警告性罢工，时间是10月 3 日12点到13点，在警告性罢工期间将不提出新的要求……”

文件接着对应该怎样按企业组织罢工和怎样维持秩序，作了具体指示。

当局在接到罢工通知时，感到意外和不悦。政府副总理雅盖尔斯基马上赶到格但斯克，进行关于取消罢工的谈判。在报刊上指出，协商委员会的通知中所作的指责是一般性的和缺乏具体根据的，并指出，在已经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下，新的罢工会使政府履行义务的努力更加困难。仅增加工资一项就必须在一年内保证一千一百五十亿兹罗提，这要从债务或者投资和预算中提取这笔款项。报刊还提醒道：仅仅在机器工业中，一小时的停工就可能造成一亿兹罗提的损失。

但这一切仍然没有能够制止协商委员会的行动，按时举

行了罢工。显然，新工会需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检阅一下新组成的队伍。

第二天，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尼亚在其政治局的报告中，对这次罢工作了这样评价：

“对于协议签订前，议会公布政府的纲领以前的罢工和现在发生的罢工，应予以不同的评价……。昨天发生的一小时罢工引起了特殊的骚动和惊诧。它包括了很多省的企业，而且是由一些新工会的创建者宣布举行的。这一事态的情况迫使我们要认真地加以考虑。罢工的组织者声称，罢工带有警告的性质，因为政府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责任。可是，报刊和其它大量的报道材料提供了许多证据，说明政府始终一贯地在努力履行协议中所规定的义务，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政府的代表同工会筹建委员会的代表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说明了情况并对全部问题都作了解释。因此，政府没有使这次警告性罢工有任何借口。在10月2日那天，组织者甚至还自己主动表示准备取消罢工，他们递交了一份声明的文本，表示自己愿意在电视上公布，并得到了同意。但是，那时已经证实他们还是倾向于组织罢工。因此，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在干什么？国内的经济形势是众所周知的，罢工正在进一步破坏和恶化这个形势。这是什么工人阶级的利益？”

罢工是举行了。工人们的反响很大，虽然罢工者考虑到尽量减少对生产的破坏。有的地方没有停工，只在车间里挂起了旗帜和要求彻底履行责任的标语。

实际问题需要继续解决。罢工后的第二天（10月4日）在华沙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上，预期将对这方面的

问题提出最重要的说明和看法。

波兰人民共和国
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在耶路撒冷大街和乌亚兹道夫斯卡大街拐角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这就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这里曾发生过很多对于波兰来说是命运攸关的事件，但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象1980年10月4日、5日、6日进行的这种会议和讨论。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几乎是二十四小时连续不停地开会，在会上发言的人数超过七十人，而会议的气氛始终保持在沸点以上。

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国内完全是一种新的形势，按老一套办事明显地是行不通了，但对于下一步将怎么办的问题，谁都不能作出可信的回答。因此，人们都焦虑不安地期待着党的声音。党正在对自己的偏差和错误进行着最严厉的谴责。但在客观上它又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国家的舵手，它将说些什么呢？

第一书记卡尼亚代表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广泛地分析了已发生的事件和导致这些事件的原因。实际上，他所作的分析，仅仅是进一步分析的开场白。

卡尼亚在报告的开头说："对于今天的危机，对于这个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马上补充说，这场危机还在继续，工厂和企业里还可以

感到正在升高的温度和不安情绪，生产成果普遍很差，劳动生产率低下，纪律松弛，整个经济所发挥的效益明显地低于它的能力，市场平衡被破坏，农业的收成也比去年差。这就是今天波兰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党努力恢复信任、恢复同社会的联系的条件。

卡尼亚强调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冲突的最危险阶段用对话、协议和明智的妥协的方法来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在1956年6月和1970年12月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民族悲剧的主要方面，而且我们大家都要永远地记住它。”

今天，根据卡尼亚的说法，党内对于波兰发生的冲突性质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广大工人的抗议，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破坏；它不是反对人民政权，而是反对不好的管理方法；它不是反对党，而是反对党的政策中的错误。然而，不应该把这些评价简单化。这不是消费者的抗议，而是对自己共和国怀有主人翁感的阶级的抗议。正是这种主人翁感才使社会主义得以发展。社会主义唤起了人们的觉悟，敏锐地觉察到一切违背社会正义原则，践踏人类尊严的行为。

从这个观点出发，卡尼亚开始对前一段时期的事件、关系和人物作出了评价，并制订了今后的任务。

在讲到过去的十年，实际上也就是“盖莱克时代”，卡尼亚说：

“在过去的十年中，暴露出很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党按照人民的期望，依靠人民的广泛支持，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发展

国家，使经济现代化，提高生活水平，解决社会问题，这些方面都取得了具体的成果；另一方面，在党和国家的政策中，仍然是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严重的错误，随着实力的增长，产生了唯意志论和轻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

卡尼亚特别把这种唯意志论同投资政策，同它的结构，以及七十年代后半期继续实行这一经济政策的情况联系起来。而在七十年代后半期，已不存在执行这项经济政策的条件，并且情况也日益恶化了。

卡尼亚说："这十年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它的前半段取得了很多经济和社会的成就。波兰的一般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由此形成了、也是由我们大家去树立了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总理的威望。他们受到党的极大信任，然而他们手中也因此掌握了很大的、看来是过大的权力。于是，情况逐渐地变坏了。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能为中央委员会、特别是政治局进行辩护。因为，当错误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作出任何果断的反应。诚然，某些政治局委员曾经多次试图影响各种决定和纠正一些错误，但收效甚微，使中央和地方都很沮丧。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认为，问题在于主观上、人事上以及管理体制上的原故。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民委员会的权利，工人自治的权利和农村自治机构的权利逐步减少了。管理作风变得更加盛气凌人，害怕批评，轻视来自管理核心以外的意见和建议。”

卡尼亚特别痛斥了所谓“成就的宣传”，这种宣传在电视上尤其刺眼，它的片面性是与健全的理智不相容的。卡尼亚补充谈到，应当老实承认，所谓“成就的宣传”，这种作法引起

了新闻界的反感。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引起认真的注意。随着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少，这种宣传开始在客观上使社会和党发生对立，加深了信任危机，人们甚至对合理的论据也表示不信任……。对现实表示冷漠或者保持沉默。这些都证明，国家状况恶化了……。党内公开的批评和讨论停止了。谘询协商制度形同虚设，因为它已经变成五花八门的繁琐手续和形式主义的堆积，从而扼杀了党的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思想性、真实性、诚恳和原则性。

卡尼亚还谈到了很多社会上的道德状况，列举了非法行为、破坏法制和暴发致富等例子。

第一书记们的悲剧

在会上发言的人进一步深化了卡尼亚作出的批判性的评价。他们每个人都愿意帮助揭露过去政策中的问题，阐明危机如此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中央委员会的自我批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党的高级议事厅里呆过多年，他们亲眼看到了现在所说的事实。

安·维尔布兰是中央委员会的老委员，现在是政治局委员，经历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危机和变革。他说，波兰人民共和国经历的1956年、1970年、1980年这三次危机都具有共同的形式，虽然也有些差别。

维尔布兰说："每一次危机本来都可以在十二年前通过修改现行政策而加以避免。然而，每次的形势都发展成撤换中央第一书记。这成了基本改变政策的条件。已经形成了这样

一种情况：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面，如果没有悲剧性的曲折和冲突，就不可能发生变化……。失去同实际的联系，成了政治领导人长期掌权之后的经常现象……”

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务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亨·雅布翁斯基在会上提到，在各机关的上层已经失去了诚恳坦率的态度和关系。他说：“最有力地说明在方针上不协调以及产生这种不协调的缺点的例子，莫过于对动力需要的错误估计了。政府告诉政治局，电能大量盈余，竭力主张出口电力，同捷克斯洛伐克就过境输送电力问题进行了谈判，而这正是发生在国内所需动力一天比一天不足这样一种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关于大企业效率的欺人之谈（因为只注重直接的生产性消耗），实际上导致了取消地方经济，而这并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唯意志论、爱唱高调、‘装饰门面’，从而树起一道道屏障，越来越难于从它后面看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现实的真象。”

米·拉科夫斯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周刊的主编，著名的评论员。在过去若干年中，他在自己的很多文章中，想方设法多少讲了一些真话，揭开了一点帷纱，而危机的原因就在这层帷纱后面滋长。这一次，他又以一种独特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冲突。

他说：“参加罢工的首先是年青一代，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青年的整个概念都破产了。我认为，我们大家对此都要承担责任，因为存在着对青年运动不正确的看法，而这不只是在近十年中才有的。一般地说，我反对把反常现象的原因划在近几年的范围之内。一些现象有着深远的根

源……。对新工会的态度问题，是当前最主要的问题，确定对新工会采取明确的、坚定的政策，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必须将这个运动同化到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来。保持‘我们’和‘他们’这种界限，是个政治错误。这种错误将为那些反社会主义势力开辟道路，使他们得以利用新工会谋取自身的利益……。必须把新工会的强烈愿望引导成为执掌政权的共同责任感。这需要公开地、果敢地去做工作。如果新工会或其中部分新工会不愿接受这一点，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分裂为理解国内形势的和企图实行冒险政策的两部分。可以说，目前，在波兰社会上，除了进行讨论和存在着焦躁不安的情绪外，要求稳定的力量在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中发言最尖锐，但也最实事求是的是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中央委员们。这是很自然的。他们正处在这次工人运动的火山口上，感受到了罢工烈焰的灼热，也理解燃起这股烈焰的怒气。如果用现在的说法来讲，那就是说，他们同基层的联系还不是真正坚实可靠的。

对过去的检验

塔·菲什巴赫是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他说：“不需要有很大的洞察力，就能够在工人阶级的抗议中发现那些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体。他们懂得，他们有权利要求自己的政权、人民的政权伸张正义、坚持真理和忘我精神。我们的舆论在原则上表明了态度，认为私有化、拉帮结派、专横跋扈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他要求通过法律和政治保证使制度避免这

样的危险性。因为，“我们不能只靠许愿和表示良好愿望的宣言来摆脱目前的危机。”菲什巴赫特别谈到新的独立自治工会，他说：“他们现在已经是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看作是稳定和恢复公共生活的保证之一。虽然，我们党不是它的倡导者，但是，党正是在今天有机会从新工会中获得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劳动的人们的积极因素。”

什切青造船厂的党委第一书记斯·米什凯维奇提醒说，什切青造船厂提交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与罢工集体后来的要求相似。当时这些建议没有得到答复，也没有人以任何方式关心怎样实现这些要求，谁来负这个个人责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重要的。米什凯维奇要求把个人责任问题作为一个首要问题提了出来。除揭露什切潘斯基大量投机勾当的案件以外，在政治局的报告和文件中，都没有谈到还有谁为了个人私利滥用职权。因此，他要求用统一的方式对中央委员、政府成员、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进行审查，在证实他们没有应予谴责的事情时，才能根据他们的级别恢复其领导职务，并且要继续对社会上的各种沉渣污秽进行清洗。

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要求对党进行“清洗”。米·莫查尔过去是将军和战士委员会主席、原政治局委员（盖莱克时代被撤掉）。他坚决要求：“我们必须对党进行清洗，清除那些伪善的、道德败坏的和贪污受贿的人，同样必须抛掉那些两面派、意志消沉颓废的和追求个人名利的人，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这样沸腾的气氛之中进行“清洗”，在这个党内并不是

什么新的、陌生的措施。众所周知，在1956年“十月政变”之后，不仅“清洗”了个别人，而且对全体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从党的队伍中开除了所有的异己分子和不准备为党的政策而奋斗的人。当时是带着某种为了改善党的成分的决心进行清洗工作的。在1957年1月初的公报中，第一次宣布党在一万个党小组（包括大约十四万名党员）中进行了登记，从中开除了四千五百名党员，有二万七千人被撤消了登记权利。但是，无论是登记正在进行的时候，还是后来停止进行的时候，都没有准确地说明，它的真正结果是什么。后来，党又重新开始发展，今天已达到三百万党员。许多人确信，如果有明确的政策和为其奋斗的具体任务，党不仅可以纯洁，而且还能在自己的活动中得到加强。

关于这一点，普特拉门特从自己的角度作了叙述。他是著名的文学家，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他公开说，盖莱克的最严重错误，就是在他的时代党经历了极其危险的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冲淡和抛弃了党的主要任务。普特拉门特说：“近十年来，党举行了很多典礼、庆祝和周年纪念等等活动，搞了许多旗帜、乐队和感谢信。但是，衡量党的成就，应当看它是否有能力把各个集体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塔·沃姆尼茨基是一位演员，以演出电视剧《潘·沃洛迪约夫斯基》而著名。现在他是中央委员，华沙高等戏剧学校校长。他是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的，所以他谈了当前危机对年青一代的影响。他说：“大多数青年不相信我们使用的语言，要求新的语言，而且要使这些语言回到它们真正的涵义上去。他们还要求道德上的更新。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目前这

种信任危机，使年青人充满了怀疑，这有可能把他们引向异己的方面去。从今天起，我们就必须一步一步地消除这种危险。因此，我们应当制订一个纲领，以便把工人阶级和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但是，首先要通过党内组织上和结构上的相应改革，以保证实现这个纲领……”

参加讨论的人中间，有很多中央委员是工人。他们直到现在才开始发言，在公众中间这时才刚刚听到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提出比较具体的要求。例如，切·德罗兹多维奇是来自格丁尼亚的海员，他说：“海员和造船工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明知道本国和外国船只的滞留会造成几十亿兹罗提的损失，却不肯保证造船厂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所有与海运有关的经济部门的在业人员，期待着管理体制的改革，这种体制限制了我们去进行创造的全部潜力。应该同工人阶级进行有关改革的讨论，在这方面，那些中央政权的体现者们还没有准备这样做……”

扬·拉贝茨基是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段长，他要求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各级党的机构的领导职务实行轮换制，同时要求党报应广泛听取并刊登普通党员的呼声，不管当局喜不喜欢听这种呼声……。应以过去一段时期的情况为出发点进行改革。过去，政权是以人民利益的名义起作用的，现在，应由人民自己在这里行使权力……

这位工人中央委员对这样一种情况表示惊讶，即马·什切潘斯基事件揭出后，当他一下台，人们一下子就能找出那么多证据来反对他，而在此以前，却什么证据也没有。“这样的什切潘斯基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

全会上，也进行了很多自我批评。塔·佩卡是被撤换的政府副总理，在波罗的海地区爆发罢工事件后，他曾被派往格但斯克，代表政府同罢工者谈判，但后来被调回（替换他的是米·雅盖尔斯基）。他发言说："我根据政治局和政府主席团的决定前往格但斯克，参加同罢工委员会的谈判。我老实承认，当时我没有以正确的方法进行估计，实际上是对整个形势的严重性作了错误的估计。今天我认识到，当时我在那里进行的谈判没有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这是我的错误。在那种形势下，将我从格但斯克调回来，是正确的……"

其他人，尤其是被撤换的政府成员和政治局委员们，也都作了类似的自我批评。

但是，对于这种自我批评也存在着这样的意见："在今天的形势下，言论已经明显地失去了价值，最主要的是行动。"（约·泰伊赫马的发言）。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全会上，两天一夜，共有七十三名中央委员发了言。因此，很难（哪怕是部分地）反映讨论的全部情况。详细情节已不那么重要了。讨论表明，在中央委员会有一批既有头脑、又有原则性的正直的人，他们的发言说明，他们能够洞察事物，周密考虑一切，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自然，在中央委员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的发言如同在找到"替罪羊"时吐露的陈词滥调，而根本不去寻找危机的真正原因。因此，另一些人，主要是工人，他们明显地不同于前一种人的态度，在讨论中发言最尖锐，并首先寻求某些新的东西，尽管他们还不能确切地说出这个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愿意去寻求它。对于他们来说，1956年和1970年的旧剧已经

演够了。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工人在会外，在电视上作了最生动的发言，他说，这是他所愿意参加的最后一次重演了。

下一步怎么办？

批判过去，吸取教训，只是不久以前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的一个方面。但这个方面却是最激动人心的，也是最有成效的。

全会的另一方面是寻找解决办法，提出新的设想，制定今后的发展前景。因为，没有这些，就不能从今天的危机中摆脱出来，也不能保证避免可能出现的某种新危机。卡尼亚在会前就讲过，形势是新的形势，因此必须制订新的规划，以便找到出路。

在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了很多实际建议，这些建议有很多是围绕着政府迄今为止为改善局势所制订的措施。当然，这些建议和步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在具体的义务和要求的强大压力之下提出的，因为这些义务和要求是同罢工者签定的协议所规定的。

因此，当前的政策可能要突出求实精神，解决一系列局部问题，而从总体来看，这些局部问题的解决并不必然地产生面面俱到的和十分完善的体制。但是，深刻的危机所造成的现实就是如此。结合国内情况，第一阶段的前景也只能是这样。与此同时，这也可以为新的、系统解决的办法创造条件和打下基础，并且将会在目前的讨论中以及今后的实践中发扬光大。

卡尼亚代表政治局首先建议停止一部分波兰最大的投资

项目。这些项目吞掉了巨额资金，并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始见成效。要把建设这些项目的力量，转移到服务于市场供应，发展农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项目上去。看来，在最近一两年内，对改善市场的肉食供应不可寄予太大希望。因此，接受了公众提出的要求，肉类要实行合理供应，也就是凭票供应。在当前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行政措施，对于目前这种混乱状况来说，较为正确。只有在这些新措施发挥作用和扩大对食品生产的投资之后，这种供应状况才能在客观上扭转过来。

农业是有待扭转形势的另一个领域。农业已经连续五年未曾得到哪怕是计划中规定的那一部分资金了。正如全会所说，现在不仅应当为农业保障相应的资金，而且在农村要使农民坚信政府对农业的态度是稳定不变的，并且要创造条件恢复农村和合作社的自治。

第三项综合任务是扩大一般日用消费品生产。增加工资不应意味着仅仅是多发钞票，而是应当保证用这些钱能够在市场上买到更多的商品。因此，要改善一些企业的结构，因为它们至今生产的都是投资性设备。现在应让它们有能力去生产那些当前人们最急需的产品。就业政策也将根据新形势加以调整，以便让更多的人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就业。

经济管理的改革

全会大力强调了在管理经济和领导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卡尼亚在报告中说，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领导体制将进行深刻的改革，使它能保证经济中的所有决定和步骤都

实实在在地以“经济核算”为基础。这项改革要保证企业有更大的、首先是表现在自筹资金上的独立性，其次，要保证企业在经营上有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大的效果，从而保证中央政权能够更有成效地指导经济的进程……。经济改革必须充分作好准备工作，在改革过程中，将最大限度地运用科学，并吸取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然而，全会的讨论并没有超出经济改革的一般原则，也没有很明确地谈到经济改革具体应当怎样进行。在全会的总结中提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在经济管理中扩大工人自治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在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之前，要对改革的基本原则普遍进行讨论。

除了要求改革以外，对于应该怎样看待改革，肯定还有很多新的想法。关于改革究竟应怎样进行的问题，波兰的经济学家、工人们、中央委员们在全会上都谈了很多。可以肯定，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首先，迄今为止波兰进行某些试验所提供的经验，很难变成国家集中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现在，从很多发言中也可以看出，想让集中的国家计划同企业的独立性以及企业的自治协调一致，这当然就要求作相应的研究，并且要按照另一种方式建立各级机构。

在波兰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波兰在经济上属于东欧国家的互助合作组织——经互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本质上相同的经济体制，同时各自带有某些可能存在的特点。长期以来，这个组织的成员国都要就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进行协商。在他们之间实行一定的分工，保证相互之间的交换和合作的职能，实行特有的支付体制和价格制度，等等。波兰

在经互会里是除苏联之外最大的成员国，按经济潜力来说也是除苏联之外最强大的。波兰是这个合作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也一定要使自己的经济体制适应于那些必须与之合作的伙伴们。

所有这些，把波兰经济置于一种微妙的地位。然而，已经或多或少为事实所证明的是，它不能再按迄今为止的方式发展了，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并不低于加在它身上的义务。

波兰为同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经济合作而成了一个开放性的国家。它曾得到西方的大笔贷款、设备和很多专利，它的外债达二百亿美元。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为什么波兰在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上，极重要的因素应当是既果敢、又谨慎。这就意味着必须打破至今在国家管理中僵化的、官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体制，这些在全会上和公众中间都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是，与此同时，又不能在尚有很多未知因素和处于试验阶段的情况下，飞得太高。

工会和国家

现在，应该回到工会问题上来，这是中央全会上占主导地位的议题。

大家都表示，今后的国内事务，没有工人阶级和他们的积极参加是无法进行的。工会运动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在全会上，原工会主席、五金工人、候补中央委员罗·扬科夫斯基

对这种状况作了最好的描述，他说："工会运动组织上的统一已不复存在了，但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统一还依然如故。这就是各行业工会和新工会合作的可靠基础。我们向我们的阶级兄弟伸出了手，因为他们的愤懑是正当的。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漂亮言词和许诺，而要以新工会组织的形式为捍卫自己提供保障；我们感到吃了败仗，接受了这种要求，但没有指责和抱怨。我们已经同新工会的筹建委员会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因为我们希望保证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享用工会提供的优遇。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应当维护阶级的工会运动的统一……"

工会运动形成的过程将继续下去，在经历各种复杂矛盾的形势之后，将会产生某种结果。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内容肯定不只是停留在工资、工会的优遇和社会问题上。在这方面，就连新工会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工会的作用是否在于，让国家去领导一切社会事务，而由工会进行监督，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下予以批评，甚至罢工(波罗的海的海员们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象英国码头工人一样的行动)；或者象米·拉科夫斯基在全会上所说的那样，由他们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和命运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象格但斯克协议中说的"保证相应的监督手段、发表意见并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外，还必须从事具体事务，完成具体任务。实际上，协议中提到新工会"应能对决定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关键性决议进行公开协商"，但是没有讲这些决议由谁作出，在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起什么样的作用。

现在对这方面作任何推测还为时过早，因为制订工会法，

拟订新工会章程，新工会的登记注册并成为法人等事项还有待进行。但是，从这些问题的提出，便可想象到波兰社会和波兰工人阶级面临着多么严峻而微妙的任务。

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广泛的民主化，首先应理解为，最重要的政治机构，特别是议会要发挥积极作用。罢工后，议会的第一次会议表明，议会将不再是“令人不快的议会”(这一用语有着特殊具体的含义，它指的是1717年在议会的一次会议上未经任何讨论，就接受了沙皇俄国强加的旨在缩减波兰军队的1716年华沙条约)。这届议会对平科夫斯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表明，它一定会坚持反映波兰社会的需要和公众的情绪。

还采取了一个可能是很有意义的步骤。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政府控制之下的最高检察院（现任检察长是米·莫查尔），现在成了议会的机构。这不仅使最高检察院更有权威，而且扩大了它对政府机构以及政府本身进行监督的可能性。应当说，过去人们就知道这种做法。1956年，设立了附属于议会的最高检察院以代替监察部，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家的监督变为议会的监督。然而，这个机构没有保持多久，也没有作出什么特殊成绩，后来又由政府管辖，从此销声匿迹。今天，最高检察院又回属议会，由得力的人物莫查尔出任检察长。从他的几次发言来看，这一最高检察机关在波兰的政治制度和波兰社会中，很可能起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在整个讨论和全会的各项决定中，特别强调，省和区的人民委员会作为在波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因素，首先作为非中央集权化的因素，具有更大作用。非中央集权化是一个长期以来讨论的老话题，对此特别关心的不只是城市居民（可以便于更直接地为他们解决许多问题），就是经济企业也极为关心。

中央集权制往往造成企业的混乱，有时在企业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使它们陷入荒诞的境地。在这里举例加以说明：在内地有个名叫“巴黎公社”的金属工厂，几年中曾向南斯拉夫出口特种钢绳索。当停止出口时，企业领导向华沙管理局提出要求，在它的计划中改变该种产品规定的数量指标，因为原定指标已不适用了。但由于这个计划是自上而下规定的，也必须自上而下地加以改变。如果不改变计划而企业又不再生产这种产品，就意味着没有完成计划，这样会造成责任后果。可是，在经过多次商谈之后，管理局口头通知他们不能改变这个计划，因为这是非常麻烦的事，于是让该企业去生产另一种对路的又与原订那种产品类似的产品，企业就照这个意见办了。但谁也没有想到，当上面检查时发现生产的不是原订那种产品，而是另一种产品的时候，就掀起了反对企业领导的行动。经理和他的助手们被告到法院，而华沙管理局的头头矢口否认曾对企业领导作过变更产品的指示。于是，那几个一般来说在集体中还享有声誉的企业领导人却被法庭判了罪。

这个普通例子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劳动人民、人民委员会和地方上的领导们如此坚决地反对中央集权。一些省、市的负责人抱怨说，地方上的一般性购置如果没有总理亲

自同意就办不成。

关于政治体制的其它部分，如人民统一阵线，参加统一阵线的政党等问题，在这次全会上没有多谈，在这方面也不存在什么特殊的问题。不过可以看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一般进程中，这里也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力而没有加以利用。

波兰统一工人党非常代表大会

今天，党成了全部注意的中心。党的地位曾使它在国内整个生活和国家发展中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可是，现在，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由于存在着缺点和错误，这种作用一度遭到了破坏，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首先是党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也一度中断了。

过去所有批评的出发点，都是认为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歪曲了党的路线，所以造成了危机。在过去的几次危机中就是这样评价的。

然而，这一次摆脱了过去的模式，提出要提供某种保障，以便保证正确地和彻底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但是，究竟什么是这种保障呢？一般的回答是：在党内生活民主化的过程中，加强责任感，提高思想觉悟。

自然，谁也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此，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在会上需要解决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完成某些在本质上决定着党的今后工作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改革。

卡尼亚在报告中说过："进行深刻的改革和重新检验党的

职能，是对将来的最重要的保证。”

非常代表大会能带来些什么呢？

首先，代表大会作为党的最高机构，应该通过“具有持久价值的纲领”。对此，没有更详细地说明这将意味着什么，但是，关于代表大会的通知本身，是有其特点的，并且使人很感兴趣。波兰党没有自己的纲领，这种纲领本应规定党的长期的思想政治方针和波兰社会的发展战略。波兰党的纲领性文献是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决议中只规定以后五年的最重要的任务。

因此，过去曾评论说，一个党，以至于一个国家的政策的构成，不能只有战略而无策略。这正是波兰某一段时期被称为“错误和缺点”时期的原因之一。

关于什么是波兰党正确政策的依据问题，一般的回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整个运动和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决定着党的战略和长期方针。

值得考察一下的是，这个“有持久价值的纲领”的概念，它的含意，究竟是波兰发展社会主义的长期规划，抑或是现时期克服危机的临时性规划。

代表大会必须完成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制订新的党章。关于这项任务谈得比较具体。卡尼亚在报告中说：“党章必须具有党的法律效力，每个党员都同样地有义务执行和遵守党章。”他特别强调要作如下规定：自由选择党的领导，对候选人的提名不加限制。党章还应规定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义务。

在讨论中也谈到了某些其它概念，例如“集体领导”、“领

导干部轮换制"、"制止拥立领袖"等等。在会前的讨论中，应当确定这些概念的内容，这次讨论将作为通过代表大会决议的主要根据之一。

非常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还未确定。有些人认为，大会应尽快召开，以便尽快地摆脱当前的窘境，使国家能更快地从困难和混乱中抽出身来。另一些人则认为，代表大会应妥善地准备，在比较缓和、比较稳定的气氛中召开；会前在党内要进行一些改革，使大会能够更顺利地进行，在新的形势下产生党的新的领导班子。

卡尼亚在中央全会结束时说："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对于我们来说，要在这次全会结束的时候弄清事件的全部原因，并且摆脱它，那是太困难了。"因此，还有待于通过今后的活动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和分析。

协议和联盟

波兰进入了一个严峻的、艰难的、微妙的时期。这个时期不仅对于波兰本身，而且对于其它国家，甚至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都将会很有意义。这是一个相当发达的社会实体的特殊的演化。这个社会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又经历过并暴露出很多矛盾。

业已确定的进一步发展方针，可以称之为波兰社会内部协议和联盟的方针。党不仅表示尊重同罢工委员会达成的协议，而且赞成进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

同样地，还强调了一切关心波兰未来的人结成联盟的方

针。卡尼亚在闭幕词中高度评价了“非党人士的明智的、公民的立场，以及与各联盟党派的伙伴联系”，这不是偶然的。他还同样地评价了天主教教会的立场，因为教会表现出“对国家、对波兰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责任感”。

这一切都明确地表明，坚持社会主义立场，反击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行动和企图的决心。

波兰事件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显然，在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鉴于波兰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已经在波兰发生的事件自然被认为是最重大的事情了。这种反应并非到处都一样，程度和语调也不尽相同，但是，到处都表示准备帮助波兰克服困难。对波兰社会今天新发生的事件也作了不同的解释。

苏联很明确地把波兰事件解释为波兰犯了一定的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背离了原来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背离了党的工作的“列宁的原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导致问题的尖锐化，使局势失去控制，并且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势下，在波兰存在着的某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敌对势力开始抬头，参加了可能威胁到社会主义成果和党的地位的行动。

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接受这个估计，但他们使用的语调有相当大的差别。在公开的评论中，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当然是走得最远的了。

民主德国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10月13日在格腊的讲话中，激烈地攻击“外国帝国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这些宣传工具的操纵者们，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社会主义的波兰开展了空前的诽谤运动。”这个运动，用昂纳克的话

来说，是“鼓励了出现在波兰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他表示民主德国对于波兰局势的稳定极其关切。他说，民主德国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打算利用波兰当前的复杂形势达到其罪恶目的的任何干预的企图”。

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书记瓦西尔·比拉克的讲话则更加尖锐、更加绝对。他说，帝国主义势力在消灭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遭到失败以后，现在又竭力要毁掉波兰人民共和国。

比拉克说：“今天在波兰，某些人高谈政治同他们无关，只是力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和自由的工会’。然而，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把独立工会变成反对派活动的合法基地，变成继续从外部干涉波兰事务的主要渠道。他们要削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并使社会主义的波兰陷入瘫痪。”

对波兰新工会的这种评价，同波兰统一工人党自己作出的评价是对立的，而且，很说明问题的是比拉克进一步说：“因此，波兰同志永远可以指望我们党和我们人民的帮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波兰党对于新工会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因此，波兰党在这方面并不需要外国的帮助。

令人感兴趣的是，历史经常以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扭转乾坤。比拉克的这项声明，使人想起1968年5月9日，也就是华沙条约国出兵干涉的三个月之前，当捷克斯洛伐克正处于热火朝天的情况下，波兰的《人民论坛报》的文章写了如下一段话：

“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些政治事件的舞台已有几

个月时间了。这些政治事件的特点是努力纠正以前的错误和偏差……。然而，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着手进行恢复的进程，却受到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外国的、反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注视。这种倾向的目的在于破坏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取消人民政权，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

当然，情况不同，问题只在于……

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通过齐奥塞斯库和卡达尔的声明，以多少有所区别的方式，也就是说以另一种语调，对波兰事件作出了评价。他们也谈到波兰奉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有错误，但是，他们首先坚持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由波兰人自己寻求解决办法。

在西方报刊上，对波兰事件有各种不同的评论，有严肃认真的分析，也有耸人听闻的猜测。层出不穷地议论着新工会、天主教教会的作用、华沙条约内部的关系，等等。不过，几乎所有严肃的报纸和评论员基本上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波兰不能按旧的轨道继续走下去，但是它应该在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环境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而且应该自己去寻找这条道路。同样地，还可以注意到，某些国家的官方人士是十分审慎的，他们竭力公开表示：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是波兰的内部事务，不应有外部干预。这并不意味着某些国家的某些“非政府性的”组织、行业工会等没有采取措施，以便在资金和印刷出版技术上帮助新的工会。

教会呼吁理智的行动

波兰统一工人党六中全会之后，为恢复党和政府的正常工作，整个国家立即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以便更加彻底地贯彻执行已达成的协议。这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采取措施整顿市场情况，着手革新一系列经济机构和政治制度。

对于党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要使党员们活跃起来。在人们作出的评价中，尖锐地指出，党和工人阶级的联系中断了，但首要问题是建立党的基层和党的上层之间的积极的联系。因为，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首先发生了“体系的瓦解”。

全会以后，正当党着手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活跃基层的时候，在华沙举行了一次另外一种同样是分析国内形势的“全会”，这就是10月15日和16日召集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团会议。

主教们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但公布了这个会议的公报，其中谈到：

“被召集参加会议的主教们，怀着对国家今后命运的巨大关切和责任感，根据自己作为教会的神甫，也作为祖国儿子的使命，研究了出现在波兰——我们共同的大厦中的当前迫切的形势……。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我们是这些事件的目击者），动摇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以至个人的生活。工人们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任务，揭露了在公共生活各个领域中那些担负领导职务的人们

与社会隔绝的情况。

今天，在新的形势下，主教们希望而且寄希望于整个社会：为了整个民族的共同福利要按照修订的方针进行社会经济改革。主教们正在分担今天劳动人民生活中的忧患，在道义上支持他们并维护他们的权利。同时，表示相信，在新工会的工作正常化的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以更大的努力和热情，履行自己对于自己工作部门和人民生活的责任。

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协议的基础上国内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以及与此有关的经济秩序，使我们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并且保障自由祖国的安全。全体波兰人都愿感受到自己是自己家里的主人。同样，还需要注意到时间和地点的条件。因此，我们的活动应该是有理智的，应该保障社会秩序。”

除一般地表明态度外，主教们还就某些刻不容缓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在会议公报中强调，最急迫的任务是安排好居民的食品供应。他们表示希望，新的农业政策能有助于恢复和发展各个农户的农业生产，能把青年人吸引到农业中来，这对于“复兴波兰农村，使我们能自给自足是必不可少的”。主教们呼吁农民向城市居民支援食品，使波兰不致发生饥饿现象，使波兰不致“产生新的城乡对立”。

会议公报当然也包括有“人们灵魂的神甫”对信徒们纯属宗教性的训示。但是，显然，教会认真地在参与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它作为现存的实际社会力量，也负起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

应该说，宗教的队伍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在神职人员内部，在教徒中间，存在着很多流派，从完全奉公守法地、建设性地同政权合作的，到更多地倾向于同党唱对台戏的都有。由此也可以看出波兰情况的复杂性。然而，可以说，就是在过去，天主教会中最狂热的天主教派也并不总是梵蒂冈的盲目信从者。他们懂得，在比较微妙的时刻，首先要站在波兰人民的民族利益的立场上，然后才考虑世界性宗教的“普遍”看法和态度。无论是在二次大战中，当教皇对法西斯怀有好感的时候，还是在战后，在解决新合并地区的教会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采取这种立场。甚至在这次夏天罢工期间，也可以看出沃依蒂瓦教皇和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的立场有着一定的差别，因为他们是根据各自所处的地位和所代表的利益发挥作用的。

今天，天主教教会对波兰社会的巨大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建设性的，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波兰人民寻求真正最妥善的解决办法，这主要取决于波兰主教团。在公报中也可以看到，主教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党和教会肯定不能形成任何形式的“联盟”。但是，双方都明白，任何一方缺少了对方都不可能解决波兰社会的重大迫切问题，这在哥穆尔卡时期就已经被确认是一条真理。现在，六中全会通过斯·卡尼亚的声明又加以肯定了。这也是波兰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而且，下述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党的最高级会议和教会的最高级会议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卡尼亚和天主教维辛斯基红衣大主教急忙举行了“最高级”会议，就双方“为波兰人民的利益”开展活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80年

10月22日在华沙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党的领导人和教会首领的第一次直接会见(过去都是政府总理同红衣主教谈话)。会见后的报道中谈到:“会议一致认为,教会同国家采取建设性的共同行动,有益于人民的利益,并将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幸福和安全而继续下去。”

反官僚主义的行动

如果可以说在波兰正在证实马克思曾经意识到的事情的话,那么今天正以新的方式成为有形的东西。

马克思曾经确信,社会主义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将延续很长时间,并且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正因为是过渡时期,它不具有那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使人们得以循此加以仿制,这同资本主义制度下曾经出现的情况,以及共产主义制度下将会出现的情况,都是不相同的。

当今世界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社会主义已经作为一种世界进程在发展着,而且正在以不同的形式成长起来。社会主义的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极不相同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人们将通过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目标。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借鉴其它国家经验的同时,在克服自己的矛盾和显示自己的特点的过程中,将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也就丰富了共同的经验。

无论如何,党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一切都取决于这个党是“不断发展的党”还是“维持现状的党”。如果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党”,一个推动变革,推动社会运动

不断向前发展的党，那么广大群众，以及工人阶级就会跟着它走。如果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党”，一个为维护国家管理机器既定的形式而站岗放哨的党，那么就会导致业已发展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传统的冲突，而党本身也会中断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在波兰的情况下，当社会主义唤起并调动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从而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物质成就的时候，今天的问题是，工人阶级采取了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行动。工人阶级已明确宣布了，在这一行动中他们将摒弃什么和不准备摒弃什么，但是，必须找到新的、积极的抉择。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在致力于“国家社会化”，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的“社会国家化”。

能否取得成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这取决于许多国内因素，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先锋队——党的力量和远见。但是，同样，也还取决于一些外部因素，即取决于某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波兰人的观点，即，唯有波兰人自己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著名电影导演和艺术大师安捷依·瓦依达在一次讲话中说：“波兰工人阶级坚持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实际上，这种对波兰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就是我们，波兰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能被简单化了，否则就不可能带来成果。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理性的教训……”

这一段论述有它深刻的含义，因为整个波兰知识界，特别是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波兰人民的生活中起着很大作用。

战时，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在刑场上，主要是迫害波兰的知识分子。战后，波兰民族感到，它应悄悄地支持一下脑力劳动者的上层，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自发的学术活动，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教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波兰知识分子的重新崛起，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也不那么明显。但是，它是波兰社会中的一股强大潮流，这股潮流已经冲破和排除了一切困难险阻，经受住了考验。知识分子在今天是波兰民族的一支巨大的、宝贵的潜力，他们中间大部分没有沾染上官僚主义的恶习，而是同工人阶级的队伍站在一起。这对于党来说也是一个时机。

最后，应该指出，此时此刻，全体波兰人民眼前看到的是，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这是在一些时候以前还根本不能想象的一场变革，因此舆论界称这场变革为“社会生活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式的革新”。这种变革正在一步步地向整个现实生活提出要求。波兰已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发生波罗的海地区事件以前的那种状态了。

新的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登记注册了。它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波兰社会原有的“轨道”。在登记注册的时候，“团结”工会的创办人对法院强调指出，他们承认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但是，工会决不听命于“任何政治势力”。这是迄今为止实践中的新公式，它一定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

经济改革认真的准备工作即将开始。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统一农民党最高委员会制订了新的农业政策提纲，并已付诸公开讨论。

在文化、出版事业、报刊以及公开报道中，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重大新闻。“成就的宣传”（在

任何时候都不意味着宣传工作的成就）被代之以关于国内实际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的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真实的报道。

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在经济形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考验是严峻的。然而，应该说，波兰社会的力量并不小。如果将那些被束缚的具有创造性的能源释放出来，困难便可很快得到克服。不仅如此，在解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矛盾的过程中，还会焕发出巨大的首创精神。

作者简介

德拉戈留伯·米利伏耶维奇，新闻工作者，生于1922年。1944年起从事新闻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政治报》通讯员、评论员、专栏编辑、驻华沙记者、副主编等职。1972年至1975年任《新闻周报》责任编辑和副主编。在《政治报》多年负责编撰《人与社会》专栏。主要著作有：《全民议会》、《我国的区》、《论我国的宪法》等。现任《政治报》社副社长、塞尔维亚记者协会主席、南斯拉夫联邦记者联合会副主席、塞尔维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新闻委员会主席。